

沈嗣莊編著

新史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種六十第書叢年青

史新義主會社

青年叢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
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
與宗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民國二十三年至
二十五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
意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55295

敬獻給

我親愛的母親她易簣時的遺言

啓迪我鼓勵我使我把這書寫成了

社會主義新史目次

蔡 序	一
自 序	一
導 言	一
第一章 聖經中的社會主義	一
第二章 自教父至謨耳間的社會主義	二〇
第三章 烏託邦社會主義	三八
第四章 科學社會主義	六二
第五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上）	一〇二
第六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下）	一二六
第七章 無政府主義	一四八
第八章 基督教社會主義	一六三

蔡序

易繫辭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春秋公羊傳曰：「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觀於社會主義之運動，其初或受信仰，或被排斥，是見仁見知之不同而已。然而運動既久，則以其言重辭複之故，而使人注意於其美點，於是有哲學家之試驗，有科學家之計畫，有宗教家之宣傳，彼等平日各有其研求與信仰，往往互相菲薄，然而皆加功於社會主義之運動，誠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矣。吾國譯述西洋社會主義史者，已有多種，然對於宗教家之運動，多不致詳。今讀沈嗣莊先生之社會主義新史，乃詳人所略，側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關係，使讀者公認此種運動，為人類普遍的要求，而決非一學派之所杜撰，則其對於社會主義之研求，將益增興趣。故吾謂沈先生此書，決非以宣傳基督教為目的，而實在表彰社會主義運動全部之事實，使不致有偏枯之感焉。

廿三年十二月蔡元培

陳序

削足就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民十九年我謬主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時，覺任重途遠，斷非一人之能力所能及。於是設法羅致人才，以匡不逮。其時，沈君正以宦海多故，於倦勤之餘，在江滄閉門著述，以求其心之所安。我與沈君相交有年，素來知道他是一個才識過人，敢作敢為的人，對於青年運動，尤為關心。因此，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去看他，要他『出山』。出乎我意料之外，在第一次談話之後，他便答允了，因為我要使青年會成為文化中心的一語，把他的心絃打動了。我與他共事，先後凡三年，在這三年中間，我們的合作，的確使傳統的青年會走上了新的途徑。對於文化，我們是非常努力的。然沈君猶以為不足。他說：如果我們老是整天奔走，整天開會，而自己的學問，却日益荒蕪，自己的思想，却每况愈下，則於最近的將來，我們必成為文化的落伍者。我們自己既成了文化的落伍者，試問我們將何所持而再為文化努力呢？他要求以一部分時間，從事修養。這要求，我答允了。不幸，他的計劃還沒有實行，一二八戰禍便發生了。過後，整個社會便為經濟支絀和裁員減薪的空氣所籠罩。當然，青年會不能例外。從此，沈君雖勉強從事，而其內心之矛盾，却與日俱增。不久，我以某方堅約，不獲辭而去青年會。隨後，沈君亦辭職而去。人皆痛青年會之失人，而我獨慶沈君之去得其時。因為他現在還是一個年富力強的人，如果環境不許可他為所欲為，而因循苟且地下去，那末

到了衰老時候，悔之晚矣。果然，他蟄居吳門，不數月，他的社會主義新史便脫稿了。這的確是一本不同凡響的新書。我是一個基督徒，同時對於社會改造，自問未敢後人。讀了他的書，知道亘古來基督教對於社會改造的努力與其得失成敗。他的書不但是本歷史，而且也是一匹識途的老馬。因為從以前許多人的得失成敗，我們便可知此後基督徒所提倡的社會改造應該怎樣了。什梓之夕，沈君案序於余。余知沈君稔，所以一方面把本書誠懇地介紹於讀者，一方面更慶沈君之得其所哉。現在他已經恢復了他喜歡做和可以做的事，而可無上面所說削足就履之虞了。是為序。

陳立廷序於上海

自序

本來我自己不想做序的，因為書裏邊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了，那又何必再來嚼嚙而空佔篇幅呢？繼思本書書名中的「新」字，確有說明之必要。同時，那些鼓勵我和替我搜羅材料的好友們，他們的愛護和厚誼，使這書成功了。不過叫我怎樣表示我對於他們的感激，如果沒有自序的話。因此，我就勉力地寫下去了。

所謂「新」並不是標新立異以自玄的意思，因為本書有幾點的確是新的。何以言之？

第一，本書把社會主義最近的事實也包含了進去，尤其是蘇聯第二屆五年計劃。這是現在坊間任何社會主義史所沒有的。故曰新。

第二，本書明目張膽地以基督教為出發點。在八章書中，至少有三章與基督教有直接關係。在中國，這種以基督教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的歷史，恐怕還沒有過。這是本書所以為新的又一原因。

那末，我為什麼要以基督教為出發點呢？這大概是七八年以前的事。其時，我忝主中華基督教文社。因為要使基督教適合於現代生活的緣故，於不知不覺間，我便為基督教社會主義所迷住了；並且糾集了許多同志，作有統系之研究。如是有一年之久。以後，文社解體，同志們都各奔東西地去了；而我自己亦以事索，

不得已把研究材料束之高閣。過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成立。我得參加未議。當然，我又在提倡我以前所醉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了。運動中明達者，早已先我而見。以故一經倡導，響應者頗不乏人。結果，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精神便鑽進到運動的宗旨中去了。去年他們還要我寫一篇社會改造研究計劃，雖然我因事冗，沒有踐約。所以社會主義已成了現代基督教思想界大家要研究的問題，這事實已昭然若揭了。不過現在書店中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的出發點，和一般基督徒在研究社會主義時所有的出發點，互有出入之處；以之為觸類旁通的參考書則有餘，作為研究的主要材料則不足。本書之編，就是要補這不足。

還有，對於那些素詆基督為反社會，非革命的非基督徒，這書也該有相當之貢獻。西方文化，不是淵源於希臘，就是濫觴於希伯來。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普通寫社會主義歷史的人，總是從伯拉圖說起。本書把他置而不論，而偏自舊約聖經入手。這證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有切膚之關係。在唯名主義產生以前，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是一而二二而一。唯名主義的產生，雖然使社會主義有離基督教而獨立的機會，但是在聖西門傳立葉等的歷史中，基督教的成分，却仍然很豐富。一八四八年這一年，在社會主義歷史中有兩件重要的事：一方面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崛起，一方面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成立。前者與基督教脫離了關係，有時甚而至於與基督教處於敵對地位。歷史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後者因為要直接應付前者而起，而其適足以使前者知道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本不是兩件不同的事，這是無可疑義的。所以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非同時研究基督教不可；這和研究基督教的人，非同時研究社會主義不可一樣。批評基督教為反社

會，反革命的人，讀了本書，或者可以知所反矣！這是我所希望的。

本書雖以基督教爲出發點，若以之爲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宣傳品則不可，因本書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材料，搜羅得特別豐富則有之，批評或至於污蔑其他社會主義的地方，却是沒有的。我情願拿述而不作的態度來敘述社會主義各派的歷史。看了本書的人，便可以相信我言之不謬了。

對於那些像我一樣醉心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人，更有一言，非聲明不可。我之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斷斷不是歷史中陳列着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比如使徒時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它們統統失敗了。二十世紀與科學社會主義昌明之後的我們，又何必蹈它們的覆轍呢？它們所主張的原則可以與天地同其不朽，它們的方案及手段却有修正之必要。至於如何修正，那是我和讀者應當努力的一點。

末了，對於幾位寫序文的先生們的盛意，以及青年協會吳耀宗主編的鼓勵，我很感激。還有，這書是在蘇州寫的，吳王台下，環境有餘，參考不足。幸虧張仕章同志，從上海源源不絕地把參考書寄給我。不然，本書至少要遲幾個月出版，或至於終究不能出版。對於他的厚誼，我也很感激。

著者二三，一〇，一，序於蘇州。

549.2
743
2

導 言

一、什麼是社會主義？這恐怕是一個極難答覆的問題。有許多人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之多。其實，又何止於此？流派既如是其繁，則界說也就因之而不同了。比如穆勒說：『凡把土地和生產工具不作爲個人的所有物，而作爲社會或政府的公有財產者，叫做社會主義。』這是普通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的界說。巴枯甯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他以平等爲立場，所以照他看來，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把社會組織起來，使每一個人，無論男女，一生下來，就有發展本能和運用本能的平等機會；不過這本能的運用，非根據於勞働不可。』麥唐納是英國首相。當然他的口脛又不同了。他說：『有許多人肯定社會存在的目的，在謀求個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維護。照他們看來，如果一個人能把他生活中的經濟狀況弄好了，那他全部生活就不成問題。因此，他們要建造一個社會。在這社會中有各種工作；而經濟工具的管理，乃是其中之一。所謂經濟工具，即土地和工業資本。這些工具倘使留在個人手中，那危險萬分。換言之，凡是要把互助應用到政治和經濟上的，即謂之社會主義。』馬克思以科學社會主義開山祖的眼光來解釋社會主義了。所以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使命，乃是在『推翻人類中無意識的發展，而代以有意識的發展。』總之，各有所得，各有所失，各有所重，各有所輕。要找一句把一切社會主義都包含在裏面的社會主義的定義，在現成的社會主義的界

說中，至少著者還沒有發現過。

雖然如此，它們也有相同之處。第一，它們都主張私產制度廢止以及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所謂生產工具，乃是合土地和資本而言。第二，它們都主張革命，雖然革命的程度不同。所以社會主義斷斷不能和社會改良混為一談。合起來說，凡以私產制度的廢止和生產工具的社會化為目的而以革命為手段的，方得謂之社會主義。如果要有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界說，這或者可以將就吧！

二、『社會主義』Socialism 這個名詞是什麼時候發現的？最初用這名詞的是誰？這問題和社會主義的定義一樣麻煩。有的說：這是從英國來的；有的說：這是從法國來的。他們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其實『社會主義者』Socialist 是淵源於英國，而『社會主義』却的確發祥於法國。何以言之？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歐文的信徒在英國貧民的保護者 Poor Man's Guardian 上面第一次用『社會主義者』。翌年，法國的勒羅克思 Leroux 也用了這名詞。繼勒氏而起者為雷伯 Reybaud。至於『社會主義』那是在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法國的地球 Globe 上已經發現了。第一個用這名詞的人是雅蘭思 Jongères。閱二三年，勒羅克思除了用『社會主義者』之外，又用『社會主義』。在英國，這『社會主義』名詞是到了一八三七年。在九月二月的新道德世界 New Moral World 上才發現。這是『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兩個名詞的來龍去脈。

三、社會主義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或曰：為什麼要有社會主義？對於這問題，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義

中替我們答覆了。他說：『至於烏託邦是專從理想上來改良成一個安樂的國家；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託。這種寄託，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沒有力量去改良。所以祇好說理想上的空話，作一種寄託。』他又說：『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雇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飯喫，甚至於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一般道德家，見得天然界的禽獸不用受痛苦，尙且可以得衣食，人類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這是很可憫的。想要減少這痛苦，令人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兩段話告訴我們的是：不問其爲烏託邦社會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其發生，是因爲人類的生活太痛苦了。要解決這種痛苦，才有所謂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的來源。

四，那末，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應當存什麼態度呢？社會主義的發生既由於人類生活的痛苦，那末，人類生活的痛苦一旦存在，社會主義一旦不能消滅，就是用刀鋸斧釜，也不能把它消滅。不錯，有許多社會主義，它們的主張太激烈了，它們的手段太毒辣了；而其『悲天憫人』的苦心，我們却不能否認。人類生活痛苦了，所以它們才『悲天憫人』。反過來說：人類生活的痛苦沒有了，那它們又何苦而『悲天憫人』呢？所以在沒有決定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之前，我們先該自問：現有人類生活的苦是不是還是存在？如果不存在了，那不但激烈和毒辣的社會主義我們應當羣起而消滅之，就是那些不激烈不毒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該認爲無病呻吟，庸人自擾而屏棄之不顧。不然，對於任何社會主義，我們都應當用友愛的態度，加以批評，寬大的胸襟，加以欣賞。明乎此，我們才可以研究社會主義了。

第一章 聖經中的社會主義

一 先知和律法書中的社會主義

猶太人直到進入迦南，他們還沒有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什麼。他們雖然把約但河兩岸的土地分配了，但土地的承受者，與其說是個人，還不如說是支派之爲愈。民數記三十六章明明告訴我們：「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產業的女子，必作同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產業。這樣，他們的產業，就不從這支派歸到那支派；因爲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產業。」不幸，在相當時間，迦南文化在猶太的社會生活中，起了作用。於是由絕對的私有制度而商品經濟，而貧富懸殊，而高利貸；現代資本社會一切的一切，在剛進迦南數百年的猶太社會中，具體而微了。至遲在公元前第九世紀，我們已經可以在他們中間，找出現代資本社會的雛形了。列王記下四章一節所載：「有一個先知門徒的妻，哀求以沙利說：你僕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華是你所知道的，現在有債主來要取我兩個兒子作奴僕。」不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嗎？

照我們所知道的，對於這種社會生活的反抗，一直到了第八世紀的中葉，從先知阿摩司的口中，我們

才聽到。在聖經中，他是第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看到「躺臥在象牙床上……喫羣中羔羊……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的人。他們「爲銀子賣了義人，爲一雙鞋賣了窮人……見窮人頭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在各壇旁鋪人所當的衣服，臥在其上……以強暴搶奪財物，積蓄在自己家中……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使公平變爲茵蔯，將公義丟棄於地……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吞喫窮乏人，使困苦人衰敗……賣出用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哄人……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換窮乏人，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同時，他們用宗教儀式來作幌子，以自欺欺人。第十章告訴我們：他們每日早晨，獻上他們的祭物，每三日獻上他們十分之一。他們以爲這樣便可蒙上帝的寬恕。可是阿摩司對他們說：「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找却不悅納，也不顧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要使你們唱歌的聲音遠離我，因爲我不聽你們彈琴的響聲。」（五章廿三至廿四節）因爲耶和華所要的，並不是祭物，而是大水滾滾的公平，和江河滔滔的公義（五章二十四節）。

繼阿摩司而起的是何西亞。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描寫是：「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上帝，但起假誓，不踐前言，殺害，偷盜，姦淫，強暴，殺人流血，接連不斷……以法蓮是商人，手裏有詭詐的天平，愛行欺騙，以法蓮說：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財寶。」他也主張正義，比如他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爲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我喜愛良善，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上帝，勝於燔祭……你們要爲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你們要開墾荒地，等他臨到，使公義如雨降在你們身上。」

阿摩司和何西亞是以色列的先知。在猶太，我們第一個找到的是以賽亞。第五章所敘述的「以房墜房，以地連地，以致不留餘地，只顧自己，獨居境內」和現在大地主的橫霸，初無二致。他反對當時的法律；因為這法律祇做了有產者剝奪無產者的利器。這在第十章裏可以看到。耶和華說：「禍哉！那些設立不義之律例的，和記錄奸詐之判語的，為要屈枉窮乏人，奪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婦當作擄物，以孤兒當作掠物。」因為以賽亞是貴族出身，所以他對於統治階級，即所謂官長長老等的不義的行為，比較其他先知，格外洞燭無遺。他說：「你的官長居心悖逆，與盜賊作伴，各都喜愛賄賂，追求賊私，他們不為孤兒伸冤，寡婦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們面前……耶和華必審問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喫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你們為何壓制我的百姓搓磨貧窮人的臉呢？』在以賽亞書裏有一點是很可注意的，這就是階級鬭爭和無產者專政；至少他給了我們一種暗示。比如他說：「主萬軍之耶和華從耶路撒冷和猶太，除掉衆人所倚靠的……除掉勇士和戰士，審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長老，五十夫長和尊貴人，謀士和有巧藝的，以及妙行法術的，主說：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使嬰孩轄管他們，百姓要彼此欺壓，各人受鄰舍的欺壓，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賤人必侮慢尊貴人。」三章一至五節。這是以賽亞特殊的貢獻，是政治家的口脛。

在這裏，有一句要聲明。在先知書中，沒有一個先知不是屬望於彌賽亞的。彌賽亞主義是烏託邦主義。不過關於彌賽亞，說得最清楚的，要算是以賽亞了。在第十一章裏，他說：彌賽亞行審判，不憑眼見，判斷是非，

不憑耳聞；他却要用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謙卑的人。第五節說：『公義必當他的腰帶，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到那時，『謙卑的人，必因耶和華增添歡喜，人間貧窮的，必因以色列的聖者快樂，因為強暴人已歸無有。』（二十九章十九至二十節）

彌迦和以賽亞都是猶太的先知。其時，以色列之國祚，已經不絕如縷了。彌迦身居猶太；但是他看到以色列的情形，頗有兔死狐悲之慨。因此，他便不得不向猶太社會提出他的抗議了。他深覺得猶太社會和以色列社會，雖有南北之分，而其癥結之所在，却是一樣的。比如『他們貪圖田地，就估據，貪圖房屋便奪取。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惡人家中，不仍有非義之財，和可惡的小升斗嗎？……地上虔誠人滅盡，世間沒有正直人。……君王徇情面，審判官要賄賂。』這不是以色列社會現象的重演嗎？上面說過以色列人以為宗教儀式之隆重，是可以把一切的罪過抹殺的，這也就是猶太人的謬誤。所以彌迦說：『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六章七節）末了，他說：『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在。』（六章八節）

以上四個先知，即神學家所說的第八世紀的先知。從阿摩司起，到彌迦為止，共計五十年，在這五十年中間，以色列滅亡了。以賽亞和彌迦雖大聲疾呼地向猶太民衆勸告着，以期挽狂瀾於既倒，無如纒纒其耳的猶太民衆，不但沒有悔過的表示，反倒變本加厲，每况愈下。於是內憂外患，接踵而起，在數十年中間，五日

京兆地換了七八個王帝，一直到五八六年，猶太滅亡為止。其社會狀況之不安寧，於此可見。

耶利米就是猶太滅亡前一夕最重要的先知。當然，這時候，社會黯淡的情形，較之第八世紀，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單就以下數處，便可知當時的情形了。耶利米書第五章一節說：『你們當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來跑去，在寬闊處尋找，看看有一人行公義求誠實沒有。』這是一句何等沉痛的話？在二十七和二十八兩節中，這缺乏正義的事實，更顯著了。他說：『籠內怎樣滿了雀鳥，他們的房中也照樣充滿詭詐。所以他得成爲大，而且富足。他們肥胖光潤，作惡過甚，不爲人伸冤，就是不爲孤兒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爲窮人辯屈。』換句話說，而團團富家翁，十九是不仁的。苦口婆心的耶利米，到這山窮水盡的時候，還要他們『改正行動作爲，在人和鄰舍中間誠然施行公平，不欺壓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在這地方不流無辜人的血。』（到七章六七節）其用心之苦，於此可見一斑。結果，猶太還是滅亡了。

以西結特殊的貢獻，不是在描寫當時社會的黑暗，而是在提出將來理想的社會。他在五九七年，巴比倫第一次攻打猶太的時候，已經做了亡命之徒。在巴比倫時候，他預言着，猶太唯一的結果，便是滅亡，且因此而遭非議（三章十五節）等到猶太果真滅亡了，他却改變了他的作風。從四十四章起，他描寫的理想國，乃是他精心之構。當然，這素描的中心是宗教，因爲以西結根本是一個祭司。不過在這宗教的素描中，我們却找到一段極有價值的話。第四十七章說：『你們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爲業……你們承受這地爲業，要彼此均分……外人寄居在那支派中，你們就在那裏分給他地業。』這是土地均分，而且

這分配是沒有國家畛域之別的，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也得享受。

以賽亞書從四十四章起至六十六章為止，叫做第二以賽亞，因為這裏的歷史背景，和四十四章以前的，大不相同。至於這幾章是什麼時候寫的那恐怕在五八六年以後吧！在第二以賽亞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六十一章一節所說的『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這話便做了耶穌開始傳道時最初的宣言。（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雖然所用的字句，略有增刪。到那時，耶和華要『造新天新地……其中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必喫草，與牛一樣。』這種轉干戈為玉帛，和耕者有其田的情形，是一切社會主義者所期望的。

以上是先知中的幾個代表。其餘的雖然在他們的書中，我們也可以找出社會正義的呼聲，但因為所載的不是略而不詳，就是偶而及之的緣故，我們便不得把他們略過了；好在從上面所舉的那幾個先知，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先知時代社會主義的概況了。以下是律法書中的社會主義。

所謂律法書，範圍很廣。我們所要注意的，却不過是利未記第二十五章和申命記第十五章兩章而已。以時間論，這兩章至早是和第二以賽亞一個時候寫成的，或許在第二以賽亞之後，這就是我們把這兩章留到現在才把它們提出的緣故，因為從阿摩司起一直到現在，都是有歷史的次序的。

利未記以第七年爲安息年，申命記以第七年爲豁免年。利未記以第五十年爲禧年。這是申命記所闕如的。不過，無論如何，二者均以人道爲立場，而且提出了關於救濟貧苦的具體的辦法。利未記說：借了錢，是不可以取利息的，倘使有人把地產賣了，那末，到了禧年，這地產便須無條件地歸還原主，因爲「地是我的，你們在我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無城牆的村莊裏的房屋，和田地一樣，到了禧年，歸給原主。至於城內的房屋，却不同了，「若在一整年之內，不贖回這城內的房屋，就定準永歸買主世代爲業，到了禧年，也不得出買主的手。」雖然如此，在一年之內，總是可贖回的。所謂一經賣去，便即賣絕，是沒有的。關於釋放奴婢，利未記和申命記，除了年代不同之外，更有手續上之不同。利未記說：「到了禧年，他和他兒女要離開你，一同出去，歸回本家。」申命記却添上了「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從你羊羣……之中，多多的給他。」一句話。那末，爲什麼要把奴婢釋放呢？利未記單單說：「因爲他們是我的僕人，是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不可賣爲奴僕。」申命記却提出了經濟的原因。你要釋放他，因爲「他服事你六年，較比雇工的工價多加一倍了。」關於債務，申命記說：「每逢七年末一年，……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鄰舍和兄弟追討。」爲防止流弊計，寫書的又說：「你要謹慎，不可心裏起惡念，說：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惡眼看你窮乏的弟兄，甚麼都不給他。」其爲貧苦者計，可謂無微不至了。

二 耶穌的社會主義

第一，我們應當明瞭耶穌的歷史背景。當然，上面所說的先知和律法，對於耶穌的思想和行動，有相當的影響。不過和耶穌同時，或略為比耶穌早一些的那種歷史背景，我們卻沒有提到過。這是在我們沒有正式提到耶穌的社會主義以前，應當預先敘述的。

公元前一六八年，希臘安泰奧卡斯第四 Antiochus IV 的鐵蹄把耶路撒冷蹂躪得體無完膚。過了一百多年，羅馬龐培 Pompey 把耶路撒冷從希臘人手中奪了過來。於這多事之秋，在猶太產生了五種運動，就是瑪略比黨 *Maccabees*，狂熱者 *Zealots*，撒土該黨 *Sadducees*，法利賽黨 *Pharisees* 和厄辛茲黨 *Essenes*。前面四者是政治的，末了的是經濟的。我們要研究的是末了一種運動。猶太作家淮羅 *P. H. H. 告* 訴我們說：『巴力斯坦有四千個樂善好施的厄辛茲黨徒。他們住在村落裏面，避免城市的繁華，因為放恣淫佚是城市中居民所習以為常的。他們大部份以農耕為業，其他則從事於含有平和性的副業。他們和他們的鄰舍，都在這方式中勞動着。他們既不積蓄金銀，也不需要土地，以獲得收入，他們祇是勞苦工作，得到生活中必需有的供給。他們才是無產者。其原因並不由於機遇之不幸，却是因為他們不追求財富的緣故。但是在真理上，他們却是最富有的。他們把財富看為不需要和不愜意的。你不會看見他們製造弓矢，刀劍，盔冑，胸甲和護盾。他們決不從事於戰具之構造，就是一般和戰爭有關係的物品，他們也不製造商業，造酒業，和航海業，決不會進入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總想避免一切引起貪欲的東西。他們中間也沒有奴隸。一切都自由自在的為自己工作。他們輕視統治者及官吏，不但因為他們破壞平等，反對公義，而且也因為他

們不信上帝和消滅自然組織的緣故。實則自然是我們的母親，因為自然創造一切，扶養一切。……厄辛茲黨所研究的原則是有神論，聖潔，和公道。所謂公道，不特在政治組織及集團中，也在善惡之認識中。所以有三種觀念，或原則，是他們接受的，就是愛上帝，愛道德，和愛人類。愛人類的表示就是慈愛，公平，和物品上之共享。……我們對於後一項，還要增添許多別的條件。第一，沒有人有一間房屋是不屬於一切人的。事實上，他們都同居着，每一間房子都開放着，接納從遠方來的伙伴。而且一切鋪子和糧食都是大家的，衣服原料也是一樣。可食之物，對於那些趕不到公共會食時間的人，都該供給。一般地說來，這種居住相共，飲食相共，和生活相共，在其他種族中是沒有的。……他們每日並不為自己而留下食物，却都供諸大眾，任大眾使用。對於疾病者和年老人，均予以充分的注意，並且溫溫存存地照料他們。」史家約瑟福斯 Josephus 也同樣地說：「他們鄙視財富。他們所實行的共享生活是駭人耳目的。我們不能在他們中間找出有一個人比別人富有些。他們有一條法律，就是他們一經加入，便該把一切交給團體。其結果則既沒有困苦和貧窮，也沒有剩餘和奢侈。……因為他們以為汗淋脊背是一回好的事。……如果他們宗派中有人從別處而來，那末，他們一切所有的，便該公開。」

究竟耶穌是不是厄辛茲一派的人，我們未敢武斷。不過，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却很清楚，就是在耶穌生活中，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的厄辛茲的痕跡。比如他對於上帝的信仰和他在路加福音九章裏所說的「不要帶拐杖，不要帶食物和銀子，也不要帶兩件褂子，無論進那一家，就住在那裏」等等。約瑟福斯又告訴我

們：『因此，他們遠行的時候，不必攜帶什麼東西，雖然爲了害怕盜賊的緣故，他們還須攜帶兵器。』這與耶穌所說『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節）如出一轍。

現在我們要論到耶穌自身的社會主義了。他第一次在拿撒勒講道時所唸的聖經『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便做了他一生事業的縮影。在這縮影中，他開始了他的工作。

最初映入我們眼簾的是登山寶訓。馬太福音五章告訴我們的是：『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考茨基 *Kautsky* 在他的基督教的基礎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裏說得好，他說：『我們真不懂這些字眼所指的是誰，是白癡的呆子嗎？是理想中的乞丐嗎？……無論如何，斥責有錢的人和明明白白表示要飯的人是有福的那種意義是隱沒了。』所謂『虛心的人』和『飢渴慕義的人』大概是那寫書的爲要遷就當時代有產者而加進去的。因爲路加福音第六章明明清地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上帝的國是你們的，你們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飽足。』路加是一個人道主義的擁護者，所以他的話比較要腳踏實地得多了。還有，路加福音在鼓勵窮人之後，更添上了一段痛罵有錢的人的話，他說：『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飽足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飢餓。』這種對於有產者的反抗，是何等激烈啊！

有一段聖經，我們時常把它誤解了，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所紀的一段故事。我們總稱那管家的是

不義。如果這管家的真的不義，那末，耶穌爲什麼要說「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因爲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我又告訴你們，要藉着那正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的確，這管家的有些慷他人之慨。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主人的損失，而是窮人的痛苦。他把欠一百筮油的改爲五十筮，把一百石麥子改爲八十石。這是一件千古來不很多觀的豪舉！

那末，財產根本是壞的嗎？考茨基把財主和拉撒路這段故事這樣解釋：「在這一段中，財主人進入地獄，貧窮的却在亞伯拉罕懷裏，其原因並不在於前者是一個罪人而後者是一義人……富人之所以被貶黜，其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一個富人。」他所根據的是「兒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一句話。其實，這未免言之過甚。財產自身，並沒有什麼壞處，如果我們不是「爲富不仁」而用之得其道的話。財主受罰是因爲他「穿着紫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拉撒路渾身生瘡……得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的緣故。

馬太福音十九章，馬可福音十章，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齊記載着一段關於一個有錢的人的故事。馬太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馬可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路加說：「你還缺少一件，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馬可和路加可以說完全一致。馬太却不同了。他所用的「若」和「可」兩個字，把語氣完全改變了。不錯，馬太福音寫的時候，教會中資產份

子已經慢慢地增添起來，爲了要和緩他的語氣，使資產者不致於聽了不高興的緣故，他便這樣地寫了。還有馬太說：『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馬可却直截爽快地說：『人爲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路加更簡捷地說：『人爲上帝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末世不得永生的。』馬太所說的什麼『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等語，還逃不掉他那種玄之又玄的口脛。雖然如此，三福音却都承認『略略穿過鐵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這話便做了數千年來對於殺人不眨眼的有錢的人的當頭棒喝。

關於豁免債務，除了上面所援引的路加福音十六章一段故事之外更有數處，也可以作我們參考的。第一是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四節所說的『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那僕人出去，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住他，掐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償清，他不肯，……衆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

刑的。』第二是馬太福音六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主禱文裏面關於豁免人的債一段話。有許多教會中人，不知爲什麼緣故，把『債』字改爲『罪』字。大概他們不明瞭這話的經濟意義吧！耶穌所指的，的確確是金錢而絕對沒有半分形而上的意思在裏面。

上面是耶穌對於經濟制度的意見的大概。他主張這種貧富不均的制度，非根本推翻不可。那末，我們怎樣能推翻這貧富不均的制度呢？用政治手段嗎？用武力嗎？這不是耶穌所主張的。我們可以斷言，耶穌澈頭澈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非武力主義者。他在受試探時候所躊躇的就是這問題。但是末了，他還是說：『撒但退下去。』耶穌屢次三番有人要擁戴他，要他作王；但是他始終沒有接受，而且就是爲這緣故便犧牲了他的性命。彼拉多要釋放耶穌，馬可福音十五章却說：『祭司長挑唆衆人，甯可釋放巴拉巴給他們。』巴拉巴是一個政治革命者，而且他曾殺過人。結果，因爲民衆要求的緣故，彼拉多不得已便釋放了巴拉巴而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德國名著者貝耳 *Max Beer* 說：『他破壞國家的縛束……：他是一個革命者，雖然他是一個和平的革命者……：從宗教，政治及社會觀點上看，耶穌已站在猶太人及羅馬文化的範圍之外了，因而受譴，被釘於十字架上。』旨哉是言！

在前幾年，著者發表過一篇基督教與共產主義。雖然爲時已久，其中所說的關於耶穌的經濟觀念一節，到如今却還是可用。其大旨爲：

(一) 剩餘價值是要不得的東西。路加福音十二章裏不是有一個財主嗎？他說：『我的出產太多，沒有

收藏的地方，所以我要蓋更大的倉，收藏起來，可以作多年的用費，只管吃喝快樂罷。」耶穌却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他所反對的不是那財主的儲蓄，因為積幾個錢來作養生送死之用，並沒有什麼不道德。耶穌所反對的却是他的剩餘價值，尤其是他對於剩餘價值的支配方法。

(二) 人的價值何等貴重？資本家為求自己剩餘價值的緣故，什麼童工啊，女工啊，夜工啊，都不顧了。耶穌對於這種「要吃羊腦子不顧羊性命」的辦法，竭力反對。他所重視的是人類的價值。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裏，他說：「你們的頭髮也被數過了……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此外，如耶穌對於孩子的估值等，都足以證明人的價值。

(三) 為富不仁，比較地可能性大些。我們說：資本家一定不仁。那也未必。不過不仁的可能性大些就是了。就像美國社會學家洛辛卜契 Rauschenbuech 說：「得到大資產而無損於人，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方面保持他的領有權，而一方面還是平等待人，談何容易？」所以耶穌說：「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所謂「鍼的眼」乃是猶太城門之名，駱駝過去的時候，非蹬下不可。這不是說「不能」乃是「難能」。

(四) 坐視人亡是資本家的通病。上面已經提到過那穿紫色袍的財主。他門口有一個叫拉撒路的，他眼睜睜地看他餓死。在教父阿利金 Origen 所有的聖經中，關於這段故事有以下的話：「你該愛人如己，看哪，你的同胞就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他們所穿的很髒，將要餓死，但你的房子却充滿了貨物，一點也不給

他們。』財主的受罰，就是在此。

(五) 資產和無產在上帝看來，沒有不同。希伯來民族和中國人一樣，所謂『爲善者昌』似乎一個人有錢是爲了有道德的緣故。反過來說，窮人是罪惡的報應。耶穌說錯了。如同上面所說：『你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要飢餓。』反過來，他却說：『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又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上帝的國是你們的，飢餓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要飽足。』

(六) 人是資產的主，而不是資產的奴隸。這是給那些貪得無厭和『要錢不要命』的人說的。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六章裏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人要耶穌分家，耶穌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爲人的生命，不在家道豐富。』他最警惕的話就是上面引過的『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七) 所謂財富，不單指資產而言，而且也是指道德說的。所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普通人對於人的估値，是以他資產爲標準的。比如有一萬家產的，說他的人也值一萬；二萬的，值二萬；不論他的道德如何，只以他的資產爲轉移。耶穌說這錯了。他在登山寶訓中說：『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四章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說的一切話。』這不是耶穌反對物質的話；不過是超物質的話就是了。

三 使徒時代的社會主義

現在先從使徒時代社會主義的實際生活着手。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節說：『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但是敘述得最詳盡的，要算是四五兩章了。以下是四章三十二節至五章五節的話：『那許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爲巴拿巴，……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彼得說：亞拿尼亞，爲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以後人數一天天地增加起來，份子也一點點地複雜了，在分配方面，當然有辣手的地方，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連一些兒拿不到的也有；這就是六章裏面所描寫的情形：『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爲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於是『十二使徒叫衆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上帝的道，去營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

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以下是一般否認使徒時代社會主義的人的證據：

第一，照四章四節，耶路撒冷信徒有五千之譜，婦女和孩子除外。人數既如此衆多，怎能共同生活呢？其實，所謂五千，不過是衆多的意思。比如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一節說：『喫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五千；』難道喫飽的人真有一萬左右嗎？這不過形容衆多罷了。還有，照一章十五節，耶穌死後，信徒的數目不過一百二十人。在五旬節時候，彼得沉痛的演說引動了三千人相信耶穌。再過幾時，便成了五千。其進步未免太速呢！所以考茨基說：『假使我們要承認一個明確的數目，那末，後者之數決不像前者之近於真理了。』況且一萬左右的團體，在彈丸的猶太乃是一樁十分令人注意的事，但是史家約瑟福斯在他的歷史中，却默無一言。

第二，爲什麼單單紀載巴拿巴的事，倘使共產生活已經實現，那末，拿家產來放在使徒腳前的很多，爲什麼只提到巴拿巴呢？其實，這是很清楚的。（一）巴拿巴在教會史中比較地著名些。（二）恐怕當時教會中都是無產者，除了巴拿巴之外。（三）寫使徒行傳的故意拿他來作爲亞拿尼亞的對照。因此，只有巴拿巴的故事紀載了進去。

第三，十二章告訴我們，馬利亞住在自己家中，而且有使女，這不是使徒時代共產生活的反證嗎？對於這一點，考茨基雖然提出了他的反駁，但他所舉的理由却不很充足，我們還是承認這房子的領有權是在

馬利亞手中。從彼得向亞拿尼亞所說的話裏，我們便可知當時共產生活雖已實現，但不是勉強的，爲自己留下一部份，並沒有什麼不是。祇要老老實實地說明就是了。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在使徒時代我們的確找到了社會主義的實際生活，雖然他們的財產，變賣不變賣，變賣多，變賣少，完全是自願的。

其次是使徒時代社會主義的理論。

保羅主張勞工是神聖的。他自己是一個造帳篷的人。他的勞工不但養活了自己，而且也供給了他人的需用。使徒行傳二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說：『我這兩隻手，常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他在提摩太前書五章裏說：『只有勞力的人，才可以得工價。反過來說，不作工的不能喫飯。』這是在帖撒路尼迦後書三章裏清清楚楚說的。而且他又說：『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提摩太後書二章六節）現在有許多胼手胝足者，不得一飽；不勞者，反得豐席厚履，就是因爲不明白這道理的緣故。

哥林多後書八章十三至十五節指示我們的是平均享受。保羅說：『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平均，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平均了。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大概哥林多教會對於有無相通方面，不無煩言。他們的問題是爲什麼我們要拿錢去補人的不足？所以關於捐輸一節，保羅在他致哥林多教會的信中提得

最多。這裏他又提出了平均享受的道理。

因為保羅是根本以宗教為立場的，所以他的經濟論無論講得怎樣切實，他始終離不掉超物質的話。在提摩太前書六章中，他便說：『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其時，教會中共產生活，雖已風行一時，但因為這是隨意而無明文規定的，所以貧富懸殊，還是不能避免，如同哥林多前書十一章所說，有的吃得過飽，甚至酩酊大醉，有的挨餓，當然，有錢的瞧不起無錢的。保羅在提摩太前書所說的話，乃是有所指而發的。他的意思便是財富不足恃，可恃者上帝耳。這和耶穌在受試探時對付撒但的話，頗有相發明之處。

保羅又告訴我們，貪為萬惡之根。在提摩太前書六章，他說：『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保羅之反對貪婪，和耶穌之反對無知的財主是一樣的。財主的罪惡不在足衣足食，而在貪得無厭。貪得無厭，則不但與人有害，而且也『把自己刺透了。』

第二章 自教父至謨耳間的社會主義

一 教父時代的社會主義

繼使徒時代而起的爲教父時代。第一是巴拿巴 *Barnabas*。他是第二世紀的教父。有一本書，據說是他寫給當時教會的。在這書裏，他說：『一切東西應當和你的鄰舍共同享受。你不該說什麼物件是屬於你的。倘使在不可收壞的東西上你們共同享受，那末，在可凋殘的東西上，難道你們多要嗎？』

同世紀，殉道者查士丁 *Justin* 在他的辯護 *Apology* 裏有過這樣一句話：『以前我們喜歡財富和產業比人家多，現在我們却情願一切公有，把需要的東西，供給人家了。』此外，他又引了許多福音書中的話，如馬太福音五章四十二至四十五節，六章十九，二十，二十五，三十一節，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節，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四節，九章二十五節，十二章二十二，三十一至三十四節等等。

亞歷山大的克力門 *Clement* 乃是第三世紀初葉的教父。他受斯多噶學派的影響很深。他說：『我們以爲良好的東西祇是善人所應得的財產。基督徒是善的，所以良好的東西應當爲基督徒所獨有。然而什麼是財產呢？這不是他所領有和保存的，乃是他所施捨的。這樣，他便富有了。』同時他又說：『金錢之貪慾

是罪惡之防衛。」

死於公元前二二〇年的忒滔良 *Tertullian* 雖然是一個羅馬軍官的兒子，對於政治和經濟，他却提出了兩句極含有反抗性的話。他說：「我們不必參加你們的公共集會，而且也沒有別的東西比政治更爲我們所不了解。」關於經濟，他說：「我們毫不遲疑地把我們地上的東西分給別人。除了妻子之外，一切東西都是公有。」「除了妻子之外」一句話，倒有令人注意的價值，因爲有許多人說：古代教會中，不但財產公有，連妻子也是公有的。康帕內拉 *Campanella* 在他的太陽之城 *City of the sun* 裏說：「羅馬的克力門說：使徒有公妻辦法……忒滔良……說：最初基督徒除了妻子之外一切都是公有，不過做妻子的要服從大家罷了。」這是古代教會不容許妻子公有的明證。

息普立安 *Cyprian* 和忒滔良同時。他說：「凡是從上帝來的，我們都可以共同享受……沒有一種利潤和餽送品是例外的，所以全體人類，都可以在上帝的博施中平均分配……因爲無論什麼東西，凡是從上帝來的，在我們中間，都該共同使用。沒有一個人不是在他的仁慈和賦予之下，那末，全體人類便可以平均地享用上帝的仁義和慈悲了……地下的有產者，把他所得的分給兄弟，而且是自願和公允的。這樣，他便是一個模仿上帝的人了。」大概當時教會還有許多留戀於金錢的人，所以他說：「你是金錢的俘虜和奴隸。你爲貪慾之鎖鍊所束縛。基督曾經把這鎖鍊解除過一次，然而你仍在繹綫之中。」

第四世紀，該撒利亞的巴息力斯 *Basilica* 說：「沒有一件東西的能力可以和財富相抗。一切東西都

在它威權之前俯首。這是他崇拜金錢的意思嗎？不是的。他對於財富下了極大的痛擊。以下是他說的：『你們不是竊賊和強盜嗎？你們所有的麵包是屬於饑民的，你們所穿的斗篷是屬於衣衫襤褸的窮人的，你們所有的靴鞋應該屬於那些沒靴鞋可穿的人，你們所堆積的銀幣應該屬於貧民。你們竭盡能力以加害於多數的人。』根據這情緒，他便提倡財產公有制度，而且又介紹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方式乃是脫胎於希臘來喀古士 Lycurgus. 的法律。他說：『我們是有天賦智能的，但我們所表現的，比無理性的畜牲更為凶暴。畜牲還可拿地上自然的結果來作為公有的東西。一羣羊同在一個牧場上喫東西。一羣羊也同在草地上喫草，但人類却把公有之物當為私有，把一切屬於社會的東西佔領了，……讓我們學習希臘和它那種富於人道主義的生活方式罷。他們的人民，有一種聰明的習慣；就是一切人都住在一間大屋之內，並且共桌而食。』據傳說，來喀古士是斯巴達 Sparta 的立法者，等於希伯來民族的摩西，他的學說影響了整個的希臘。而且從這裏看來，居然也影響了淵源於希伯來文化的基督教。總之，希伯來和希臘文化之互相錯綜，乃是免不掉的事。

奧巴息力斯同時代的克立索斯吞 Chrysostom 描寫耶路撒冷教會的共產生活十分詳盡，而且又竭力的主張着。他說：『他們從來沒有把一部份留着而把其餘的獻給大眾。而且當他們把全部東西獻上的時候，從來不以為這是自己的。他們在豐富中生活着，他們把人類中的一切不平等都移去了，重新制定良好的秩序。我們要明白，倘使人類各歸各地生活着，那所費必多，並且要產生貧乏。我們有一間房子，並且

包含着「一夫一婦和幾個孩子，一個人製造羊毛，另一個人在外面工作，希望得到工錢。請告訴我們，一方面聯合起來，同居共食，一方面各自歸各地生活着，這兩種方法，那一種更爲耗費？自然，分別生活的方法較爲耗費，因爲如果十個孩子要分別生活，那非有十間房子，十張桌子，十個陪伴的人不可，而收入却不會照例地增加起來。」他又說：「現在我們有多少基督徒？不是十萬人嗎？我們有多少窮人？我不相信有五萬多人。倘使給他們吃，每天要多少？倘使他們同桌吃飯所費恐怕不多。」

第四世紀中葉的安布洛茲 Ambrose 以私產爲罪惡，以貪慾爲私有制度之始作俑者。他說：「我們的上帝原來要把這地分給一切人，使它成爲公有的產業。地面所產生的，也當共同分配，但人類的貪慾，便把這共產權利分割了。」他又看到私有制度是強權和壓迫造成的，用現代話說，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狼狽爲奸的。以下是他的話：「自然獻給我們的東西，都是公有的。照事實說來，上帝創造萬物，乃是要一切人共同享受，土地也是共有的產業。自然創造的是共有的權利，但強迫的壓制却把它變了私有的權利。」

安布洛茲的學生奧古斯丁 Augustine 恐怕是古代教會中最著名的一個教父。其時，北方蠻族越過阿爾卑斯山 Alps 把羅馬劫奪了去。在這政治混亂的時候，奧古斯丁的名著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出世了。在這書裏，他主張一切公有。同時，當他解釋詩篇第八十一篇的時候，他說：「親愛的人啊，你們要思想。因私產之存在而人類中之訴訟，仇敵，不睦，戰爭，爭論，犯罪，過失，邪惡，殺戮等等也存在着。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擁有了私產。所以，兄弟啊，我們要禁止私有財產的佔領，倘使這不能，那貪慾是應當禁止的。」在另一

個地方，我們找到同樣的話：『假使我只取必需的而不取別的，那我們便可綽綽有裕。他供給你多少，你只需要夠用就是了。遺下來的便是別人的必需品了。所以富者之餘潤，就是貧者之必需。你爲上帝的緣故，用夠就是了，決不可爲滿足貪慾起見而多取。』正當這時候，北非洲發生了一種反抗大地主的運動。奧古斯丁反對這運動。那末，奧古斯丁贊成大地主嗎？不是的。他所反對的不是這運動的經濟立場，而是這運動對於政治和教會的態度，因爲奧古斯丁根本是一個擁護當時教會的人，並且現代所謂的政治經濟他從來沒有領教過。

二 中世紀的社會主義

普通寫社會主義的，多半把中世紀略過了，因爲就大體論，社會主義是淵源於宗教的，君士坦丁的勝利，使教會也資本化了，教會中既然沒有社會主義之可言，要在教會以外找社會主義之痕跡，那真難乎其難了！這是一般社會主義之作家把中世紀略過的原因。

雖然如此，在與羅馬教會似有關係而沒有關係的修道院中，以及羅馬教會所認爲左道旁門的非正宗教團體中，我們却聽到了幾次爲社會正義而發的呼聲。

四八〇年至五四三年的本泥狄克特 Benedict 是這些挽狂瀾於既倒的修道士之一。他在意大利的奧西諾 Ossino 山上建立了一個寺院，並且立下了三種規律：第一，凡是遁世的人，都應該盡其所能，以

從事於徒手工作；這徒手工作的目的，乃是在求生活上的共享。第二，修道士不能結婚。第三，這凡加入這團體的，須經若干年的共享生活，方得脫離。

過了幾百年，到九〇〇年，大概因為修道院生活又腐化了的緣故，在克呂尼 Cluny 的修道院中，又發現了幾條比以前更切實的規律，比如：（一）沒有一個修道士可以有財產；（二）一切修道士，祇准住在公共宿舍中，此外，不得再有床鋪；（三）一切爭論，賭博，狩獵及女性的探訪，都該禁絕。

不絕如縷的社會主義的嘗試，不是限於極少數的修道士，就是他們的嘗試是沒有理論為依據的，在我不分離和日益噴發的教會面前，何濟於事？這種大規模和以理論為根據的社會主義的運動，一直到了十二世紀，方才發生，其領袖為夫羅立斯 Bernard 的約阿喜謨 Thomas。約阿喜謨生於意大利南部，時為一一三〇年。在十字軍時代，他到過猶太，參謁過聖地；在那裏他決定了他以後的計劃。回來後，在喀拉布里亞 Calabria，他組織了一個團體，這團體的特點是共享生活和克慾生活。他把世界史分為三個時代：第一是聖父時代，在這時代中，上帝用恐懼治理世界，把人類作為奴隸；第二是聖子時代，其特色為上帝的訓練和人類的勞作；第三是聖靈時代，那時，我們便要有自由和快樂了。社會主義的實現，到了第三個時代才能成功。約阿喜謨著作很多，其最重要者為永久之福音 Evangelium Veritatis。這書便做了中世紀最著名的社會運動——法蘭西斯派 Franciscans——的基礎。約阿喜謨的從者以為永久之福音乃是新約聖經的替代，所以近代神學家芮農 Renan說：中世紀的所謂異端，其趨勢有二：第一以永久之福音為根據，其內容為

神祕的社會主義。起初永久之福音一書並沒有什麼惡的影響，因為約阿喜謨自己始終肯定在教會中他是一個擁護者，不過到後來，一切非正宗派的人，都以永久之福音為根據了，於是教會便把這書打入異端之列。

阿栖栖 *Abbas* 的法蘭西斯 *Francis* 就是上面所說的法蘭西斯派的創造者。他生於一一八一年。他父親是一個很有錢的商人。所以法蘭西斯在少年時代所過的生活，乃是一種執袴子弟的生活。這種生活繼續着，一直到他生了大病才止。於是他便退到荒野地方，寂然獨處，不絕地禱告。這便決定了他此後專為貧病而服務的生活。有一次，一種內在的聲音對他說：『你宣傳的時候，應當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馬太福音十章七至十節。）

一二〇六年，他找着了十二個門徒。不久，信從他的人，日益增加。他把以下的話再三囑咐他的學生：『我的手工作着，而且將來還是要這樣地下去。我切實希望衆弟兄仍然從事於適當的工作。你們應當避免教會，房子，和一切應酬，因為這一切是會叫你們厭惡『神聖的貧乏』的，雖然『神聖的貧乏』確是我們所寶貴的規律。你們應該在地上款待賓客，和參謁聖地者，以及遠來的人。我勸告一切弟兄，勿向羅馬教會呼籲，……無論如何，都不應該。』

一二二六年，法蘭西斯死了。於是在他學生中間便發生了爭執。最左者仍然主張為福音而貧乏。最右

的却把這爲福音而貧乏的原則捨去了。一二四七年，法蘭西斯派選出了一個左翼的人，作爲他們的領袖。這就是巴爾馬 Patria 的約翰。他深深受了永久之福音的洗禮。他一方面竭力貶抑當時的教會，一方面又說約阿喜謨乃是所謂第三個時代的先知。不久，他便被罷免了。

隨之而起者爲奧坎 Ockham 的威廉 William。他是一個英國人。在政治，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把民主主義應用在經濟上。他居於法蘭西斯左右兩派之間。他說：私產制度既不始於宗教法，也不始於自然律，祇有在民法中才有其相當之地位；而且這是人類墮落後之結果。他說：國家和私產祇有在人民批准之後，才算合法。因爲人民的最高威權是自然律，所以祇有人民說他們要有一種以國家和私產爲基礎的社會秩序，國家和私產在某種程度上，才算是自然律所批准。這話叫我們想起了民約論。

除了以上所舉的修道院，約阿喜謨和法蘭西斯派之外，更有所謂純潔派。關於這一派的理論和行動，除了反對者的記述之外，沒有別的材料，可以作爲我們研究的根據，因爲他們自己的著作，都爲當時教會所焚燬和沒收了。以下是反對者口中的話：（一）阿雷納司 Arena 是十二世紀的神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反對純潔派。在這書裏，他說：『純潔派以爲婚姻制度是反對自然律，而自然律乃是決定一切東西應該公有的。』（二）十三世紀有八十個所謂講異端的人，他們的罪狀有六十條之多，第十五條說：『因爲這些講異端的人，想要得到很多的供給品的緣故，所以他們把一切東西都交給了一并公共商店。』後來教會到底把他們定了罪，說他們把金錢寄給他們的領袖，以增長反教會的勢能。（三）有一個羅馬教的聖者，叫巴

爾拿 Bernard。他是一個極有力的反純潔派者。但是在有一個地方，他却作了以下的見證：『如果你攷問他們，那你便知道沒有一個人比他們更表現着真正的基督教的精神……他們言行一致。純潔派的信徒不騙人，不壓制人，不打人。他的臉面慘白，這是因齋戒的緣故。他們從不喫由懶惰而得來的麵包。他們靠自己的手工供給自己。』

在教會淫威之下，純潔派却還是蔓延着，並且形成了安諾德派 Arnoldists，卑謙派 Humilis，使徒兄弟派 Apostolic Brethren，阿爾比根斯派 Albigenses，土地公有兄弟會，Brethren of Common Lot 等等。

那末，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是不是完全不依據於理論的嗎？他們所依據的理論是什麼？與中世紀社會主義正相對峙的有多米尼加派 Dominicans，其中最著名的爲阿奎那 Thomas Aquinas。他生於一二二七年，死於一二七四年。他把希臘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從一二六〇年到一二七〇年，足足用了十年工夫，譯爲拉丁文。以前亞里斯多德著述中流行的，祇有一些關於邏輯學，物理學，和形而上學的作品。自從阿奎那之後，他的政治學和倫理學也爲當時人所熟習了。在這兩種著作中，我們找到了反柏拉圖，反社會主義和反自然律的原理。照這兩種書看來，私產制度是自然的，私產制度比社會主義對於人性更爲適合。這種學識支配了阿奎那的思想，並且也作了中世紀反社會主義者的理論的根據。

三 自威克里夫至謨耳間的社會主義

當然，亞里斯多德和阿奎那的學識，在於掠奪者，確是一種很好的工具。若斷若續和拘於一隅的社會主義的嘗試，是不足以喚醒當代資產社會的迷夢了。於是乎有中世紀末葉的大規模和足以震撼全歐的革命運動；其領袖為英國的威克里夫 *Wycliffe*，波希米亞的虎斯 *John Hus*，和日耳曼的路得 *Martin Luther*。

現在我們先從威克里夫說起。從宗教歷史看來，他是一個宗教革命的倡導者。他要把英國從教皇統治之下奪下來。從經濟歷史看來，他又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擁護者。一三八一年，在英國不是有所謂農民革命嗎？威克里夫就是造成這革命的遠因之一，因為沒有他那種社會主義的主張，和他的信從者，如波爾^二等的領導，農民是不會暴動的。不錯，在農民真正攻打倫敦時候，威克里夫並沒有參加；那末，我們可以說威克里夫不表同情於農夫嗎？不。他根本反對武力，反對暴動，他以為人類道德，一經提高，私有制度不擊自破。所以威克里夫不參加農民運動，乃是手段問題；至於社會主義之應當實行，在威克里夫思想中，那是毫無疑義的。以下是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辯護。他說：『社會主義並不是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之所以優於個人主義的經濟，恰巧像普遍真理之優於特殊真理一樣。當然，亞里斯多德反對柏拉圖的共產學說是不錯的；但倘使他的反對祇限於公妻的實施，那才有效。社會主義決不會使國家衰弱。反之，社會主義例可增加國家的力量；……一般的利益才會促進統一。統一就是力量。』

英國農民運動的真正的領袖不是威克里夫，而是他的學生波爾。波爾生性激烈。他對於當時經濟制

度的反感是『當亞當耕種，夏娃紡績的時候，誰是紳士？』他的社會主義的宣言處處流露出他的反抗精神。他說：『善良的民衆啊！一切事體，在英吉利是不會行的，是永遠不會行的，除非一切貨物都歸公有。等到沒有了佃奴，沒有了紳士，我們才能平等，因為那些被稱為地主的，有什麼理由可以榨取我們的脂膏呢？他們怎樣擔當得起呢？他們為什麼把我們束縛着？倘使我們是從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就是亞當和夏娃遺傳下來的，那末，他們怎能夠確定證實他們比我們更配做主人呢？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叫我們工作，叫我們生產，以供他們的揮霍。他們所穿的是天鵝絨和用銀鼠皮裝飾着的衣服。我們所穿的却是粗麻布衣裳。他們所有的是美酒，是丁香，是細麵包；我們所喫的却是粗麵包，是腐爛的肉，是草，是淡水。他們所有的是輪奐大廈，是寬大的領土；我們所得是辛苦，是工作，而且還要在田裏櫛風沐雨地幹着。他們的驕奢淫佚是從我們劫奪去的。我們的勞動造成了他們的驕奢淫佚；但是我們只稱得佃奴。倘使不遵着他們的吩咐而行，便要挨打。』這種如火如荼的精神，驅策他，叫他做了農民革命的急先鋒。在當年六月，他領了無數農民和工人，如臨大敵地向倫敦出發。在進行之際，貴族和僧長的堡壘都被劫掠了。當時英皇已經躲避了。十四日，英皇和農民見面。他們要平等和自由。英皇統統接受。於是大部份農民就回去了。這便引起了十七日的慘劇。英皇的允許何嘗出於誠意。他不過要用這方法來遣散羣民就是了。他們的領袖波爾就在這時候就義。

以上是英國的情形。不過威克里夫的社會思想何止於英國一隅！其為歐洲各國所採納，乃意中事。第一個受影響的國家就是波希米亞，而其代表則為虎斯。

虎斯生於一三六九年，出身貧寒。一四〇〇年受牧師職。一四〇三年他開始攻擊教會。他和威克里夫一樣，主張教會應該安貧樂道。他又反對教會對於赦罪的辦法。越四年，柏勒格 *Pelego* 大學全體教授都成了他的反對者。一四一三年，教皇把他逐出了教會。同年，在大會前爲自己辯護。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死於火。

從表面上看來，這簡單的傳說，沒有告訴我們什麼，因爲虎斯自己並沒有提出社會改造的具體辦法。在實際上，他却做了以後數年波希米亞社會革命的導火線。所謂『虎斯戰爭』就是以他爲根據的。

虎斯派，簡單說，有左右兩翼之不同。右的叫做酒杯黨，左的叫做他保耳黨。酒杯黨祇希望沒收教會的財產，減少教會的氣燄就是了。他保耳黨却不然。他們所期望的是澈底的社會改造。酒杯黨和他保耳黨在經濟立場上，雖有左右之分，但是對於教會，却一致地表示不滿。他們的人數，與日俱增。這便引起了一四二〇年三月的十字軍戰爭。希奇的是十字軍五次進攻，屢爲所挫。一四二七年，虎斯派採取攻勢，並且把許多鄰邦都征服了。一四三三年，教皇鑒於虎斯派之如火燎原，無法可施，乃變更方略，提出和議，其內容爲教會財產之沒收，同時應許在禮拜時候可以用捷克語，這就是『柏勒格和約』。這在於酒杯黨的確是一種勝利，但其不能使他保耳黨滿意，不言可喻。那末，究竟他保耳黨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以下是貝耳在他的社會鬭爭和社會主義的前驅者 *Social Struggles and Socialist Forerunners* 中的一段話，他說：『他保耳黨很熱烈地傾向於原始基督教的教義。他們的生活正像耶路撒冷最初的基督教。他們心中清潔。大

家都懷着一種如兄如弟的精神，一切因地位和產業而造成的區別都消滅了。他們不知道『你的』和『我的』。十九世紀奧大利亞詩人彌仙尼亞 Alfred Meissner 對於他保耳黨的素描是如此的，他說：『一切都住在一個樣子的房子中。他們彼此親近。鄰舍與鄰舍互相扶持，彼此聯合。在會堂中，坐在一個樣子的桌子前，穿同樣的衣服。在他們中間，無所謂『你的』或『我的』。一切財產，概歸公有。……一部份人在野外從事於和平工作。其他一部份人乘馬負劍，欣然離鄉，從事戰爭；而且他們還充滿着克服世界的迷夢呢！』在他保耳黨中，更有一部份人，他們是左而又右的。他們竟然以文化為不足道，並且主張裸體。總之，他保耳黨的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很可注意的。可惜因為『柏勒格和約』，他們便成了衆矢之的。過了六個月，左右兩翼的內戰爆發了。他保耳黨陣亡的有一萬三千人之多。結果，波希米亞的下層階級重復陷於原有之地位。

從表面看來，路得不過是一個宗教改造家。他對於日耳曼的農民革命，不但沒有參加，而且加以反對。這叫我們想起威克里夫對於英國農民革命的態度。雖然如此，路得在一五一六年發行的日耳曼神學，却做了以後日耳曼全境社會革命的前驅，雖然這論文的态度是很和平的。所以我們要敘述日耳曼社會主義的運動，非從路得着手不可。

路得的宗教革命，引起了許多派別。其中最激烈而以社會主義為立場的是再洗禮派 Anabaptista。起初，他們都是路得的信從者，因為在宗教方面，他們差不多是一致的。後來，他們向路得倒戈了，因為照他

們看來，路得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對於無產的農民他是沒有興趣或至於仇視的。再洗禮派的代表爲法蘭克 Sebastian Frank，曼沙爾 Thomas Munzer，馬地斯 John Mathys 和保克爾孫 Robert Bockelson。茲分敘之如下：

法蘭克生於一五〇〇年，死於一五四二年。他是一個牧師。一五二八年，大概鑒於勞働神聖的緣故，他把牧師的職務辭去了。他以手工供給自己，有時從事印刷，有時製造肥皂，有時寫作，總之，他的目的是自食其力。一五三四年，他發表了他的對論 *Paradoxes*。在這書中，他所舉的對論有二百八十條之多。第一百五十三條的總題是社會主義。他說：『公共是純潔的；「你的」和「我的」是不純潔的。』以下是他對於這意思的解釋。他說：『我們應該把一切東西，付諸公有，比如日光，空氣，雨露，霜雪，飲料等，都是公有的。這在克力門第五封書信中已經說過了。……凡是公有的，都是純潔而與上帝的形像相同的。個人使用和個人財產，如今雖然殘酷地打入了一切人類的耳中，在原始時代，一切東西，却是公有而不可剖分的。這種音節與原始人的聽覺，很相符合，因爲這音節是由上帝的手指寫在他們心上的。……世界以公有爲不純潔；上帝却以公有爲純潔。日耳曼神學第五十一章已經證明物品不是利己的。倘使物品公有了，那便無所謂私產，無所謂地獄。因此，聖靈叫古代教會，就是上帝的純潔的團體，一切物品，都歸公有。……這種團體叫做 *Quere*。這就是把一切東西全歸上帝，付諸公有的意思。這情形到克力和門忒滔良教父時代，還很流行。……這並沒有嚴格的法律，各人儘可自由定奪，像保羅一樣，他永遠不爲人制定法律。……最高貴的東西，就

是最足以公有的，最足以公有的東西，就是最高貴的。……所以你可知道，利己主義和私產制度是違反自然的，與創造自然的目的，也有抵觸。』這是法蘭克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他沒有參加過實際行動。他的貢獻是寫作。

曼沙爾却是一個絕對不同的人了。他是一個革命的行動者。他短小的身材，烏黑的頭髮，強有力的眸子，和滔滔不絕的雄辯，處處證明他是一個特立獨行，一往無前的革命者。他和法蘭克同時。一五一九年，結識了路得日耳曼神學和約阿喜謨的著作，決定了他為社會正義而奮鬥的命運。路得的目的在使聖經替代教皇。曼沙爾的目的在於聖經中尋找社會主義。這樣，他便和路得分裂了。以後，有數年之久，他天天在衝突和掙扎中度日。他失去了原有牧師的職務。但是他內心的燃燒，不絕地催促他，要他為社會主義而宣傳。他竭力向貴族，統治者，和資產階級攻擊着。因此，他便大大地得到了農人和礦工的同情。其時，在陸爾豪增 Muhlhausen 地方，有一個宣教師，名普淮斐 H. Pfeiffer。他煽動了當地的下層階級，要他們起來，向長官和祭司提出反抗。革命的陸爾豪增便把曼沙爾吸引去了。孰知他的老師路得，現在是已經不承認他的學生曼沙爾了。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當地有權威的人，禁止曼沙爾在那裏宣傳。然而富於反抗性的曼沙爾難道這一紙公文所能嚇退嗎？一五二五年，日耳曼農民革命爆發了。當然，曼沙爾就是這革命的領袖。他們發表了一個宣言，其大意如下：

第一，我們希望把選擇牧師之權，歸於團體；如有不稱職之處，撤換之權也應操之於團體。這是我們全

體的意見。由團體選擇的牧師，應明白地宣傳福音，不必把教義和儀式摻雜進去。

第二，根據聖經，什一捐我們是願意貢獻的。我們要把這捐獻給上帝和他的僕人。如果一個牧師明白地宣傳福音，那末，我們情願把這捐交給他，作他贍養之用。若有所餘，那應當分給窮人。如更有所餘，那應該收藏起來，以作不時之需，比如戰爭的時候，因為到那時候，土地不能生產了。至於家畜的什一捐，我們不能再納了，因為上帝造了家畜是專為我們應用的。

第三，到現在還存留着的農奴制度是深為可悼的，因為基督已用他自己的血把我們贖了出來，無貧無富，無賤無貴，一概在內。從聖經，我們知道人類是自由的，而且到將來，也應當自由。我們並不是不要統治者，因為聖經還沒有這樣教訓我們。我們不應該放任我們肉體上的貪慾，我們要善待鄰舍，把他們看為弟兄。我們要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也要怎樣待人。

第四，按照現行法，窮人沒有遊獵，捕鳥和釣魚之權。這在我們看來，是很不對的。這與弟兄之道，不無牴觸，因為當上帝造人的時候，他已把統治一切生物之權，交給我們。

第五，我們的地主把一切森林據為己有。如果一個窮人需要木材，他要拿雙倍價錢向地主購買；我們却以為森林木材都該歸為公有。

第六，我們還有一種不平，就是我們所擔負的服役太重了。我們希望今後所得到的是仁慈。我們祇能夠照着上帝的話而服役。

第七，自今以後，我們不再受地主的壓迫了。但因為地主是土地的領有者，所以應當按照契約，向我們收租。地主再不能夠強制我們壓迫我們，也不能夠向我們要求新的服役。祇有在農民情願的時候，地主才可叫他服役，而且還應當不妨礙他的工作。

第八，我們有很多人，雖然耕種，但得不到相當的代價。這是我們一種極重的壓迫。這樣，農民便把應該隸屬於他們的東西失去了。所以我們希望地主立下一個正常的代價，使農民不致徒勞無功。

第九，我們爲着各種新訂的罰規，受了極大的痛苦，因為連極輕的罪過，也須處以重罰。他們處分我們，不按照事體的本身，有時由於仇視，有時由於不正當的待遇。我們的處分應當照着古代的成文法和事體的本身，不應照人之喜怒而定懲罰之輕重。

第十，草場和可耕的地，原來是公有的。後來，却爲私人佔領了。因此，我們覺得非常不平。我們應該把這些地方重歸公有。以前不是用正常手段買來的，現在却應當根據友愛和雙方的同意來解決了。

第十一，我們應當規定既死者的債務，都該豁免，而不致使孤兒寡婦，聽人劫奪。

第十二，最後，上面各條，有不依據上帝的言語者，一經理性和聖經的證明，我們必立刻取消。

這是一種多麼合理的要求！但是不到半年，這運動在四面楚歌的壓迫中完全失敗了。就是路得也在壓迫者之列。而且三運動失敗的情形，很是可慘。被殺農民，有十三萬之多，其領袖，沒有一個是幸免的。曼沙爾的殉難，就是在這時候。

一五二五年失敗之後，再洗禮派信徒都逃亡到蒙斯德 *Munster*。在那裏，他們支持着，有數年之久。其領袖為一個烘麵包的馬地斯和一個縫衣匠保克爾孫。在他們領導之下，再洗禮派勢如破竹地活動着。於最短期間，把蒙斯德佔領了。奧大利亞著名詩家哈麥令 *Robert Hamerling*，借了保克爾孫的口說：『當時祇有一種意志，足以移動他們。祭司和律法師的法律是莫須有的了。任何壓制，任何私產，我們都不要了。婚姻的誓約也沒有了。……你們共同地生活着。你們要服從內在的誠命，還要自省，在你們心裏，有沒有神聖生活的要求和能力？……路得派的教義，怎能夠令我們滿足？他祇把這世界改造了一半，他是不冷不熱的，他生性懦怯，把平民放在貧乏之中，對於顯貴，却阿諛諂媚。』他又借了馬地斯的口說：『弟兄啊，我已熱烈地思想過這事情了。利己主義已經死亡。……我們共同生活着，在郇山之上，共同工作，甘苦相共。現在你們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然後，再從公共的倉庫中，領取你們所需要的東西罷。』從這幾首詩裏，我們便知道蒙斯德再洗禮派生活的一斑了。不過，他們是主張多妻的。這便給了反對者攻擊的機會。於是教會和許多贊成共產制度而不贊成多妻制度的人，都起來，對於再洗禮派下了總攻擊。一五三五年六月，蒙斯德為反對者所陷。明年一月，馬地斯，保克爾孫和其他領袖，於斷頭台上，結束了他們的運動。

第三章 烏託邦社會主義

在哲學方面，中世紀末葉的特點是唯實主義的失敗和唯名主義的勝利。在唯實派看來，真理祇有一種。宗教範圍中的真理，就是人世間的真理。唯名派却說：宗教所認為真實的，在人世間，未必真實。所以真理有兩種：一為信仰的真理，一為科學的真理。唯名主義勝利的結果，在消極方面，是政教的分離；在積極方面，是科學的昌明。從社會主義的立場論，唯名主義的勝利，一方面使社會主義不一定要依附於宗教，一方面使社會主義漸趨於科學化，雖然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到十九世紀才得成立。在這兩種特點之下，烏託邦社會主義開幕了。可稱為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不一而足，茲舉其犖犖大者如左：

第一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謨耳 Thomas More。「烏託邦」這個名詞是他創造的。他於一四七八年生於英國，是一個法官的兒子；所以他所學的是法律。起初，他想要加入法蘭西斯派，但經過鄭重考慮之後，他覺得對於獨身主義一點，恐怕有難於遵守的地方。於是，他便成了家，在倫敦執行律師職務。不久，他就做了國會議員。在商業方面，他是倫敦商人的代表。一五一五年，他的烏託邦脫稿了。當他做議員的時候，英王亨利七世因為嫁女兒的緣故，重斂於民，議會中人，均敢怒而不敢言；謨耳却逞其雄辯，以反對之；議案遂被否決。亨利八世和他很為相得，但是毫不徇情的謨耳，終究不能久安其位。結果，爲了反對亨利八世

離婚，於一五五三年，死于非命。

一五一五年寫的烏託邦並不是偶然的。當時，新大陸發現未久，這發現喚起了許多人的幻想。所以那時候類似烏託邦的那種書，不一而足，比如味斯浦奇 Amerigo Vespucci的新世界。這在一本小冊子；在這小冊子中，有一個探險家把他旅行中的情形描寫着。比如說：『一切人都按照自然度日。我們與其稱他們為斯多噶派，還不如稱他們為伊壁鳩魯的確當……他們沒有財產，一切東西都是公有。他們沒有君王，無論什麼統治者都沒有。各人自己便是主人……金子，珍珠，寶石，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就是在歐洲是要稱為財產的一切東西，他們不但一些兒也不要，而且還是討厭。』這一類話，對於富於理想的謨耳，確是一種鼓勵。他寫烏託邦的動機，就是在此。

烏託邦這本書分為兩部。第一部份是社會的批評。在這一部份裏，著者把十五世紀的英國政治和以私產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攻擊得體無完膚。第二部份是建設的。在這裏描寫着模範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烏託邦的角色有三。其主角為海都地 Raphael Hythoday。他是一個不妥協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者，是烏託邦的發現者。其次為季耳 Peter Cirio。他對於現有制度表示滿意，是反社會主義者。第三是謨耳自己。他處於海都地和季耳之間。

現在我們看謨耳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政府的黑暗——（一）執政者用卑鄙的手段去擴充他的領土；在擴充之後，怎樣管理這些領土，他

們却不顧了。(三)做小竊的得不到掙錢的機會，不得已挺而走險；但是到後來，竟於非刑之下犧牲了他們的性命。(三)有錢的人揮金如土，毫無所成；他們雖擁有財產，充滿了快樂，但他們左右前後的人，却在那裏呻吟叫苦。(四)國家擁有軍隊，其結果則為戰爭，則為流血。

私產的罪惡——他說：『倘使所有物變了私有，那末，我想要把國家按着正義去治理，使國家發達，這實在是一件很艱難或至於不可能的事了。除非你們以為一切東西都歸入了惡人手中，正義才有表現；一切東西都給少數人瓜分了，人類才能繁榮。但是實際上，那少數的人，未必便能得着豐富的生活，而其餘的人，都因此變成很苦，且竟像化子一般了。……按大體論，多數的窮人，比少數的富翁，更配享受安適的生活，因為有錢的人是貪婪，狡猾，無用。反過來說，窮人雖然下賤，雖然簡單，但因為他們天天勞動，而且他們對於國家的利益，比他們對於自己的利益還多，所以我們十分相信，倘使私產制不能廢止，那末，貨物的分配，斷不能得其平衡，斷不能得到公正；而且人類中間，也斷不會有充分的富裕。反過來說，倘使私產制度仍然存在，那末貧窮的重擔，而且是免不了的負擔，一定繼續地落在大多數的人和最良善的人肩頭上。』

生產的合作——從第二卷起是烏託邦的描寫。謨耳認定農業是立國之本，而且農事的分配是要根據於合作的原則的。在全國中有很多農場，每處男女各四千。其他是城市中的工人。到了秋收的時候，城市的工人應當到鄉下去幫忙。所謂農工以及執政者，僅職務上之區別。無論誰，每天祇要有六小時工作。

分配的合作——城裏和鄉下的貨物，每月交換一次。這是謨耳的意見：『每家做父親的，可以按着自

己和他一切人的需要，把貨物帶走……他們既然看見貨這樣多，那他們就沒有超過他們的需要而要求之虞了。既是一定不會缺少的，那末，爲什麼我們想人們在足衣足食之後還有所要求呢？在一切生物間，祇有畏懼或缺乏才可以引起貪得無厭之野心。在人類中，祇有虛榮心才能使人們想起在莫須有和虛浮的事情上勝過旁人而引爲體面……有什麼生活比享樂和剛剛足夠的生活更豐厚呢？有什麼生活比沒有焦急，沒有憂慮，不用顧自己的生活，不爲妻子急切的哀聲所麻煩，不爲兒子愁窮，不爲女兒的粧奩擔憂的生活更豐厚呢？」

錢幣的無用——烏託邦說：有一次有幾個大使從外國來。他們看見那地方的平民，便恭恭敬敬地向他們行禮，因爲他們佩帶着金飾。後來那地方的孩子，「看到了大使的帽子上，也插着同樣的東西，他們就在母親的旁邊打趣着說：『看哪，母親啊，這真是一個傻子，因爲他還是戴着珠子和寶石，似乎他還是一個孩子哩！於是母親很懇切地說：『孩子啊，別作聲！我想他是大使中的一個馱子。』」謾耳在主張把錢幣廢止的時候，提出了一句極嚴重的話。他說：『一個蠢笨而空無所有的粗人，像驢子一般地無知，像惡徒一般頑皮的人，居然也會有許多聰明的人爲他所統治，爲他所束縛；這只是爲了他有一大堆金銀的緣故。』這話對於無產者，多麼挑撥呀！

喫飯的時候——在中飯和晚飯時，他們有掌號者把一切人召集在食堂裏。那裏有保姆，使做母親的，在喫飯時候，可以方便些。在指定時間，每條街的管事，把一切東西從市場上領來，交給婦女，要她煮起來。喫

飯時，先要唸一篇關於修身的書。在晚飯時，還有音樂。如果有人要在自己家喫飯，那也可以；不過謨耳說：『沒有人情願這樣地幹，因為他們在鄰近的食堂中，既然可以獲得一切甘味，那在家裏辛辛苦苦地預備粗飯，不正像馱子嗎？』

政府的組織——從每三十家人家中公推出一個區長，從每十個區長中選出一縣長，再從縣長中選出一個君王。他的任期是終身的，直等到他有了壓制人民的嫌疑為止。如遇大事，那百姓把這事先送到區長那裏，於是由區長通知區內各家，經他們自行斟酌之後，然後報告會議。區長主要的職務乃是在留心觀察，不使百姓閒着，也不使他們過於疲勞。

軍隊的訓練——謨耳雖然說軍隊是危險的，但在烏託邦裏，他仍然主張軍隊是需要的，其目的在攘外，並且也可以藉着軍隊的力量，援助別的國家，脫離暴政。此外，軍隊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有許多擁有土地而不肯耕種的國家，一方面不肯自己耕種，而一方面又不許烏託邦人向那裏移居，對於這些國家，非用武力不可。

家庭的情形——烏託邦所採用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婦制。犯姦淫的要受嚴厲的懲罰。結婚前的貞操乃是極重要的條件。所以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男女在求婚的時候，必須赤身裸體，以示相知之深。等到結婚之後他們就同居。至於所住的房子，那是公家的。每十年用拈鬮方法掉換一次。房子裏的東西，沒有一件是私有的。所以，夜不閉戶乃是一件極尋常的事。

第二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康帕內拉。他於一五六八年生在意大利。在幼年時代，他已經表示他研究哲學的天才。他是一個僧正。他反對亞里斯多德。同時，他也是一個十分活動的政治家。他要把西班牙在意大利南部的勢力，加以顛覆，而建設一個獨立國家。不幸，這隱謀洩漏了。他被禁有二十七年之久。他的太陽之城，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後來，他結識了駐羅馬的法國公使。他潛入法國使館，從那裏逃到巴黎。一六三九年，死於巴黎寺院。

太陽之城這本書，康帕內拉自己承認是脫胎於謨耳的烏託邦的。其體裁為對話。太陽之城的首領是一個深通哲理的祭司。在他以下有權力、智慧和仁愛三人。權力所掌管的是戰爭，智慧所掌管的是藝術和科學，仁愛所掌管的是人種問題。以下是這書的重要點：

優生學——女子的性的開始為十九歲；男子則為二十一歲。到了這時期，「仁愛」頒布一條命令，祇准體魄康健和精神煥發的男女可以發生關係。不健全的男子，祇能和不能生育和已經懷孕的女子交接。他們配合的方法是：美貌的和美貌的配合，健壯的男子和清瘦的女子配合，精神勞動而固執的男子和富於情感而美麗的女子配合，多血質的男子和小心翼翼的女子配合，富於理想的男子和喜歡交際的女子配合。配合後，每星期祇准性交兩次。性交之後，男女都該沐浴，而後禱告，求上帝賜他們一個健全和美麗的孩子。

兒童教育——所謂兒童教育，乃是合胎教而言。在懷孕時，婦女要受醫生監護，在臥室中，設置富有熱

術性的照片和雕像，以資觀摩。產後，經醫生允許喂奶，喂奶以兩年為期。斷奶後，交給看護。無論男女，均須受體育訓練。此外還有關於地理學、天文學、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等等的視覺教育。哲學，到長成之後才能學習。看護把各個兒童的興趣報告長官，作為他們擇業時候的根據。

共產生活——太陽之城的居民，無論男女，都須工作；惟笨重工作，則以男子為之。每日工作時間為四小時。衣食住一律平等。國內交易，不用貨幣；祇有在國外貿易時用之。農耕時，號筒一鳴，無論男女，均一律集合，從事耕作，播種，收穫等工作。二十歲以下為子，二十歲為兄弟，二十歲以上為父。四十歲以上，不必工作，只要擔任指揮和管理之責就是了。工作餘暇，則從事娛樂及研究。

除了太陽之城之外，康帕內拉對於當代又提出了一種特殊的貢獻。這就是他的社會主義的辯護。這種辯護，就是到二十世紀的現在，也還可以用得。其大意如下：

或曰：社會主義反對人類本性。康帕內拉却說：社會主義非僅為理想的，而且也是可以實行的。使徒時代耶路撒冷的教會，就是社會主義的。羅馬教的祭司，都以社會主義為生活的標準。克力門安布洛茲克里索斯吞等教父，沒有一個不贊成柏拉圖的理想國。

或曰：社會主義毀滅工作之動機。康帕內拉却說：私產制度的工作動機是利己的；其結果為貪慾，憎恨，妒忌等罪惡。太陽之城的社會主義的團體以道德為主，道德的愛慕就是工作的動機。

或曰：女子公有是反背自然和不道德的。康帕內拉却說：祇有戕賊種族，才謂之違背自然。虐待，姦淫，和

雞奸才是反自然的。女子共有不在此例。這制度對於任何人沒有害處，所以是自然的。還有，女子公有又違背道德。所謂公有，並不是放縱的意思，乃是有法律上之規定的。用這規定來謀社會之幸福，有什麼不道德呢？

在康帕內拉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當代唯名主義的勢力，因為唯名主義每每會造成雙重人格。比如康帕內拉一面嚴守寺院生活，一面又從事於政治活動；一面信仰教皇的威權，一面又說出像女子公有那種極富於自由性的話。

第三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巴倍夫 *Babouf*。他是法蘭西一切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中間最激烈的一個人，生於一七六四年。他父親是一個軍官。在十六歲那年，他的父親死了；於是乎他便棄學而於勞働中謀生存。當時法蘭西舉國騷然，所謂雅各賓黨 *Jacobin* 及其他社會革命者，都是這時代的產品。當然，這革命情緒對於秉性激烈的巴倍夫再適合也沒有了。他和波那洛底 *Bonald* 及其他五個人，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發表了許多革命論文。以下是著名的『巴倍夫叛亂』宣言的大意：

(一) 自然給各人享受一切幸福的平等權利。(二) 社會之目的在防護強者和惡者對於這平等的侵犯。(三) 自然給各人以勞動之義務，凡是要逃避這義務的，都是罪人。(四) 享樂是全人類所共有的。(五) 因為勞逸不均和貧富懸殊的緣故，壓迫便發生了。(六) 為免除一切社會病態起見，土地和工業的私有制度，都該廢止。(七) 有錢的應當把他的剩餘散給窮人，否則他就是人民的公敵。(八) 教

育也是人人所共有的。

一七九六年四月，在巴倍夫指導之下，有七千多人結合了，準備發動。不幸，其中有一個人把這消息洩漏了。於是政府就派拿破崙破崙，對於爲首者，加以逮捕；這是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的事。被告六十五人。波那洛底和其他領袖以案情較輕，宣告流放。巴倍夫於被判死刑之後，拔劍自刎，但爲守護者所止，於血花飛濺之中，死於斷頭台上；時爲一七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除了上面所說的宣言之外，在巴倍夫委員所發表的經濟布告 Décret Economique 中，我們更可以找到巴倍夫對於經濟的具體計劃。以下是從經濟布告中摘錄出來的：

關於工作者有：（一）共產團各份子，都應該擔任農業和其他可以勝任的工作；（二）年逾六十歲的人，和殘廢者，作例外論；（三）各種人自選職員，其任務爲指導一切工作，擔負均分責任，發施共管命令；（四）法律規定每日工作時間，時間長短，依時節而異。

關於分配者有：（一）共產團各份子之要求，不得超過職員所規定者；（二）共產團自今日始，須予各份子以舒適和完好的住所，工作和休息的衣服，光，火，飲食，藥料等等；（三）在各處，依照指定時間，舉行聚餐，在團者都得參與；（四）在各處由職員把農工業的生產工具，分給共產團各份子，並須送到他們家裏。

關於錢幣者有：（一）此後，不再鑄造錢幣；（二）國外流入的錢幣，專作向外人購置共產團需要品

之用；(三)不屬於共產團者，如被證明有以錢幣供給共產團之罪，應受嚴重科罰。

巴倍夫的共產是否是一種劇變？德國名著者狄爾 Karl Dietl 在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and Anarchismus 中說：『依巴倍夫的計劃，並不要立刻實現全民族絕對的共產。在共產之外，還可以保存私產。只有一部份人可依共產為生。一切屬於私人的財貨，在領有者死的時候，不免歸為共有。絕對的共產，必須慢慢可以達到。』這樣，照巴倍夫計劃，普遍的共產，斷非短時間所能辦到，一切財產，至少要在數十年之後，才得完全歸為國有。

第四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者是以一七六〇年生于巴黎的聖西門 Saint Simon。他系出望族，是查理曼 Charlemagne 的後裔。年輕時，他在拉法夷脫 Lafayette 將軍麾下，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反抗英國。在那裏，他建樹了中產階級革命的心理。後來，他回到法國，利用官產，爭了些錢。其時，法蘭西革命高潮，方興未艾，這高潮把素以中產階級革命為懷的聖西門引動了。於是他便加入了當時的革命隊伍。以前他是一個公爵，現在却要人稱他為「公民」了。這便引起了當局的猜疑，把他打入牢監。他在牢監中所得到的是什麼呢？他說：當他在繯絏中時，他的先人查理曼向他現身，說：『自從有了世界以來，沒有人享受過這種尊榮。這世界要產生一個無上的英雄和哲學家。這成功在我家裏保存着。我的孩子啊，你在哲學方面的成功，要和我在戰事和政治方面的成功，一般偉大。』脫獄後，在這種啓示之下，他開始致力於學問。現在，他爭的錢已經化了。他每年只得從抄寫中得到二百多塊錢，以維持他的生活。他每天抄寫九點鐘。他應該睡覺。

的時候，他致力於著述。這樣，他的身體壞了。他的僕人過來幫他工作。不幸，到一八一〇年。那僕人也死了。於是他便硬著頭皮求助於人。他說：『我快要餓死了，我單吃麵包，喝清水，如是有十四日之久。在我工作的時候，我沒有火。除了衣服之外，我變賣了一切，以作購書之用。這是一種對於科學和公益的狂熱，是一種慾望，因為我要尋找出一種用和平手段去停止全歐羅巴危機的方法。這使我陷入了這種困苦的境界。因此，我無愧地承認我的困難，並且向別人乞援，以繼續我的工作。』勢利的社會那裏聽得進這種話？在手不停揮和家無隔宿之糧的生活中，聖西門去世了。

聖西門臨死前，有三種重要著作，就是工業制度 Industrial System 工業問答 Catechism of Socialism 和新基督教 New Christianity。以下是他思想的大概：

中產階級的革命——照聖西門看來，技術者，銀行家，商人，農人，要比貴族和僧侶重要得多。後者的財產以征服和強力為基礎，前者的財產乃是他們合法活動的結果。一八一九年，他寫了一個故事。在這故事中，他把前者和後者加以比較。他說：如果喪失了前者，則決不能補償；如果喪失了後者，則其補償，易如拾芥。因為這故事，他竟被人檢舉。有一次，他寫一封信給當時工人階級。他竟然說：『資產階級已經獲得了統治無產階級的權力。其原因不在於他們產業的性質，而在於他們智識的優越。……試看法蘭西在你們的同伴統治之下，會表現些什麼？他們祇把飢餓帶來就是了。』所以，充其量，聖西門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革命者就是了。

社會關係的倫理化——聖西門最出名的著作是新基督教。在這書裏，他說：羅馬教和基督教的武斷，都有不盡然之處；宗教的要素是道德。他說：『新基督應該把「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個原理擴充到現世的組織上去。』他向宗教挑戰，要宗教在社會革命的進程中予以輔助。他說：『社會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立即改良貧苦的生活，宗教對於這目的，應當予以輔助。』從上面看來，在教會中，我們得到兩種現象：第一是教會和貴族及資產階級的狼狽為奸，第二，即使有人主張教會應當恢復使徒時代的共產生活，但是他們的範圍，却以教會為限。聖西門能夠把這「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原則，應用到一般社會的關係上去，並且這原則就做了以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其貢獻未可厚非，雖然我們說他的革命祇限中產階級而已。

智識的重要——從他所寫的故事中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對於智識的重視了。大人先生統統死了，對於一個民族，絕無關係；只有技術人才和有專門智識的人，是社會的生命綫。他肯定：智識階級是勞働階級的自然領袖。比如他說：『貧窮者地位的增進，足以減少有錢人的快樂生活。這祇是表面的情形而已。我要使藝術家，學者，和大僱主們知道：他們的利益和民衆的利益，根本是一致的。後者是勞働階級，前者是勞働階級的自然領袖。』大概，因為當時法蘭西的破壞工作太厲害了，拿破崙連年稱兵，國內呈現着千瘡萬孔和百廢待舉的現象，建設工作乃當務之急，智識者和專門人才之重要，不言可喻。聖西門之重視智識，乃是有根據的。

照各人的才能得到酬報——聖西門並沒有主張共產，這在一八三〇年他的學生們發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到。他們說：『所謂貨物共有，乃是把生產工具和生產效果分給一般人的意思……他們相信人類中間自然的不平等是可以有的……在將來，各人要照他的才能得到位置，並且要照他的工作得到酬報。』他們所反對的是遺產，因為遺產乃是『把社會權利分配給少數人，使大多數人進入貧窮，無知，和苦難。』所以他們『要求把土地，資本，和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共產業，使各人按照他的才能，得到他的名分，按照他的工作，得到他的酬報。』

政府不過是改良社會的機械——他說：愛國主義乃是最卑鄙的東西。政府不過是社會運動中的一個單位，其目的不在袒護甲國攻擊乙國。這是國際主義的第一聲。所以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說：『他超越時代的思潮。一八一四年同盟軍一進巴黎，他便宣稱歐羅巴和平與繁榮之唯一手段就是英法德的同盟……一八一五年，他主張法國與滑鐵盧戰勝者同盟。這決不是具有尋常勇氣的人所能說的。』

第五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他生於法蘭西的柏桑爽 Besancon，時為一七七二年。他的父親是一個布販。五歲那一年，當他在父親店裏的時候，他把貨物的價錢老老實實向主顧說了；因此，他便受了一次責打。十九歲，他的東家叫他把一大宗米倒在河裏，同時，那年年收很荒。第一件代表的是商業中的詭詐；第二件代表的是耗費。這兩件事使他在思想上鑄上了很深的印象，並且決定了他社會改造者的命運。過了幾年，他的方陣 *Planisphere* 計劃發表了。這計劃得不到什麼反應。同時，他

把所有的錢都用了。他跑到英國，希望在那裏找到一個有錢的人幫他實現他的計劃；結果，又沒有人睬他。他每天于一定時候，在寓所裏等候，希望大施主的光降，這樣有十二年之久。到末了，還是空無所得。一八二五年，迫於生計，回到里昂，在一家商店中管賬。翌年，他移居巴黎。有人勸他把計劃修改一下，以迎合當時的需要。他以拒絕的口氣回答說：人各有所長，他的長處在於發人之所未發，也許有許多地方迹近幻想，舍己之所長而強與人合，不是他做的。從這話裏，我們便可以看出傅立葉成敗的原因。在他活着的時候，只有一次他試驗過他的計劃。這就是在維賽爾 *Versailles* 地方的試驗。這是人家送他的一注產業。後來，因管理不得法，這試驗失敗了。他死於一八三七年。

所謂方陣計劃是什麼？以下是方陣的素描：

每方陣人數為壯丁四百至二千不等。每方陣有一座公寓，住在裏面的人的主要職業是農業。他們按照各人的興趣，組織團體。每團體擔任一種特殊工作，比如甲團體的工作是種植蘋果，乙團體的工作是種植麥子。在必需時，甲團體的人可以調到乙團體。以前一個人做了兩三小時工作就要覺得單調，現在因為各人的工作以興趣為根據，多做些也不覺得疲倦了。團體與團體間的競爭，還是可以保留；不過他們競爭的目的，不再是個人的利益，而是生產的效能了。照傅立葉算來，如果這計劃可以實行，那末，全社會的生產總數便要多四五倍。一個人在十八歲至二十八歲中所產生的，儘可以夠他一生的享用。馬房和堆棧，居方陣中心。軍警，囚犯，和律師，在方陣中，是沒有的。方陣的總機關在君士坦丁堡。普通人所說的政治，在方陣計

劃中，是沒有的。生產的分配，以勞動、資本、天才三者為根據。他把生產分為十二分。五分歸勞動，四分歸資本，三分歸天才。在方陣中，兒童教育是一種很重要的工作。有人甚至於說傅立葉乃是現世幼稚園教育和童子軍的先師，此語不為無因。

根據以上，我們得到了幾個觀察：（一）合作的生產效能，比之各自為政的生產效能要大些。（二）各盡其能，比之用非所學要自然些。（三）社會改造須借助於兒童教育。（四）傅立葉在分配方面，不主張絕對平等，不過勞動的多得些罷了。

以下是他的哲學：

文化已經發生了流弊——傅立葉把人類史分為七個階段。第一是自然的階段。這階段的特色是埃田園。在那裏，有自由和平等以及物質上豐裕的享受。第二是奴隸的階段。自從始祖出了埃田園之後，劫掠和糧食的缺乏便發生了。第三是父權的階段。父權的結果是私產的成立和婦女的商品化。第四是封建主義的階段。這是中世紀的情形。工商是自這時候發展的。第五是文化的階段。其特色為商業的無政府狀態，家庭關係的破裂，有錢者的為富不仁，無產者的備受壓迫，政治機關的經濟化等等。第六是「保證主義」的階段。在這階段中，少數有錢的統治全國的經濟力量，工人們也得到生存的保障。第七就是社會主義的階段。現在是第五階段，就是文化時代。不過所謂文化，其結果，不過爾爾，這是傅立葉所目擊心痛的。其所以要期待以後兩階段，是因為文化失敗的緣故。

和諧乃一切情感(Passion 苦無適當譯語)的綜合——他說：情感共有十二種，第一是五種知覺，這是關於肉體的。第二是四種羣的情感，這是友誼、愛好、家庭主義、和高尙的慾望。第三是三種支配的情感，其中包含的是計劃、善變、和合一。這十二種情感的綜合就是和諧。和諧就是理想社會的要素。照他看來，現社會的癥結就是十二種情感的畸形發展，或至於壓制。倘使這十二種情感可以平均和自由發展，那末，在社會中我們便可以得到和諧，所謂戰爭、貧富不均等現象，便可以消滅了。他又用牛頓的吸引力來發揮這和諧的意思。他說，牛頓的吸引力不但可以應用在物質上，同時，也可以應用在精神上。社會之所以不平等以及不和諧，是因為我們把這吸引力的途徑塞住了的緣故。這途徑一旦廓清，和諧便可恢復，因為人類根本是互相吸引的。

傅立葉對於婚姻的態度如何？他說：所謂婚姻，除了把女子作為商品以外，沒有別的意義。在商品化的婚姻制度之下，要產生真的忠實，談何容易。虛偽的一夫一婦制度，其結果不是曠夫怨婦，就是姦淫和娼妓。傅立葉主張自由戀愛。他肯定：人類本能中衝動的存在是無可諱言的。這種衝動，非滿足不可。滿足了，然後能夠得到和諧。把衝動勉強抑制是無用的。所以不自然的貞操，乃是萬惡之源。

第六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歐文 Robert Owen。他在一七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生於威爾斯北部，是一個馬鞍匠和鐵匠的兒子。他雖是很努力，但他所受的教育，却很有限。在十歲那一年，他就做了一家裁縫舖的學徒。幸而這裁縫舖的老板有一個精選的藏書樓。於是青年的歐文就不時地在書本中討生活。

了。在滿師的時候，他已與幾家倫敦和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商店發生關係，而且成績也很好。所以到了十九歲，他就做了曼徹斯特一家大棉紗廠的經理。這廠所用的工人有五百人之多，其產品比較普通市價要多值百分之五十。於是歐文在全國紡織界中便飛黃騰達起來了。不久，他轉到了新拉拿爾克 Lanchester 的一個工廠裏。在新拉拿爾克鎮上，居民有一千三四百家，而貧苦的孩子，却有數百人之多，並且沒有受過教育。在工廠中，什麼偷竊，醉酒，和其一切不法行爲，無所不有。大多數人家所居住的只是一間陋室，就是這陋室也很不合乎衛生。這種種情形都呈現在歐文眼前。於是他決意開始他的改良工作。其計劃爲：

- (一) 建設嬰孩護養院，
- (二) 消滅賞罰制度，
- (三) 把工作時間減爲十小時半，
- (四) 取消童工制，
- (五) 注重兒童教育，
- (六) 改良工人生活，
- (七) 補助年老和有病的工人，
- (八) 設立合作商店。

這是他在新拉拿爾克頭上幾年所努力的。

一八〇六年，合衆國禁止棉花出口。英國紡織工廠受了這影響，便不得不暫時停工。工人因之而失業者不知凡幾。其唯一例外就是歐文所主管的新拉拿爾克工廠。在停工的時候，他照樣支付工錢。不過這辦法，在於工人的確受惠不淺，而於股東方面，却發生了煩言。這種內部的分歧，到一八一三年於事實上表現了出來。其他股東表示：與其這樣辦下去，還不如把工廠停止的好。這給了歐文很好的機會。他得到哲學家邊沁 Bentham 的幫忙，竟然把全廠用八百萬金買了過來。而且在四年中間，他們居然賺了百分之百。自然，他的工廠教育計劃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他與這工廠的關係保持着，一直到他到了美國爲止。這是十

二年以後的事。

歐文的工作何止於新拉拿爾克一隅？一八一三年，就是和邊沁合辦工廠的那一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在這論文中，他所主張的有三點：第一，人生的目的在求大多數人的快樂。他說：『人生至要和必需的目的乃是快樂。……但獲得快樂，却不是一個人的事。孤立的快樂是沒有用處的。一切人都應該在這快樂中有分，否則，只有少數人能有這快樂了。因此，人類的志趣只有一個，就是全人類行爲的和平以及感覺的快樂。這是人類天性原有組織所應當具有的。……然後，他們才可以進而至於最高的限度，就是他們自己個人的快樂。……於是人類唯一的競爭就是誰能把快樂推廣到其他一切人身上去了。』同時，根據這人生哲學，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宗教觀念。他說：『人類唯一的宗教是快樂的產生。所謂禮拜上帝，乃是發展有用的事業，追求知識，各說真話，以表示快感的意思。這快感是合乎自然真理的生活，是我們所非有不可的。』

第二點他主張的是環境的重要。他以為一個人的行爲是從他生活的環境中產生出來的，惡的環境產生惡人，善的環境產生善人。不過歐文對於這一點，沒有弄得十分清楚。因為他曾說過：『一切行爲，無論其爲最善的或是最惡的，無論其爲最愚的或是最聰明的，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可以產生的。……只要我們能用正當的方法；而且這方法大半是在那些對於人類事業有權力的人手中，是他們所能左右的。』這樣，在承認環境之後，他不是又在那裏與主張賢人政治的人同調嗎？雖然如此，因為他多少承認環境是重要的緣故，所以他對於教育也就看得極重了。這是他在論文中主張的。第三點，他叫我們對於頑皮的孩子不要厭

惡，不要失望。他說：『對於劣性的人發怒是無謂的，因為人類在養成這些性質時，他們都是被動的，是無法可施的。』我們敢說：勞動教育從歐文起才得到人家的注意。

從一八一五年起，他用了幾年工夫為勞働法奮鬥。一八一五年，他在格拉斯哥 Glasgow 召集了許多資本家，開了一個大會，其目的在反對棉花進口稅和改良勞働狀況。他的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肯把勞働的狀況改良，那所謂棉花業，儘可根本推翻。他說：『假使一方面推廣棉業，而不同時去糾正棉業所創造出來的罪惡，那末，棉業之危害工人，比較西印度奴隸制度之危害可憐的內革羅人，還要厲害。』他的結論是打倒棉業；『就是國家的政治權也應當被打倒，如果這政治權只依賴棉業而不肯為人類去犧牲生命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大會的反應怎樣呢？反對棉花進口稅是大家所贊成的。至於改良勞働生活一條，那真是對牛彈琴，也可以說是與虎謀皮，因為勞働法的實施對於參加大會的大腹賈是不利的。不錯，這勞働法到一八一九年在國會中通過了，但是國會的通過是一回事，資本家的各行其是却又是一回事。

一八一六年，英國發生了一件極希奇的事。一方面年收很豐，工業的生產力也很大，而一方面失業的人却非常衆多。歐文看到了，造成這局面的不是別的，乃是生產過剩。這在於歐文乃是一種新的發現。這發現對於他很有關係，因為從此他覺得當前問題不單是改良勞働狀況就是了。

歐文的平行四邊形是大家知道的。一八一六年，失業的人太多了。於是他就想出這救濟的方法來，所謂平行四邊形乃是一個村莊。這村莊所有的為地一千至一千五百畝，居民五百至二千人。他們的工作是

農業和工業，他們所居住的爲方城式的房屋。在村莊裏面有公共宿舍，膳廳，圖書室，閱報室，學校，洗衣處，工廠，農業房，花園等等。孩子在沒有到三歲以前，由各家自己負責。到了三歲，可以交給村中負教養責任的人。此後，只有在吃飯和休息的時候父母才能看見他們的孩子。村莊中注重的是農業。其次爲工業，而且要用最新式的機器。住在村莊中的都有一定的工作。還有，這種四邊形的村莊是可逐漸增添的，一直到全世界普遍爲止。

不過，歐文的理想要得到人家的贊同，談何容易？就是倫敦的工人於一八一七年會議的時候，對於這四邊形的計劃，也加以否決。他們的理由是：這種計劃太是嚴格，對於個人行動太約束了。

一八一九年，他的告工人 *Address to the Workmen* 出版了。從這書裏，我們可以看出歐文對於暴動的態度。暴動在社會革命程序中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方法。但是因爲人渴了，在飢不擇食的時候，一切都不顧了。這是古今中外社會革命史告訴我們的事實。歐文有鑒於斯，乃曰：無論貧窮的或富有的，無論統治者或被治者，都是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鬥。上等階級並不是情願壓迫工人，他們壓迫工人，也是因爲要保持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用暴動來對付他們，未免太殘忍，而忽略了壓迫原因之所在。照歐文看來，唯一補救的方法就是改造環境，環境一經改造，有錢的就沒有壓迫工人的必要了。這是歐文對於暴動的意見。

同時，他又反對錢幣制度。他以為錢幣是痛苦的原因。他說：補救之道在把勞動當作價值的標準，使相當數量的勞動成爲一個價值的單位，再予勞動者以證券，以表明他們所已經產生的價值的單位，然後他

用這證券可以掉換同樣勞動的貨物。這是歐文對於價值和勞動的觀念。

一八二一年，他發表了他的社會制度 *Novel of a Nation*。在這書裏，他的立場完全是共產的。他竭力攻擊那些以積蓄財產為社會唯一之目的和把人類當作機器的政治經濟學家。他說：人類的目的是大多數人的快樂。要達到這目的，非建設勞動平等和分配平等的社會不可。以下是他自己的話：『既然我們有了這樣充分的工具去得到財富，使一切人安居樂業，那誰也不會這樣的蠢笨去為私產麻煩和擔憂，把財產不按平等的原則分給各人，或為個人的利益積蓄財產的。這等於把空氣或日光不按平等的原則分給各人，或把空氣和日光積蓄着一樣的有損無益。』

一八二四年，為了要急於實現他理想的緣故，他在美國用了三萬金鎊買了三萬畝地，並且組織了一個社會，這就是普通人所知道的新和諧 *New Harmony*。當開幕那一天，他向那裏的百姓演說：『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要介紹一個簇新的社會，並且要使這社會脫離無知和自私的制度，而登之於開明的社會制度之上，因為這制度可以漸次使一切利益集合而成為大家的利益，並且可以除掉人類間一切競爭的原因。』自然，當時他興奮極了，因為照他想來，這新社會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不過不到三年，這試驗却完全失敗了。他大部份的資產也因之而犧牲。至於失敗的原因，不一而足。其最大原因是因為在第二年他採用了一種絕對平等辦法的緣故。照這辦法，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生產，你所得的報酬是絕對平等的。

這頓挫並沒有使他灰心，不過叫他轉變了努力的方向就是了。現在他的方向是勞動運動了。這是他

在回國後最初幾年中所致力於的。一八三二年，在倫敦召集了一個勞働運動會議。過了一年，加入的有八十萬人之衆，其聲勢可以概見。不過歐文想不到這運動是會引起激烈行動的。比如格拉斯哥的總罷工。歐文對於罷工不很贊同。因為照他看來，救國之道，是在於勞資合作。他肯定資本家，也是生產者之一，用罷工去難爲他是不應當的。所以他定規在明年把勞資兩方都召集攏來，以八小時工作時間爲雙方攜手的條件。但主張和平合作的歐文和激烈份子怎能苟合結果，因爲勞働運動的內部發生了衝突，這運動也就於無形中消聲匿跡了。

現在歐文年近古稀。在精神奮鬥和物質犧牲之後，其身體上之不支，可以想見。所以在最後十數年中，除了把舊時的作品重新出版和聲言唯有教育是將來的出路外，他並沒有特殊的貢獻。八十七歲，他在大不列顛社會科學會面前宣讀論文的時候，得了病。於是他被昇至他的本鎮牛頓 *Newton*。不久，便與世長逝。

第七個代表烏託邦社會主義的是卡培 *O'Connell*。他以一七八八年生於法蘭西，是一個受過充分教育的人。到三十歲光景，他在律師界已經得到了很高的地位。不久，他被選爲代議士。他寫了一篇攻擊君王的文章。因此，他便受了兩年徒刑。以後他亡命到英國。在那裏，他讀到了謾耳的烏託邦。這便是他寫伊加力亞遊記 *Voyage to Icaria* 的動機。以下是這遊記的概略：

伊加力亞分一百行省；每省分十個社會。每條街有十五座房屋。行人道上面蓋着玻璃。一日數餐有一

定時間。煮飯用科學方法。作工時間，夏爲七小時，冬天少些。一切重要工業都爲國有。國家的責任在土地的耕種，房屋的建造，和其他生產方面的事的進行。生產品的分配也在國家手裏。政府職員爲人民所推選，其主要條件爲技術上之深造。此即所謂技術者之專政。一切人穿的都是同樣的衣服。婦女和孩子也是如此，雖然顏色可以參差。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婦爲原則。事前須有六個月的求婚時期。孩子到了五歲須受教育。男的教育，一直到十八歲，女的到十七歲。以後無論男女，都須按照各人之所長而擔任工作。到了六十五歲，才可休息。如有著述，在出版之前，須呈請政府批准。社會輿情之舌喉爲議會。無論何人，都有向議會提案之權。有錢的人，他們的稅率，與年俱增；這樣，在相當期間，貧富可以均勻了。

卡培的思想以平等爲始終。這是他的信條：『我信自然在世間創造一切，其目的在整個人類。自然予整個人類以同樣的需要。這樣，整個人類在滿足需要的必需品上，便有同樣的權利。……我不信自然於給了人類理智和社會性之後，反使理智和社會性起來破壞友愛的關係和平等。反之，我信自然所以要把理智，改造力，和社會性賦予人類，是因爲要人類用理智和社會性改造和實現他們幸福上的平等的緣故。我信社會與政治的不平等乃是自然律的破壞。』

卡培以爲他的伊加力亞計劃立即可以實現。不過在法蘭西，掣肘之處很多。所以他決定到美洲去尋找試驗的機會。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他領了六十九個人，離開巴黎。其中差不多各種職業都有，並且還有兩個醫生。到同年十一月、十二月之間，絡續到美洲加入的，共計四百八十五人。卡培在得克薩斯(Dallas)

得到了一塊地方，作為他的試驗區。但爲了黃熱病的緣故，他把殖民地遷移到伊里諾斯 Illinois 的諾伏澤波沃 Novovo。過了幾時，先後參加的竟達一千五百人之衆。不過卡培根本不是一個領袖人才，所以到後來，團體中爭端就發生了。於是他帶了一百八十人搬到聖路易 St. Louis。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他死在那裏。過了幾年，到一八六四年，這聖路易的殖民地還是以內部爭論而遭解體。至於那些留在諾伏的人，他們的試驗，雖然持久些，但是到末了，却遭了同樣的命運。因爲這時馬克思 Marx 思想已彌漫歐美，這思想引動了諾伏殖民地裏面的許多青年。一八七八年，他們便起來另樹一幟，和老年者分道揚鑣。一八八四年，青年派移到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在那裏，買了一塊地。他們稱這地方爲伊加力亞斯褒藍紫 Toria Seniora。過了四五年，他們於意見分歧之下，遭了天殤。最持久的倒是諾伏地方的那些年老耆。不過人數過少，到一八九五年，他們仍然走上了消散的途徑。

第四章 科學社會主義

一 馬克思社會主義

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辭典 Dictionary of Socialism 的著者刺拍撲 Angels S. Rappaport 告訴我們：「這名詞乃是指馬克思自己和馬克思學派所提倡的社會主義說的。這與烏託邦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不同。科學社會主義所貢獻的，不是一種幻想的制度，而是對於社會演進的批評的分析，和歷史的唯物解釋。繼奴隸制度而起者為農奴制度，繼農奴制度而起者為薪水制度或工銀制度。同樣，共產制度到末了總是要代替資本制度和個人主義的。」

科學社會主義者不僅是馬克思一人而已。因為馬克思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所以我們從他說起。

馬克思在一八一八年五月十五日生於德之特列夫 Trier。他是猶太人。在六歲時候已經做了基督徒。十七歲進波昂 Bonn 大學，徇父親之意研究法律。過了兩年，他覺得法律太為枯澀，於是他把研究的範圍擴大，同時，又致力於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等等。他天生是一個敏而好學的人。貝耳說：「他閉門謝客，日

夜手不釋卷，或是做割記，或是謄譯希臘文，和拉丁文，或是研究哲學，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紀錄下來，或是擬定他哲學和法律的大綱，或是著作他三大冊的詩文。』其孜孜不倦，於此可見一斑。他十九歲時，就是一八三八年那年，他的研究使他感覺到康德理想主義之不可靠，和黑智兒哲學之價值。這是他寫給他父親的話：『我現在要放棄那幾年來信以為真的理想主義，到真實的自身中去尋找理想了。……我雖然已經念了黑智兒哲學的零篇斷簡，但是崎嶇不平的音調仍然不能合我的心意。所以現在我又鑽進海底裏去，決意要脫離智識的訓練所，去尋找那和物質一樣重要的具體的和完全的精神本質了，並且一定要把那皎潔的珍珠映露在日光之下。』結果，他全部精神統統為黑智兒哲學所佔領。此外，什麼都不要了。這種轉變，在一般人看來，是智識的解體，是一種慘劇；就是他父親也是這樣想。以下是他父親寫給他的話：『他們除了偶然用通宵或半夜的工夫去尋求快樂之外，其餘的時間都睡得很安逸。但是我那個聰明而富於天才的兒子，却在那裏度悲慘和失眠的長夜；爲了些感受不到興趣的研究，把身體和精神弄得如此困倦，並且爲着要研究那些深遠的問題起見，連快活也都丟開了。而且他今天所建築起來的，到明天却都毀壞了；到末了，他感覺得他已經把他原有的東西推翻了。……在一方面，……他的思想已經紊亂了，在另一方面，一般的人們却都在安安逸逸向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進行着。』但這些話對於不屈不撓的馬克思，却等於耳邊之風。他還是在黑智兒哲學中討生活。一八四一年，就是他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寫了他的畢業論文德謨利圖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ies of Democritus and Epicurus。因此得

了他哲學博士的學位。他本來要想在普魯士當一個哲學教授。誰知普魯士思想都很保守，怎能容思想自由的馬克思？這是他轉入新聞事業的原因。那時在萊因 Rhein 地方有一家報館。那報館的編輯是馬克思的朋友；所以他便被邀為投稿者之一。後來，為着他犀利之筆，在一八四二年，就是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在以前的編輯辭職之後，他們就請他代理。從此，他就開始研究經濟問題。在政治經濟的批評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裏他寫着：『當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在任萊因新聞 Rheinische Zeitung 編輯的時候，我才碰到了物質爭扎的難關。以下種種把我刺激了起來，使我不得不研究經濟問題：（一）萊因地方對於盜竊和分配土產的辦法，（二）對於摩塞耳 Moselle 農民的步驟，（三）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的爭辯。在另一方面，那些似乎是含有哲學性的法蘭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回響，在萊因新聞上也慢慢地顯示了出來。雖然如此，但是我却反對那種膚淺的主張。』他當報館編輯，大約有一年之久。後來，他研究經濟問題的興趣使他辭去了報館的職務，因為一面編輯報紙，一面求學問之深造，乃不可能之事。一八四三年秋，他和威斯特華倫 Jenny von Westphalen 女士結婚之後，為了要編輯法德年鑑 Franko-German Year Book 的緣故，便到了巴黎。這事工和報館生活迥然不同，因為現在他可以大膽地討論社會問題了。他說：『這些書的目的是在大無畏地批評一切現有的制度。所謂大無畏者，就是不顧批評所生的結果，不畏威權的衝突的意思。』明年，年鑑藏事。在這書中，我們發現了一篇恩格斯的作品。馬克思和恩格斯數十年如一日的友誼，就是在這時候開始的。同年，馬克思的神聖的家庭 The Holy Family 出版了。這書就是

唯物史觀和階級鬭爭的起源。他寫這書的目的，一方面在擁護黑智兒哲學，一方面在喚起一般人的迷夢，要他們把黑智兒的辯證法應用到階級利益上去，『不然，這種思想即使可以鼓起人們的熱情，但是總不能夠得到什麼成效。……只有那些和階級利益相符合的思想，才能發生效用。』一八四五年，爲了普魯士政府的慫恿，他不得不離開巴黎，踉蹌地到了布魯塞爾 *Brussels*。在那裏，他一直住到一八四八年二月歐洲革命發生時爲止。一八四七年，他寫了一本反對蒲魯東貧苦的哲學的書。這書叫做哲學的貧困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其時，在倫敦已經有了一個組織，叫做『公平同盟會』 *League of the Just*。他們聽到馬克思的聲譽，便派了一個會員到布魯塞爾來和他接洽。他正式參加同盟是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那時，同盟的名稱已經改爲『共產黨同盟』 *Communist League*。同盟會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擬一種宣言，以表明他們立場之所在。這就是劃分時代和膾炙人口的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這宣言雖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合作，據恩格斯自己說，那最重要的地方，却完全是馬克思的。以下是恩格斯的見證：『我不得不說明，宣言的主題是屬於馬克思的。所謂主題，就是在每一個時代中，那造成這時代政治，歷史，和智識歷史的，便是這時代所通行的經濟生產，和經濟交換的方式，以及這方式中所產生出來的社會組織，而且只有藉着這許多東西，才能解釋這時代的政治，歷史，和智識歷史之所以然。一部人類歷史，即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即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治者階級和被治階級的歷史。』一八四八年二月，歐洲大革命爆發。馬克思回到德國。在報紙上竭力主張有產階級的鐵械以及革命軍隊的暴動。一八四九年五月，

他預言工人階級的勝利快要到了。他說：「在東方我們已有一支為各國戰士們所組成的革命軍隊。這軍隊的代表是俄羅斯；其對手方是舊有的歐洲。現在這赤色的共和國已經在巴黎出現。」根據這信仰，他跑到巴黎。不久，他亡命至倫敦，因為二月革命已經失敗。在倫敦他居留着，一直到死為止。在倫敦時，最初幾個月，他寫了許多關於歐洲革命的論文，這些論文後來在革命和反革命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裏出版。馬克思在倫敦有三十多年之久。他每天到圖書館裏去看書。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〇年，他唯一的收入就是從紐約講台 New York Tribune 寄來一鎊錢一篇的稿費。據說，在一八五二年，他爲了要寫一篇關於科倫 Cologne 共產黨的文章，竟然把他末了的一件衣服也送到當舖裏去。一八五九年，他發表了他的政治經濟的批評。從一八六〇年起，境遇就好些了。他的朋友服爾夫 Moore 在他的遺產中，送了他八百鎊錢，此外，還有恩格思三百五十鎊一年的餽贈。一八六四年，出席「國際工人聯盟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這就是勞働階級的第一國際。他的演說辭叫做對於工人階級的演說 Addresses to the Working Classes。第二年，他又寄了一封關於價值論的通函給「國際工人聯盟會」。這就是他死了以後出版的價值、價格和利潤 Value, Price and Profit。一八六七年，他偉大的著作——資本論 Capital ——第一卷出版了。一八七〇年，普法失和，這予「國際工人聯盟會」以惡的影響。一八七二年，馬克思主張把聯盟會總機關搬到紐約。在那裏，苟延殘喘地生存着，一直到一八七六年爲止。從一八七五年起，馬克思身體壞了。於是他到卡爾斯巴德 Karlsbad 去休息。在那裏，他搜羅了資本論第

一卷以下的材料。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偉大的馬克思與世長逝。十七日，安葬於倫敦的亥給特公墓。資本論的第二三卷只能等待恩格斯來替他整理和出版了。

現在我們要看馬克思學說的內容了。

簡單說來，馬克思告訴我們的有四件事情：第一是唯物史觀，第二是剩餘價值，第三是階級鬭爭，第四是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茲分述之如下：

唯物史觀——馬克思肯定：一切社會關係，甚至於道德關係，都視經濟關係為轉移；換句話說：一部人類歷史所載的，不過是各時代的經濟關係的歷史就是了。這意思，在馬克思任何著作中，可以看到；不過最清楚的，要算是他在政治經濟的批評序言中所說的話了。這序言一般人稱之為唯物史觀之經典。以下是序言的一部分：

『我們斷不能從法律自身和人類心意的演進中去尋找法律關係和政治形式之所以然……這些關係淵源於生活的物質狀態……這種關係非發生於人類自身的意志，却因為要適合於當時物質生產力所達到的程度而發生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一切法律，政治等的上層構造，都建立於此真正基礎之上。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亦以此而形成。所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可以決定我們生活中政治，社會，和知識的行程。社會中人類的生活，不是由人類的心意決定的。反之，人類的生活，却決定了人類的心意。社會發達到某種程度，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就與當時的生產狀態發生衝突。這就是說：從前

在這狀態下發生的那些所有權的條件，現在便自相衝突了。於是，這些條件，從前助成生產之發達，現在却變為束縛生產之枷鎖，而造成了社會革命。因為經濟基礎改變了，所以全部的上層構造，或是急急地，或是慢慢地都隨之而改變。我們研究這些改變的時候，務必把物質生產條件的革命，與倫理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和哲學的革命……分別而論，而不可混為一談。正如判斷別人，不能以自身的感想為標準一樣。所以對於一個革命時代，要下斷語，決不能以當時各人的良心為標準，因為心意也是要用物質生活中的各種矛盾以及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中所存在的衝突說明的。社會全體的生產力，在沒有擴充到飽滿之前，其原有之各種形式，不會消滅。新的生產條件，如果不是必要而不可缺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母胎中，不會完全成熟。我們可以把歷史中的各種生產方式分為以下數種：就是亞細亞式的生產方式，古代式的生產方式，封建式的生產方式，近世資產階級式的生產方式等。這可以看作經濟的演進。資產階級式的生產條件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最後的對抗物。這種對抗並不是人的對抗，而是由社會生活一切條件中發生出來的對抗。在這種資產階級社會母胎中所發生的生產力，就造成了解決這種對抗所必要而不可缺的物質條件，這樣，社會便達到了理想的地步和最後之階段。

這段話已足夠使我們知道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內容了。那末，歷史除了經濟原因之外，有沒有別的原因呢？一八九〇年，恩格斯寫一封給當代學生的信。在這信裏，他說：『現在的事實是一般青年都把經濟看得太重了，這是馬克思和我二人應該負責的。在對付反對者的攻擊時，我們不得不特別注意他們所否認

的原因，因此，我們就沒有時間，沒有地方，沒有機會，使其他的原因獲得其應得之地位。」在另外一封信裏，他又說：「不過倘使有人把這點看錯而以爲經濟原因是唯一的原因，那末，這就成了一句沒有意義的抽象和無謂的話了。經濟原因雖然是歷史的基礎，但在經濟原因上面的一層構造——政治鬭爭的結果和組織——的各種成分，和法律的方式，以及一切和實際政治鬭爭相連繫者，例如政治論，法律論，哲學及宗教觀……這一切對於歷史中的鬭爭，都有影響，而在許多地方，這一切竟可以決定鬭爭的方式。」這樣，拿物質條件爲歷史的唯一原因，而置其他一切原因於不顧，未免厚誣了馬克思吧！還有，唯物史觀和唯物論乃是兩個不同的名詞。唯物論的目的在研究宇宙的起源，唯物史觀的目的在研究歷史的所以然。宇宙和歷史，其不同之處，稍加注意者，類能道之。

剩餘價值——馬克思主張勞働價值。他說：「一切商品所共同具有的社會成分是勞働……一件商品所以具有價值，因爲這商品是社會勞働的結晶品的緣故。價值之大小，隨其所包含的社會成分之多寡而定。這就是說：商品價值之大小，全依其產生時所需要的勞働之多寡而決。」同時，他又注意到勞働的總數。「比如棉紗價值依據勞働數量而定。這勞働數量，就是在紡織時棉花所得的勞働的數量。此外，還有產生棉花的勞働和石炭，石油，以及其他應用過的一切附帶的勞働，如汽機，紡錘，工廠，建築的勞働等等。」這一切，合算起來，就成了勞働的總數。

根據這勞働價值的意思，馬克思便提出了他的剩餘價值論。所謂剩餘價值，是這樣講的。比如一個勞

働者，他每天生活的必需費是三塊錢。照勞働價算來，只要做六小時工作，他就可以過去。但他是一個工銀勞働者，是沒有生產工具的，於是乎他不得不把自己用契約或其他方式賣給資本家。資本家叫他每天做十二小時的工，他也不得不唯命是聽。這餘外六小時的勞働，叫做剩餘勞働。但是資本家對於勞働裏的剩餘勞働，却沒有酬報，雖然這剩餘勞働所產生的商品，資本家依然可以出售。這剩餘勞働所產生的商品的價值，就叫做剩餘價值。

或者說：這剩餘價值不完全是資本家所能據為己有的，因為租金和利息，以及其他一切用費，不也應當算進去嗎？所以剩給資本家的，只能算是工業利潤罷了。對於這一點，馬克思的答覆是：「所謂租金，利息，和工業利潤，不過是商品的剩餘價值，或商品所包含的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働的各部份的名稱而已。所謂租金等等，都是從剩餘價值和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働中取來的。二者乃是租金等的唯一來源……在勞働者自身方面，他却不顧究竟這剩餘價值，或剩餘價值的結果，或沒有付過代價的勞働，是完全跑到雇用他的資本家的荷包中去，還是雇用他的資本家要拿出幾部份來付給第三者，作為租金和利息的。但倘使那雇用他的資本家專用他自己的資本，而且他自己就是地主，那末，這剩餘價值的全部就跑進他自己的荷包中去了。」總而言之，無論資本家是不是要付租金或利息，剩餘勞働和剩餘價值總是從勞働者身上剝削來的。

那末，竟勞働價值的標準是什麼呢？這或者是一般資本家所要問的。馬克思告訴我們，勞働價值從

來沒有過標準。他說：『如果我們把各國工資的標準或勞働價值比較一下，如果我們把同一國家在各時代中所有工資的標準或勞働價值比較一下，那末，我們就可以知道勞働價值並無一定標準，』而且永遠不會有標準，如果資本制度還是存在的話，因為資本家增加工作時間和減少工資，乃是自然的趨向。

階級鬭爭——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裏就說：『一切過去的歷史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地主和農奴，工頭和工人，簡單說來，壓制者和被壓制者，從古以來是互相對峙的；或是明爭，或是暗鬪。他們的鬭爭，總沒有停止。這種鬭爭，到了全社會的革命成功或兩階級都倒了的時候，才能終止。』接着他又說：『封建社會破壞以後，近世資產社會成立以來，階級對峙還是沒有廢除；所得的不過新的階級，用新的壓制手段，以新的形式，繼續着鬭爭就是了。到了我們時代，就是資產者的時代，我們所有的特點是階級仇恨的簡單化。全社會慢慢地分成兩個相對峙的大本營，這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宣言的末了幾句話可說是無產階級鬭爭的總動員令了。他說：『我們公然向世人宣言說：我們能夠推倒現時一切的社會組織。我們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使我們的權力階級在共產革命的面前發抖。勞働者所喪失的是一條鐵鍊，勞働者所得到的却是全世界。願我們勞働者團結起來啊！』

那末，無產階級鬭爭的戰術是什麼呢？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他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在宣言中說：『無產階級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們走上權力階級的地位。這就是民主主義的戰勝。既達到第一步，無產階級就利用政權，漸次奪取資產階級的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就是集中在

統治的無產階級的手裏。……其初，免不得要用強迫手段對付私有財產和資本家的生產方法。」

有許多人對於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不無懷疑，以為拿無產階級來替換資產階級，豈不是以暴易暴，階級的存在，仍然不能剷除，階級的存在既然不能剷除，所謂平等，如何可得？對於這問題，馬克思的答覆是：「原來政權這東西不過是一個階級壓制一個階級的一種有組織的權力就是了。無產者和資產者戰鬥時，迫於情勢，不得不把自己組織起來，成爲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支配階級的地位，更不得不用權力去破壞舊有的生產方法。根據這種條件，階級存在的條件和階級仇恨便可以掃除了。同時，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也可以消滅了。」這樣，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過渡辦法。照他看來，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消滅階級的存在。

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馬克思是黑智兒的信徒。他用辯證法來解釋人類歷史。他說：從甲制度改變到乙制度，轉而至於丙制度，其間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必然性在。資本制度澎漲到相當程度，其崩潰乃必經之階段，因為資本主義必需的條件是無政府狀態的競爭，這競爭所造成的是資本集中。比如一家大公司和一家小公司競爭，結果，小公司非關門不可，因為大公司儘可放盤，儘可虧本，小公司資本有限，不放盤則無以招徠生意，於是乎只得放盤。大公司放了一個月的盤，其損失不過九牛一毛，小公司放了一個月的盤，如何再能支持下去？不得已，只能倒閉。轉過來，在這大公司上面還有一家比較更大的公司。這樣，根據優勝劣敗的道理，於相當期間，全世界所有資本，只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其餘的人都從中產者而至於

無產者了，這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中產階級，小產階級，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都變了無產者，一半因為他們的大資本不足以經營大的買賣，在大資本家競爭之下，不得不屈服，一半因為他們的技巧被新的生產法所排斥而失却了價值。』到那時，資產階級便站立不住了，因為以前在資產隊伍中的，現在已經脫離了。如今，在資產隊伍中的，僅寥寥數人耳。在大多數無產者面前，欲求其不崩潰可乎？馬克思說：『最後，就是在階級鬭爭快要到決裂的時候，那統治階級（說得切實些就是舊社會的全部）內部的分崩是一定很厲害的，因為有一小部份的統治階級非脫離舊有的關係而投入那掌握未來命運的革命階級不可。從前，有一部份貴族曾經投向資產階級，如今，也有一部份資產階級要投向無產階級去了。至於那些能認識這種歷史運動的意義和具有理想的資產階級，那更不必說了。』那代封建制度而起的資本主義，在挖掘了自己的坟墓之後，便結束了。

二 費邊社會主義

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恩格思曾經預言過，他說：在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三年，世界必有大恐慌發生，『因為到那時候，資本家對於英國民衆的掠奪已經至於盡矣，資本家對於民衆的工作，不再需要，而民衆也快要到貧苦無告的地步。倘使到那時候，那些英國的資產者還不反省，——而且大概不會反省——那末，空前的革命，勢必隨之而起。』但是到了那時，英國工業情形不但沒有減色，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而且壟斷了

世界的商場。恩格斯畢竟是一個偉大的人，他一方面從善如流地承認自己預言之不中，一面又把英國工業勃興的原因舉了出來。他說：『第一是工廠勞動者，因為國會已把他們的工作時間在相當範圍之內規定了，他們的身體也恢復了過來。還有，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能集中在一個地方，他們的道德也就提高了。他們確已比一八四八年以前好得多了……第二是大職業組合。在這些職業組合中，佔優勝的是成年人的勞働，或說只有成年人才可進去。這裏雖有着婦女孩子和機器的競爭，但組織却很健全。無論是機器匠，木匠，細木工匠，或是泥水匠，都能自成一種權力……所以從一八四八年之後，他們的情形的確已經大大地改良了……不但在雇主方面看來被雇者與雇主很相投機，就是就被雇者而論，雇主和被雇者也很契合。於是在工人階級中間，他們便成功了一個貴族……並且他們以為這地位是再好沒有的了。』這情形使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一落千丈。他們以為馬克思的階級鬭爭是莫須有的。只要用法律手續和教育方法，工人階級的痛苦，未始不可解除。在這種緊張空氣鬆懈之下，費邊社會主義便脫穎而出。

一八八三年秋，在英國有幾個智識階級的人，他們一方面感到社會改造之重要，一方面又覺得馬克思主義未免太激烈了。在幾度討論之後，到第二年一月，他們組織了一個團體，而名之曰費邊社。他們所以稱這團體為費邊社，是因為從前羅馬國有一個將軍叫費邊（Fabius）他用不戰而困敵的方法，把漢尼拔（Hannibal）打败了。他們的意思是：社會改造，用不着激烈行動，單用和平手段，也可以達到改造的目的。所以他們的標語是：『有時你期待着，和費邊一樣。當費邊和漢尼拔戰爭的時候，雖然有許多人責備他遷延不

進，他却不管，只一味固守不動。但當時機到了，你當和費邊一樣，猛力進攻，不是這樣，那你的期待便空廢無效了。」他們的工作，是完全沒有行動的。比如（一）討論一切和社會主義有關係的問題；（二）調查關於經濟的各問題，並徵集事實，以解釋這種問題；（三）刊佈關於社會問題的報告和社會主義的辯論；（四）在別的社會和俱樂部中提倡社會主義演講會和辯論會；（五）選派代表加入各種討論社會問題的會議等等。他們的主張是：「把土地和工業資本從個人及階級所有權底下解放出來，交給社會……把私有土地和私有土地所造成的個人享用，統統廢除；無論是租金或使用土地的代價，或爲了上等土地和基址的便利而付的代價，都該廢除……把可以歸社會管理的那種工業資本的管理權交給社會……把租金和利息增加在勞働酬報之上。」

究竟費邊社和馬克思主義有什麼分別呢？關於這問題，在貝爾的話裏我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答覆。他說：「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八五年間，不列顛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工人階級的崛起是一件不能再否認的事了……他們已獲得了參政權和職業組合法制……在民主主義還沒有產生以前，那些信仰民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只能在革命上去用功夫……但是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和一個情願擔負法制的國家中，倘使他們要造成一個新的政治機體，那他們用不着革命，因爲新的政治機體已經存在，只要他們去使用就是了……那些歐文主義者跑到社會外面去，其目的在造成一個合作的國家。他們拿起筆來把這國家詳細地計劃起來。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一切計劃和關於未來社會的一

切詳細的討論，都認為不屑。他們主張工人階級起來反對現有秩序，獲得政權，奪取社會……衛布 Sidney Webb 代表費邊派。他的事工是研究社會特殊癥結之所在，根據社會主義之普通原則以救濟之，使國家相信這種方法是合法而可以實行的……所以社會主義者便不應期待社會革命……歐文主義的主要關鍵在研究環境和人格。……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社會和召集工人階級去為社會主義奮鬥時，所用的哲學，就是勞働論以及那富有能力的階級鬭爭。衛布社會主義的根基是租稅論的推廣，和國家社會良知的演進。』這幾句話，把費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異點完全說了出來。

那末，費邊社會主義的論調，其更詳細者，我們可得而聞乎？足以代表費邊社者除了上面所說的衛布之外，更有克拉克 William Clarke，著名文學家蕭伯訥 Bernard Shaw，奧力味 Sidney Oliver，和窩拉斯 Durham Wallis。他們每人寫了一篇論文。衛布寫的是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克拉克寫的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蕭伯訥寫的是費邊派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奧力味寫的是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窩拉斯寫的是費邊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社會的預測。

以下是各篇論文的大意：

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衛布說：社會是動的。以前一般烏託邦社會主義者都以為社會是靜的。因此，他們一味癡心夢想，尋找世外桃源，而不於現社會中找出路。對於這一點，衛氏却提出了他的異議。他說：『現在，社會理想已經從靜的轉移到動的……現在，哲學家尋找的是舊秩序到新秩序的逐漸的演進。在

這過程中無論如何，不必使全部的社會組織得到劇變，或失其持續性。」

他又把產業革命的流弊指了出來。他說：那些資本家對於產業革命是很高興的；因為從產業革命中，他們便發了財；對於「婦人們露着半個身體，在炭礦中工作，孩子們在坑道的污濁空氣中，整天拖曳着重車，嬰孩們每天十五小時在棉紗廠炎熱空氣的織機上縛綁着……一般人所需要的合乎衛生的東西，一無所有，契約自由和完全放任的結果是藍色報告書簿齊整整一張張紙上所記着的過犯。」這些情形，他們却視若無睹。並且「由幾個政治經濟學家的助紂為虐，對於一切運動，和干涉他們自由的地方，他們很固執地抵抗和反對着。」

衛氏是一個民主主義的信徒；所以他以為只要民主主義實現，社會改造不成問題。他相信：在民主政治之下，人們「不但要支配他們自己的政治組織，而且也要藉着這政治組織去支配生產中一切主要的工具；並且他們還要慢慢地把組織的合作去替代爭攘的紊亂。」這種信仰，照他看來，在英國已經證實了。他說：「因為人們用了一切有利於社會的法令，禁止那些自由使用資本的人，不准他們任性而為，所以賣價和資本利潤便一點一點地減少了。還有，因為人們已經把課稅從消耗者轉移到那些享受水平綫以上的收入的人，所以租金的收入和利息的收入，也便一點一點地減少了。」……這是衛氏對於民主政治樂觀的原因。

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爲了要預備這篇論文，克拉克化了許多時間，調查英國當時工業狀況。在

實地調查之後，他得到了以下幾種結論：

(一) 資本家在管理上已失去了他們的功能。他說：以前資本家一方面是業主，一方面又是管理者。他和別人一樣，向廠中領取薪水，雖然他的薪水比較地未免太多些。『但是現在的資本家，一些兒用處也沒有了。……把監工的地位丟掉，另雇一個受薪的管理員來代替他工作，使自已不過做一個收取租金或利息的人就是了。他把收來的租金和利息，用在壟斷上，但這壟斷並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却是全部民衆的聯合能力造成的。……管理者的工作是爲雇主爭最高限度的紅利，不然，他便要被解職。從此，以前工人和雇主間的個人關係就沒有了；現在留下的，不過是金錢關係而已。』

(二) 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是格不相容的。民主政治鼓勵的是自由，資本主義『最後的結果是自由的消滅。……貿易自由，交換自由，按照自己的樂意而購買的自由，……這些本來都是民主的原則。但爲了壟斷的緣故，以上所舉的都一條條地被限止和否認了。因此，資本主義顯然不能和民主政體一致。……或者說：二者正和兩輛從不同方向開來的車子一樣。』

(三) 加高稅率 and 社會管理，或許是一種過渡辦法。在克氏寫這論文的時候，托辣斯已經發現。托辣斯比較個人主義的競爭，聊勝一籌，因爲在托辣斯裏面，無政府狀態，比較地少一些。但是托辣斯乃是資本主義之擴大，還是不可採用的。照克氏看來，可以採用的，只有加高稅率 and 社會管理兩種辦法。雖然『這種法制要把個人自由的幾方面大大地限制起來，並且要生出許多糾紛，阻止生產能力。不過在經過許多試

驗之後，人們才可以知道，使社會全部獲得財富……乃是最合理的，因為個人主義，或任何含有放任性的事，是一定要破產的。」克氏承認加高稅率 and 社會管理不是澈底辦法。不過在社會主義還沒有實現之前，這却是一種無辦法中之辦法。

費邊派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是蕭伯訥寫的。在這論文中，那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他說：私有土地的租金，再不公道也沒有了。比如原始有一批人，他們佔領了十萬畝地。自然，他們所佔領的乃是最膏腴的。每畝每年可以產生十塊錢，合算起來，是一百萬塊錢一年。以後第二批人起來了。他們只能在第一批人的土地之外去尋找別的土地了。因為第一批人已經把最肥的土地佔領了去，所以第二批人佔領的只能是次等的了。他們也佔領了十萬畝。不過生產力却要減少一半。換句話說：每年總數只有五十萬塊錢。再後，第三批人起來了。他們所佔領的比第二批人的地還要低一等。他們的生產總數是每年二十五萬塊錢。不過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等到最低等的地也佔領完了，以後起來的不都是無產者嗎？這是無產者的來源。但為謀生存計，無產者只能向以前的人租借土地。假定他們的地主是第一批人，那末，他們的租金少不過五十萬塊錢一年，因為這是第一批人的地的生產力和第二批人的地的生產力的差數。假定他們的地主是第二批人，那末，他們的租金少不過二十五萬塊錢一年，因為這是第二批人的地的生產力和第三批人的地的生產力的差數。以下可以類推。那末，地主們不是無地可耕了嗎？是的。其實，他們也不用再耕了，因為他們拿了佃戶收入的一半，既無成本，儘可以優遊自在了。還有，因為像上面所說的，土地的數量是有

限的，人類的繁殖是很快的，到後來，做佃戶的也可以把租來的轉租出去。這樣，他受了人家的剝削，轉過來，現在他也剝削人家了。這種層層剝削的現象，是現社會情形的寫真。因此，蕭氏便主張租金公有這個辦法。因為租金是從生產力的差別或地利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應該作為公共的財富，或社會財富，並應該像現在稅金一樣，作為公共事業的用途。」

其次是他對於資本的看法。普通人說：土地應當公有，資本却不能公有。蕭氏對於這一點，提出了他的懷疑。不錯，資本是勞動的產品而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但這却不是說：資本的利息是勞動的產品而土地的租金不是勞動的產品。利息和租金一樣地不是從勞動中得來的。如果土地租金應該公有，資本利息也應該公有。還有，倘使我們單單提倡土地公有，那末，請問對於現有許多用勞力耕種過和在上面有了房子的土地，我們怎樣辦呢？照理這種土地已經不在公有範圍之內了。所以蕭氏用譏諷的口氣說：「看哪，這人已經逃出了那些主張土地公有者之範圍，他的土地已成為資本，或為聖地了。」這是對於那些只提倡土地公有而以資本作別論者的反駁。

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奧力味告訴我們：社會主義乃是個人主義的造極。二者並不是相反的。這是他的話：「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者奮鬥之結果……是達到個人主義的理想以後必然的情形。」我們所以說個人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反面，是因為我們把人生和物質混為一談的緣故。奧氏說：「我們所以說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衝突，是因為把一個人的生命和他所有的東西不能分別的緣故。其實，社會

主義不過是一種理性化，組織化，和帶上文彩，以及具有相當思想的個人主義而已。社會主義是在發達的社會中形成的。社會革命勢必以許多……個人有意識的行動為根據。這樣，社會革命才能正式成功。」這未免是一種唯心論者的口脛。

第三，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是不道德的。資本家勸導工人，要他們節儉，要他們勤苦。但資本家自己，却一個指頭也不動，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這樣，資本家的勸導不是些謊話嗎？不是不道德嗎？至於勞動者的道德，那更談不到了。他們受了資本家的榨取，勉強維持生活之不暇，還有什麼時間來受道德教育呢？所以奧氏說：「只有到這種教育成為一般人自由出入的教育時，我們才可以把討厭無產階級的粗魯的心理掃除。」

第三，工業合作足以造成社會道德。奧氏說：「若是我們要訓練一個人，使他把自己的生活 and 社會的生活打成一片，那末，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物質生活中的材料，和其他人們物質生活中的材料，聯在一起。簡單地說：這就是工業合作……現在工廠制度，機器工業，和世界貿易，已經把個人主義的生產制度廢止了。個人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正在促催我們跑上合作方式的完成的途徑。這種完成是和社會道德相符合的。所謂社會道德，就是使人們大家得到安居樂業的意思。」

費邊社會主義者對於社會主義所產生之社會的預測——以前的烏託邦者太理想了。但自從科學社會主義產生之後，一般人却太沒有理想了，太實際了，或曰太裹足不前了。窩氏有鑒於此，乃說：「現在我

們的試探，就是把理想看得太輕。我們忘了，就是時間之神，也不過是各個人的奮鬥和希望的總數而已。許多歷史中間的改革，也許要遲到數百年，或永遠不會來，假使沒有人把新的生命和高尚的生命——這種生命，並不是環境的產兒——不屈不撓地宣傳着。

窩氏除了這幾句鼓勵的話之外，又提出了幾個實際問題：

消費合作是不是馬上可以實行的？窩氏的答覆是：『圖書館，公園，工人俱樂部，和有錢的人住在公寓中，受公僕服役的時候，這些事實，都證明消費合作已漸次為人們所了解，所享受了。不過在另一方面，人們對於那按照大多數人的樂意而選定的快樂，總是不能認為快樂的……所以現在每個家庭，都在注意分居和每天在不同的廚房中分炊的辦法。雖然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是浪費和不舒服，但一切現有家庭，却都情願有浪費和不舒服……雖然我們可以把現在建造房屋的土地充作國家財產，但人們却都一定要得到他們自己的陶器，自己的椅子，自己的書籍，自己的圖畫，和他們所產生的價值的一部份；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領取年入或月入，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樂意去使用，或保存起來。』

國家所有權的範圍是什麼？他說：含有地方性的東西不必歸為國有；只要歸給地方就是了。只有主要的東西，比如郵政，鐵路等，才應該歸為國有，因為這些東西範圍既廣，規模又大，非歸國家的嚴密管理不可。礦山，海口，和水料的來源，雖應歸為國有，但是其他的土地，却還該歸地方執管，不過使用者應把收入的一部份貢獻給國家的財政部就是了。

三 修正派社會主義

修正派之在德國等於費邊社之在英國。二者同樣地對於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他們的異議。

修正派社會主義的領袖是本斯泰因 Edward Bernstein。他以一八五〇年生於柏林。他自十六歲起，在銀行中當書記。二十二歲加入社會民主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派。一八八八年，他做了社會民主者 Social Democrats 的編輯。這報在瑞士出版。不久，瑞士政府聽了德國政府的話，把他驅逐出境。於是，他逃到倫敦，做了柏林報的倫敦記者。在那裏他結識了許多社會主義的信徒；其中屬於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之，屬於費邊派者亦有之。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就是在這環境中蘊釀的。他在新時報 New Zeit 上寫了許多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一八九八年十月，當社會民主黨在司徒嘉德 Stuttgart 開會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在這信裏，他正式提出了他的批評。過了幾個月，他發表了他的社會主義之現狀和將來 Voraussetzungen des Socialismus。當然，這是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一九〇〇年，本氏回到德國。這時，他便是修正主義者的領袖了。修正派也着實引起了很多人的贊同，因為當時德國和英國一樣，經濟情形，不但沒有像馬克思預言那樣恐慌，反而一天一天地在進步，同時當局也居然有改良工人的表示，尤其在南部如薩克森 Saxony、巴威 Bavaria 等處。所以一直到歐戰爆發為止，修正派和考茨基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正宗派中間的衝突，真是旗鼓相當呢。

以下是修正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對於唯物史觀的批評——本氏批評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說：『這就是說，除了生產能力和生產情形的歷史和勢力之外，對於法律思想和道德思想，各時代的歷史遺傳，各時代的宗教遺傳，地理的勢力，以及其他自然環境的影響，我們都應予以充分之認可。』照他看來，人類歷史的形成，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其實，馬克思的代表恩格斯，何嘗沒有看到人對於這問題的誤會而加以說明過？這上面已經說過。本氏所批評的，僅馬氏未成熟的論調耳。

還有，本氏以為，社會愈是進步，唯物史觀愈是不能成立。換句話說：社會愈是進步，非經濟的原因愈是重要。他說：『現代社會在理想方面，比以前社會要豐富得多。但理想却不是經濟或和經濟勢力一樣的自
然律所規定的。現在，科學，藝術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像以前那樣依靠在經濟上。』這與上段有相發明之處。明乎上層構造的意義，本氏的話便不是新發現了。

對於剩餘價值和階級鬥爭的批評——馬克思把剩餘價值作為階級鬥爭的大前提。換言之，剩餘價值是資產階級所獨有的。因此階級便成立了，鬭爭便發生了。本氏却說：這錯誤了，因為剩餘價值何止於資產階級？就是在工人中，也是有剩餘價值的。以下是他的話：『這論調似乎可以把資本家剝奪工人的程度計算出來，……其實，價值論並不足以說明勞働生產分配的公平和不公平。這和原子論之不足，說明一個雕像之妍媸一樣。』本氏的理由是：『我們在一方面果然可以在富有剩餘價值的職業中遇到佔領着

優越地位的人和「勞働貴族者」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在微薄的剩餘價值的職業中遇到極低等的工人。』他以為這可以推翻馬克思的階級鬭爭。實則，工人階級雖然也有剩餘價值，但是在資產階級中剩餘價值要多得多；謂其為獨有，有何不可？階級之分野，於是乎成立。

對於資本集中的批評——馬克思告訴我們：現在資本一天天地集中；等到資本集中到相當程度，資本制度便要崩潰。對於這一點，本氏先拿托辣斯作一個例子來加以反駁。他說：托辣斯乃是最大的資本中，但是托辣斯並不是少數人的所有物，不是個個股東都夠得上資本家的稱呼。資本集中難道就是資本主義嗎？這是本氏對於資本集中的第一個批評。

第二個批評是：事實告訴我們，從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八一年，在英國，人口雖然加增了百分之三十，但那些得到一百五十鎊至一千鎊的家庭，却加增了二另百分之三十三另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在這數十年中，英國資本不但沒有集中，反而分散了，有錢的人反而加多了。

本氏之所以有這種批評，第一因為他不明瞭資本家的真正的定義，所謂資本家並不是一定要有一百萬或二百萬的人，才夠得上這稱呼，就是有少數資本的人，也得謂之資本家，只要他有支配大資本的能力。比如一家公司的經理，難道這公司的資本全部是他一個人的嗎？但是他却有支配這公司全部資本的能力。他就是資本家了。所以拿托辣斯來作為資本集中的反證是不適宜的。第二，本氏斷章取義，只拿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八一年的情形來證明資本的分散。而孰知倘使我們再往下看，資本在英國還是在集中的，

沒有錢的人還是在增加的。二十世紀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及失業者的衆多，不是一個明證嗎？

對於經濟危機的批評——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貧苦和一般人有限的消耗力，乃是一切社會危機的最後的原因。因為這種有限的消耗力和資本家的生產衝動，適相反對，雖然從表面看來，只有有限的社會消耗力才能限制資本家的生產力。』過了十年，他又說：『假使說危機是因為消耗者沒有支付代價的能力而起來的，那真是一種「重語」。』因「在每一個危機之前，一定有着工資增長的時代，而且工人階級一定要在每年的消耗品中得到他們更大的收入。」這雖然是兩句前後矛盾的話，而其以危機之發生為必然的則一，不過發生的條件不同就是了。

本氏鑒於當時歐洲財富的陡增，以及信用和托辣斯制度的崛起，却說：危機根本可以避免。其實，這又是本氏近視眼的毛病。難道歐洲當時的繁榮就可以認為危機的反證嗎？馬克思的信徒盧森堡（L. Luxemburg）說得好。他說：信用制度，適足以加緊危機的速度。

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批評——本氏說：『假使在各地地方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們已切切實實地把自己安放在國會工作的戰場上，並且聲明他們是贊成均等代表和直接法制的……那末，我們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字，還有什麼意義呢？……階級專政乃是低等文化中的事。』本氏根本信仰民主主義。民主主義的一方面是自由主義。專政是不自由的，所以他反對專政。他總以為國會和法律是可靠的，勞動階級應當向國會和法律去討救兵；而孰知歷史告訴我們：所謂國會，所謂法律，不過是有產階級壓迫無

產階級的一種工具耳。要向國會和法律乞援，真是與虎謀皮。馬克思洞若觀火，他看到了這一點，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況且馬氏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乃是過渡辦法。照他看來，只有這辦法才可以消滅階級於永遠。本氏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恐怕是蹈了歐文等的覆轍，而厚誣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哩！

那末，修正主義積極的主張是什麼呢？以下是他們的主張的大概：

- (一) 主張合作運動，而尤以消費合作為最重要；
- (二) 主張一切產業，應慢慢地歸為市有或國有；
- (三) 主張勞働組合，對於法制，應取戰爭態度；
- (四) 主張普通選舉，把選舉擴張到一切工資勞働者；
- (五) 主張大宗收入須有累進稅，凡是不勞而獲的利益，須歸國家享受。

末了是修正主義對於暴動的態度。本氏也看到，要實現社會主義，只有兩條途徑：第一是暴動，第二是法制。暴動的毛病是情感超過理智；法制的毛病是理智超過情感。換句話說：暴動的毛病是過激，法制的毛病是遷延。那末，究竟我們應該取那一條途徑？這要看國家情形而定。『如果一個國家少數有資產的人的權利不再為社會演進的嚴重的障礙，如果一個國家的積極的政治行動比消極的政治行動更為急切，那末，武力革命的要求便成了無謂的字句。』本氏認定，在那時候，歐洲各國的政治行動，對於工人階級，頗有擲手之可能，並且財富一點一點地在普遍化，而未曾為少數資產者所壟斷，當然，他是主張法制而不主張暴動的。所以他更直捷爽快地說：『倘使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持久的經濟組織，那末，法制可以給我們以更大的利益；換言之，法制對於積極的社會政治，更為適合。』

四 工團主義

脫胎於馬克思主義，後來和馬克思主義脫離關係而另樹一幟的，在英國有費邊社會主義，在德國有修正社會主義。這兩派，上面已經說過。現在要提到的是法國的工團主義。

馬克思曾經預言：在最近的將來，世界經濟，要起恐慌，資本主義，就要崩潰。但是過了數十年，事實却證明，世界經濟，不但沒有恐慌，反而比以前更發達了；資本主義一天天地在進步。那末，爲什麼如此呢？當然，政府一時的覺悟，和勞動法的制定，乃其最大原因。所以各國社會革命者，都以爲馬克思的預言已經失敗而到國會中去討生活了。英國的費邊社，德國的修正派和法國的工團主義，都是爲了這緣故而起來的。

工團主義最早的發動在一八七九年。其時，法國政府把國際黨解散了。於是，一般致力於社會運動者才覺悟，要在國會中謀出路，乃是緣木求魚。同年，他們在馬賽召集了一個會議，並且發表了以下的話：『在政府把國際黨會議解散之後，有一件事却改良了。從此，工人階級不再希望別人來救他們，除了他們自己之外：政府對於那些組織國際黨的人，十分懷恨，用種種不正常的方法來反對他們。這却造成了國際黨會議的激烈的議案。這議案表示着：法蘭西無產階級已經覺悟了，已經配得上解放了。』

此外，他們把經濟策略也改變了。以前他們留戀的是合作運動；現在他們却加以否認，而明目張膽地宣布了他們的集產政策。所以到一八八〇年，第二次會議的時候，那些不贊成集產主義的人，一致退席。這

樣，集產主義這個政策，便永久地寫入了工團主義的政綱。

過了五年，在一八八四年，政府把工團中職員的名字和通訊處抄了去。這是政府對於工團的一種警告。這樣，工團便不得不加緊他們的組織以對付政府了。一八八六年十月，他們在里昂召集了一個工團大會。『全國工團同盟會』(National Federation of Syndicates)就是在這會裏產生的。他們的宣言是：『同一個主人的奴隸啊！……我們爲了受同樣的痛苦，有同樣的希望，同樣的需要，同樣的權利的緣故，所以我們已經決定了，我們應當把我們對於政治和其他的嗜好放在一邊，手牽手地向前走，把隊伍鞏固起來，抵抗那共同的仇敵。』

現在有一個橫亘在他面前的問題。工團對於罷工應該取怎樣的態度？Julius Guesde 是工團的領袖之一。他後來投降了政府。一九一九年，他居然做了部長。當一八八八年這問題提出的時候，他竭力反對。他的理由是罷工，激烈些便是暴動；緩和的罷工是不可能的。還有，照他看來，罷工是經濟的。在經濟場中，工人們總沒有勝利的希望，因爲在經濟場中，資本家比較工人們要強得多。不過到一八九二年，他們重復討論的時候，贊成罷工的人，便占了優勝。他們的理由是：『奪取政權，乃是革斯地派和其他人們所主張的一種方法。這方法却是太縹緲，太遙遙無期了。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乃是普遍的擾亂，但現在一切軍器都是新的，各大城的建築，和以前迥不相同，防禦和巷戰，均已作古；因此，這種普遍的擾亂是不可能的。假使我們把這兩種方法廢除了，那末，總罷工便是現在工人手中唯一和適當的利器了。這利器足以使工人

們實現他們最後的解放。」罷工通過之後，一面革斯地派退出同盟會，一面那些贊成罷工的人，重新成立了一個組織，而稱之曰「勞働總聯盟」La Confédération General du Travail。這是一八九五年的事。

在勞働總聯盟中，有一個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就是聯盟的秘書柏洛替阿 Fernand Pelloutier。他生於一八六七年，是一個從殷實之家出身的人。在壯年時代，他已進入了政治生活。他爲罷工問題，竭力辯護。一八九三年，他到了巴黎。他受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一八九五年，「勞働總聯盟」成立。他便當了聯盟的秘書。因爲他是受過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的，所以他的立場是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換句話說：他贊成罷工而反對政治活動。這種個人的立場，無形中，便註定了工團主義命運的大概。

一九〇一年，法國鐵工罷工了。聯盟派了一個委員會，研究這問題。他們的報告是：「時候到了，我們可以嚐試總罷工的味道了；而且勝利的機會是很大的。」此外，他們又主張怠工，經濟絕交，以及其他直接行動。最厲害的是他們對於軍隊的宣傳。他們說：所謂「祖國」是沒有的，軍隊不過是強者侵略弱者的一種利器就是了。總之，聯盟之聲勢，十分猖獗，弄得舉國騷然，全歐震撼。工團主義的力量，於此可見一斑。

政府有鑒於此，乃用利誘的方法來軟化他們的勢力。密勒安特 Milliard 原來是一個極有力的社會主義者。現在政府却叫他做了工商部的部長。因爲他的關係，十小時工作時間的法律也通過了。此外，勞働委員會中一起只有六十六個人，社會主義者倒占了三分之一；而這三分之一中，代表「勞働總聯盟」的倒有十五人。布立翁 Aristide Briand 本來是一個竭力求張總罷工的人。但是到了一九一〇年鐵路罷

工的時候，他竟然爲虎作倀，把罷工委員捉了去，並且又吩咐軍隊看守鐵路工人，因爲他現在已經進了內閣。

歐戰爆發，法國工團主義除了政府利誘之外，又遇到了兩個難題：第一是愛國心的衝動，第二是俄國共產黨的崛起。工團主義者究竟有沒有『祖國？』這是一個很難答覆的問題，尤其在愛國情緒高漲的當日。當然，按工團主義原有的信條，『祖國』是沒有的。不過當那時候，在有許多工團主義者，情感却超過了他們的理智。於是乎工團主義的隊伍便鬆懈了。還有，工團主義和共產主義原來沒有多大分別。俄國共產黨的旗幟，多麼新穎啊！同時，工團主義自身已經呈露出羸弱的現象，一般富有生命力青年之向左轉而加入共產黨，乃是勢所必然的事。

總之，法政府的利誘，愛國心的衝動，以及共產黨的勃興，三者便造成了今日若斷若續的工團主義。以下是工團主義的基本哲學。

工團乃最持久的組織——利未尼（Léon）是一個工團主義的理論者。他說：『政治家，或理想家，或普通人的團體，雖然有共同的信條，但這種集合是無力的，是暫時的，因爲他們的組織是複雜的，他們的團結是偶然的。』照他看來，『在人類一切團體中，那最根本，最持久的團體，要算是工團了。』爲什麼呢？因爲『工團乃是同樣或類似職業中工人們的集合，是以共同利益而結合的。』又『因爲社會上人所最注意的乃是經濟需要的滿足；』所以只有根據經濟利益，我們才可以把一班人組織起來。使他們持久着。利氏

從來沒有把工團看爲一個黨。工團不過是一種關係，這關係『把自己和其他的人打成一片……應付工人的利益。』

罷工是應當採用的——利氏認定罷工可以加緊工人的階級意識。他說：『罷工可以使工人和雇主在利益上衝突起來。罷工可以和閃電一般地把雇主和被雇者中間那種深切的仇恨暴露出來……在另一方面，罷工雖然可以使雇主們團結起來，抵抗工人，但在另一方面，罷工又可以使工人們團結起來，抵抗雇主。』至於以金錢爲目標的罷工，那不是工團主義所贊成的。利氏說：『假使工人們專以金錢爲他們罷工的目的，那罷工便一降而爲兩個錢囊的抗衡。——雇主的錢囊和工團的錢囊，——把罷工價值的一大部份失掉了。』唯因爲金錢在罷工時候是必需的，所以工團主義主張最好那些不罷工的拿出錢來維持罷工的。

直接行動和暴動是可以有的——工團主義贊成直接行動，或至於暴動。利氏對於直接行動的解釋是：『所謂直接行動，就是工人自動的意思。這種行動，用不着什麼中間人的輔助，因此，直接行動不一定是暴動，雖然也許有暴動的方式。這種行動，乃是人們意識和意志的一種表示，雖然這表示包含着直接行動的壓力。非如此，工人們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索勒爾 *Q. Soler* 比利氏還要激烈，他竟然主張暴動。他以爲社會鬭爭，應該和軍隊鬭爭一樣，應該運用暴動。照他意見，暴動可以（一）促進工人的階級意識，（二）把他們在歷史中高尙使命清清楚楚地放在他們面前，（三）使他們的希望和總罷工的思想成爲一致。

政治運動是無用的——工團主義者對於任何政體都不贊成，雖然在他們中間有許多曾經為政府利用過。因為他們看準了操縱國會的總是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要和他們抵抗非失敗不可，所以他們連普通選舉也不贊成。利氏說：『普選乃是一種極蠢笨，極機械的方法，因為普選把許多漠不相關的份子集合起來，叫他們一知半解地幹着。大多數政治中的人，把他們的效力表現了出來。這效力阻止了進步，並且把少數進步，活動，和比較地更為成熟的人壓迫着。』

國家是不可靠的——他們的理由是：『國家的特性乃是客觀的統治，因為現有國家立法會議所規定的一切問題對於會議風馬牛不相及，在會議和問題中間，並沒有什麼生活上的關係，會議對於這些問題，茫無頭緒……因此，國家根本是武斷的，是壓迫的。』國家既然不可靠，那末，什麼是可靠呢？照利氏的意見只有工團是可靠的。他說：『只有工團……代表等才能夠認真地應付他們的問題，因為他們所規定出來的法律，乃是根據他們對於社會實情所有的智識。』

五 世界產業工人同盟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受法國工團主義的影響而起者有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同盟」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和英國的基爾特 Guild 社會主義。

『世界產業工人同盟』第一次開會在一九〇五年。地點在芝加哥。出席的有九個團體，三十三個代

表。他們的宣言是

「勞働階級和雇主階級決不能並立。如果千千萬萬的工人始終是衣食不足，需要缺乏，而雇主階級的少數人則安富尊榮，則決不能有和平可言。在這兩階級中間，爭鬪是永遠要繼續下去的，除非世界上所有的勞働者組織成一個階級，完全占有各種生產機關，並廢除工資制度。」

「我們看了工業的管理權一天一天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使職業組合的能力決計不能和勢力天天發展的雇主階級競爭；職業組合祇能使在同一工業以內的一部份工人和別部份工人互相抵抗，在工資戰爭中，大家失敗。職業組合也祇能幫助雇主階級迷惑勞働者，使他們相信勞働階級和雇主階級實在有彼此相通的利益關係。」

「要變更這種情形和喚起勞働階級的注意，祇能將在同一工業以內的各種工人組織起來，或在必要的時候，將各種工業的工人，一起組織起來，遇到無論那一部份的工人罷工或停工的時候，大家就一起停止工作，使一處損失，成爲全體損失。」

「我們必須將含有革命性質的警語——「廢止工資制度」——的幾個大字，寫在我們的旗幟上。這是時代的使命，使勞働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生產的軍隊是一定要組織的，不但要用生產軍隊來和資本家作每天的爭鬪，而且也要用生產軍隊，在推倒資本主義以後，來管理生產事業。我們因此要用工業的團結，在這個舊軀殼中，建造一個新社會。」

這宣言告訴我們的至少有以下數點：（一）同盟以工人為基本（二）工人階級要占領各種生產機關，（三）工資制度應當廢止，（四）普通職業組合決計不能應付時代的需要，（五）罷工乃應有之手段。

後來同盟慢慢地分裂了，因為在同盟中有共產派和無政府派的分別，這是歐戰爆發前夕的事。引導前一派的是特黎翁 *Daleon*，引導後一派的是海烏德 *Haywood*。現在特黎翁派占了優勢，無政府派的活動祇限於芝加哥西面。

現在我們要論到基爾特社會主義了。

基爾特社會主義有四個領袖。他們把基爾特學說造成了。第一是盆的 *A. J. Peaty*，他是一個建築家。有人稱他為原始時代的基爾特主義者，因為他的基爾特主義是從古代行會中脫胎出來的。一九〇六年，他寫了一部書，叫做基爾特制度的復興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System*。第二是奧來格 *A. R. Orr*。他於一九一二年在新時代 *New Age* 上把基爾特社會主義當作到自由之路，並且竭力地向勞動階級鼓吹着。第三是霍蒲孫 *S. G. Hobson*，他是社會運動中的一個宿將，他替基爾特社會主義立下了一個馬克思的經濟基礎。第四是柯爾 *G. D. H. Cole*，他是一個神童。雖然到了一九一三年才參加社會運動，但是他的貢獻却在一切人之上。他的著作工業中的自治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ial* 和工業自由 *The Meaning of Industrial Freedom* 是值得我們一讀的。

『全國基爾特聯盟會』 National Guilds League 的成立是一九〇五年的事。什麼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對於這問題社會主義辭典給了我們以下的答覆：『在管理工業的時候，生產者和國家應該合作；基爾特社會主義是根據於這思想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承認國家是需要的，純正的國會也是需要的。……同時，基爾特社會主義又主張社會主義第一種需求是要把工業權放在工人手中。沒有這種工業自由，一切社會構造的改變，都不過是官僚式的虛偽就是了。』簡言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最大目的在使工會與國家共同經營一切產業。所以有許多人說：基爾特社會主義乃是國家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之混合物。

以下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比較地詳細的內容：

基爾特的種類——所謂基爾特，有工業基爾特，普通基爾特，和分配基爾特三種。工業基爾特所包含的為運輸，農業，鑛坑，建築，印刷，紡織，衣業，糧食等。普通基爾特所包含的是醫藥，衛生，教育，法律，戲劇等。霍浦孫把政務人員也包含在普通基爾特裏面。柯爾却不然。在他的普通基爾特中，並沒有政務人員一項。分配基爾特所包含的是消費者的代表，基爾特範圍中政治團體的代表，以及生產團體的代表，因為分配基爾特所分配的就是生產者的貨品。柯爾用生產基爾特和消費基爾特來代替分配基爾特。

基爾特的組織——益的主張基爾特以地方為範圍。他的理由是：地方基爾特乃中世紀基爾特的基礎，而且只有把地方自治恢復以後，我們才可以推翻現代機器業的橫霸。在另一方面，大多數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却主張基爾以國家為範圍。其理由為：（一）地方基爾特是中世紀的產物，對於現代社會，有不適

宜之虞；（二）我們所害怕的並不是機器的自身，却是資本家支配機器的方法；（三）大多數基爾特主義者把職業組合看為理想制度的根基，職業組合既以國家為範圍，那末，基爾特也就應當以國家為範圍；（四）凡是以國家為範圍的生產，比較地總是經濟些。

除了全國基爾特之外，在區，還是有區基爾特；在地方，還是有地方基爾特。地方基爾特派代表參加區基爾特，再由區基爾特派代表參加全國基爾特。

基爾特的管理——當然，基爾特開除一個工人是很難的，因為他必須經過同業者之審查。那末，在管理上不是要發生困難嗎？不是的。民主化管理的背後是輿情，輿情可以增厚管理者的力量，如果他的判斷是不錯的話。所以柯爾說：『如果這種基爾特工廠中的管理者，還是要為着沒有權力而叫苦，那我很懷疑……不過我相信大多數管理者不再會根據權力去認明自己的地位，他們却要根據功能去認明自己的地位了。只有在民主生產的自由條件之下，做領袖的才能得到做真正領袖的機會。從此，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智能集中在工廠的發展上……從此，他可以不像現在這樣為股東們的利潤打算，而受其阻礙和束縛了。』至於管理者的任期，倘使工人不滿意於他，那就是在任期之內，也儘可以向那些和他同等的管理者請願，把他罷免。如果同等的管理者不肯罷免他，那末，這案子便可交在更高的基爾特法庭辦理。萬一，連更高的基爾特法庭也否決他們的請求，而他們還是要他離開，這證明他對於這工廠已經失去了領袖的資格，所以他還是離開的好。總之，基爾特主義的目的乃是要使每一個工廠成爲一個自治的單位。

基爾特的選舉——基爾特既然根據於民主精神，那末，選舉時候是不是可以完全公開？照柯爾說來，所謂民主，並不是一切人都可以在生產事業上任意投票的意思。他說：「倘使一件專門的事，只有少數專門的人知道，而偏要大家投票，那顯然沒有意義。即使把更專門的置而不論，我們也不能時常用民衆投票去管理工廠。」甲基爾特的領袖，只歸甲基爾特選舉；乙基爾特的領袖，只歸乙基爾特選舉。這樣，既可合乎民主精神，又可以加增管理上的效能，因為他們現在所選舉的都是些內行。

基爾特與工資——基爾特主義主張工資制度的廢止，因為工資制度是奴隸制度。那末，工人們怎樣生活呢？雷蒲孫的辦法是：各基爾特每年提出一筆款子，作為工人酬報之用。至於酬報之多寡，那是平等的。不過，有時一個人儘可得到比較地大一些的酬報，倘使基爾特全體承認的話。還有，患病或工業停頓時，仍然可以得到酬報，因為這是天災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

基爾特與政治——以大體論，基爾特主義承認政治行動還是可以有的。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全國基爾特聯盟會」開會的時候，大多數代表都主張用政治手段去訓練工人，妨礙資本主義的活動，雖然柯爾對於這一點不無懷疑之處。他的理由是：（一）在資本主義之下，要全部工人階級一致投票，或是要大多數真的具有階級意識的人得到一種真的具有階級意識的政權，那是很難；（二）即使這樣的政府是可以有的，我們也不能用國會方法在一世紀之內造成這改變；（三）現有政府的組織，不適合於社會根本改造；（四）單單用政治手段去實現改造，難免激起統治階級的反革命運動，因為統治階級是以他們的

經濟權爲根基的，……要在這受金錢支配的教育，宣傳，和壓迫的全部軍隊面前，使大多數人民養成一種健全政治思想的習慣，以時間論，實在不能。」

基爾特與政府——對於這問題，柯爾又提出了他的異議，雖然大多數基爾特主義者還是贊成政府的。柯爾說：「政府確是一種統治階級的機關。這機關不但已經受了資本家權力的惡化，而且又以壓迫爲根據。因此，根本說來，政府乃是壓迫的工具。政治所思想的不過是一種從外面勉強進入的秩序就是了。所以要想把政府改變爲一種自治和自由的表現，那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說：「政府根本根據於一種虛偽的代議制度的觀念。所謂代議制度，就是甲可以代表乙。而且當甲代表乙的時候，他所代表的，並不是一件或幾件指定的事，却是絕對的。……但是從人的觀點上說話，甲却不能代表乙，或丙，或丁。人是有個性的，是根本不能代表的。甲所能代表的，只有乙丙丁共有的意見。」

基爾特與公團——柯爾在推翻政府之後，便提出了一種替代；這就是所謂公團。公團的責任是：（一）管理全國經濟，尤其是資本的分配和價格的規定；（二）調節各方對於產業政策的意見；（三）處置各方法律問題；（四）代表全國，對外宣戰或議和等等。

其實，這種公團，還是一種政府；不過在權力上，要比較現有政府廣賅些就是了。所以霍蒲孫不肯贊成，因爲他是以民主主義爲標榜的。

基爾特與移交方法——基爾特主義主張：一切生產機關都歸工人管理。那末，怎樣叫現有資本家移

交出來呢？以下是霍浦孫的方法。他說：比如工人們要組織一個基爾特，向工業領有者說：『我們要你的工廠。』廠主的答覆是：『這廠的資本是十萬鎊，照五厘息計算，我每年的利潤是五千鎊。』工人們說：『我們不能付你現金，我們只能付你幾年津貼，而且在我們看來，你的工廠只值這些。』柯爾不贊成這種方法。他主張的是無條件的移交，因為照他看來，倘使資本的領有者還是可以得到利息，我們不是把社會主義的真諦根本推翻嗎？

基爾特與罷工和直接行動——基爾特主義者一致主張罷工是合法的。他們更進一步地說：為免除不正當的罷工起見，如果甲基爾特不滿意於乙基爾特的罷工，那甲基爾特可以用經濟絕交來應付乙基爾特。

對於直接行動，基爾特主義者又分道揚鑣了。有許多人贊成直接行動；有許多人附從柯爾，對於直接行動，加以否認。柯爾說：『基爾特主義的工作，並不在於造成幼稚的革命，却在乎按照進化的原則，把一切勢力團結起來，因為基爾特主義者的目的，在使不易避免的革命，竭力減少其內戰性質。』而且在直接行動時，工人們『必須同時占領許多在戰略上認為重要的地點……並且又要在一天之內，學習許多自治和服務的方法。我並不說這是辦不到的，却說即使辦到，也真是一件奇事。』

基爾特與波爾雪維克——自從俄國革命之後，有許多基爾特主義者相信了共產主義。他們想法使『全國基爾特聯盟會』採取波爾雪維克方法，再加上基爾特原則，來實現社會革命。一九二〇年六月，只

有蘇維埃組織制度這議案，勉強地通過，而且在這決議案底下，又加上了「我們不能超越當時的情勢而預定一個國家實在的組織方式，因為組織方式是因情勢而變遷的」一句話。其對於波爾雪維克的態度，於此可見。

第五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上）

至少從波爾雪維克 *Bolshevik* 者自己看來，他們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嫡系；同時，從十一月革命以後，波爾雪維克主義在俄國的確有了相當的成績，尤其是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成功。所以我們在這裏另闢一章，以專論之。

一 從十二月黨到十一月革命

一直到十九世紀初葉，俄國民衆還是在俄皇政府高壓下生活着，什麼革命思想都沒有。一八一二年，拿破侖侵入莫斯科。俄國自由思想，於以開始。其最顯著的成績，就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的背叛。所謂十二月黨的背叛是怎樣的。當時在俄國已有了不少醉心于自由思想的青年。他們運動聖彼得堡軍隊背叛。其目的在推翻尼古拉斯第一 *Nicholas I*，建立共和政體，廢除農奴制度。因為背叛發生于十二月，故名之曰十二月黨。這次背叛，完全沒有組織；所以，不久即為其他軍隊所壓平，背叛領袖之處極刑者五人，其餘都流放到亞比利亞。

當然，尼古拉斯第一格外加緊了他的高壓，什麼新思想都被禁止，文網之嚴密，無有過於此時代者。文

字中連「自然力」一進步一等字眼也被禁止。鼓吹自由思想的智識分子，都被拘捕。著名小說家陀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因為最小的嫌疑竟遭流放。

文網自文網，俄國民衆內心的解放，卻不斷地在滋長。詩人布雪金 Pushkin，婁蒙多甫 Lermontof，諷刺作家戈谷爾 Gogol，小說家託爾斯泰 Lyot N. Tolstoy，屠介涅夫 Turgeniev 等都在這時期產生。黑岑 Herzen 把革命雜誌偷偷地從英國運進來，也是這幾年中間的事。

尼古拉斯第一的高壓，一直到一八五四年英法意土圍攻俄國的時候，才告結束。這次戰爭，俄國雖有強大的陸軍，但因為軍械的陳舊，給養的不足，運輸的困難，指揮的不能統一，竟然一敗塗地。俄廷受了這外來的刺激，又加上尼古拉斯第一的去世，繼位的亞力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為勢所迫，便不得不改弦易轍，向改良的途徑上進行了。其第一步驟，就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農奴解放。此外，如地方自治，公共醫院，學校教育，司法獨立，縮短軍役等等，也都是簇新的政策。

按理，這些改良方法，儘可以使俄國人民滿足而有餘。孰知結果，卻不如此。比如地方自治，那表面上，雖然是一種民治的設施，在內骨子裏，却為貴族和官僚把持了去。最有關係的是農奴解放。向來俄國農奴是地主的所有物。依例，每星期須有三天為地主服徭役。地主可以將農奴自由買賣。放奴以後，獲得解放的農民，向屬國家及皇室者一千一百萬人，向屬私人地主者，其數略相等。這二千幾百萬人，並沒有得到解放的實惠，因為他們所得到的不過是一小部份的土地而已，其餘的，仍然為教會，皇室，地主所佔領。還有，就是這

一小部份的土地，也不是白白得來的。政府每年科以租金，以作償還地主代價之用。以前做農奴的時候，身體雖不自由，擔負是沒有的。現在身體雖自由了，經濟的束縛，卻一天天地加緊着。凡此種種，給革命者以很好的機會。一八六六年，喀拉戈沙甫 *Korakov* 謀刺亞力山大第二。以前黑岑所提出的「到民間去」不過是一種口號就是了。現在這口號竟藉人民黨 *Narodnik* 而實現了。一八七四年，留學瑞士朱力區 *Nizhny* 大學的俄國學生多人回國，組織秘密團體，實行「到民間去」的運動。這運動引起了許多青年的同情。軍人家庭出身的女革命家彼洛夫斯喀耶 *Sophia Perovskaya* 和無政府黨主義者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都曾參加過這種運動。

這運動終於把亞歷山大第二打死了。這是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的事。這天，亞歷山大第二乘車出遊聖彼得堡街市，革命黨人李薩哥甫 *Rysikov* 向御車拋擲一炸彈，卻未命中，僅傷隨從數人。亞歷山大第二在車中大呼：「感謝上帝，我沒有受傷。」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另一革命黨人，在旁邊嚷着：「感謝上帝，還太早些哩！」頓時又是一顆炸彈爆發。這炸彈送了亞歷山大第二的命。

單單靠這運動是不能使革命成功的，如果工業化還沒有成熟的話。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工業化的情形怎樣呢？一七六五年工廠總數二六二家，工人總數三八〇〇〇人；一八〇一年工廠總數二四二二家，工人總數九四〇〇〇人；一八二五年工廠總數五二六一家，工人總數二〇二〇〇〇人；一八五四年工廠總數九九四四家，工人總數四六〇〇〇〇人；一八八一年工廠總數三一七三家，工人總數七七〇〇〇

○人；一八九三年工廠總數三二四八三家；工人總數一四〇〇〇〇〇人；一八九六年工廠總數三八四〇一家，工人總數一七四一〇〇〇人。這統計告訴我們的是：到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已經走上了工業化的路。還有，從鐵道長度的增加，我們也可以看出俄國工業化情形的一班。在一八六〇年，俄國鐵道只有一四八八俄里，一八七〇年則為一〇二〇二俄里，一八八〇年為二一一五五俄里，一八九〇年為二七二九俄里，一九〇〇年則又為四一七一四俄里。在四十年中間，鐵道長度，增加了三十倍。

這種工業化的結果是什麼呢？第一是工人生活的痛苦。現在亞力山大第三即位了。他是俄國的羅波暗。他的暴政比以前還厲害。不用說，工人集會是懸為厲禁的，工資是很低的，工作時間是很長的，工人生活是很苦的。以前農民散居各處，要傳播革命的種子，頗感不便；現在這革命種子，却找到了最適宜的土地，因為工人是集中的。工業化第二個結果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崛起。從前種種革命，按大體而論，都是開倒車的。他們的口號是『到民間去』，他們的目的是農村共產主義的建設。但是從工業化成立以後，這些以農業為中心的運動，不攻自敗，起而代之者為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因為它是最適宜于工業化的國家的。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六日，相信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 在聖彼得堡的大教堂前而舉行示威。當時的青年和後來俄國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蒲列漢諾甫 G. V. Plekhanov 也領導了許多工人和學生參加着。這示威立即為警察所驅散。於是他們專門致力于秘密工作者有

二十年之久，到了一八九七年，方始在敏斯克 Minsk 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會議仍為警察所破壞。到一九〇三年，經蒲列漢諾甫和列甯 Vladimir Ilyich Lenin 所主編的火花 Iskra 的提議，在比利時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但因比政府的禁阻，臨時又改在倫敦開會。這第二次代表大會，是俄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在這一次大會裏，社會民主黨分成了波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 Menshevik 兩派。前者的領袖是列甯，後者的領袖是蒲列漢諾甫。波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是從俄文 bolshinstvo（多數）和 Menshinstvo（少數）兩字變成的，所以又稱為「多數派」與「少數派」。在大會中，兩派意見分歧，列甯的一派占多數，蒲列漢諾甫的一派占少數。這是波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的來源。

那末，波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的爭點何在呢？列甯主張：黨應該絕對地集中，並嚴格地紀律化，黨員的一切政治行動，應該完全受幹部的支配。他認定黨的成功不在人數的衆多，而在內部紀律的嚴密，凡不願擔任冒險工作的，不能作為正式黨員。蒲列漢諾甫則比較取和緩態度，以為只要能在幹部指導下，擔任一種工作者，便可作為黨員。此外，對於中等階級的態度，列甯和蒲氏的主張，也有不同之處。列甯主張：社會民主黨應該排斥一切自由主義，不與中等階級的民主分子合作；蒲氏則以為俄國工業化尚在開始，無產階級能力薄弱，不能立即從事社會主義的革命，所以必須先經過民主的資本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在此時期中，不妨和中等階級民主分子合作，推翻封建的專制統治。總之，波爾雪維克代表馬克思主義極端的革命的解釋，注重在武力的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的專政。孟雪維克則採取比較溫和的解釋，不贊成立即開始

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革命情緒已瀰漫全國。一九〇四年，亞歷山大第三的承繼者尼古拉斯第二謀取中國。結果，和日本開戰。俄國海軍屢遭敗北。這更引起了國內的不安。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聖彼得堡一大羣工人在神父蓋本 *Gorbunov* 的領導之下，持教會旗幟，向俄皇請願，減輕工人的痛苦，因為日俄戰事所引起的苛政暴斂，實在使他們不堪其苦了。當時俄皇不在京城。皇叔佛拉提米爾 *Vladimir* 下令，命軍隊開放排鎗，向羣衆射擊。當場死傷千五百人。這在俄國史上，稱爲『流血的星期日』。這慘案頓時激動了全國的憤慨，到處發生擾亂，這裏工人罷工，那裏海軍叛變，這裏農民暴動，那裏地主被害，舉國騷然，草木皆兵，政府一時來不及鎮壓。在這紛擾之間，第一個蘇維埃 *Soviets* 便應運而起。『蘇維埃』這字在俄文就是『會議』的意思。這蘇維埃在聖彼得堡成立，由各工廠及各工會代表組織而成。其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和列甯齊名的杜

洛茨基 *Leon Trotsky*

欺騙是歷史中統治階級緩和革命情緒的不二法門。尼古拉斯第二對付一九〇五年革命所用的欺騙手段，是他十月三十日所設立的民選國會 *Duma*。因爲這國會，名爲民選，實則爲政府所包辦。第一屆和第二屆自由主義者及革命份子占大多數，所以均爲首相司徒里本 *Stolypin* 所解散。後來，政府把選舉法修改了。工人階級幾和沒有選舉權一樣。農民和俄國內部少數民族的選舉權，亦受嚴格限制。到第三屆開會的時候，完全是地主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

政府第二種欺騙手段是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八日頒布的土地法。這個新法律，把俄國向來特有的一種農村公社之剷除了。不錯，農村公社是農奴制度的殘餘，司徒生本應許農民將公社所分給的土地永遠作為私有財產，對於農民，這不是一種恩惠嗎？不是的。在農村公社沒有剷除以前，農民無論怎樣苦，還可以藉公社以為活，等到公社沒有了，少數富農以其剩餘資本收買土地，造成新興地主階級，而大多數貧農，或因所分得的土地不夠贖養全家，或因沒有耕種的資本，不得已把土地出賣，久而久之，成為餓殍。所以土地法的目的，只在博得農民一時的歡心，何嘗在真正地為農民計呢？因此，它只是一種欺騙手段而已。

因這欺騙手段而起的最不幸的影響，是革命高潮的低降。國會和土地法，的確可以遮掩一部份革命者的耳目而有餘。趁這革命氣餒緩和的時候，政府便可以為所欲為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聖彼得堡蘇維埃提倡總罷工。結果，沒有成功。蘇維埃代表多人却為所捕。一九〇五年最後一禮拜，莫斯科紡織工人發生暴動，政府軍隊開砲轟擊，傷亡多人。結果，沒有人起來反抗，這血案也寂然無聲地過去了。一言以蔽之，從一九〇五年以後，政府的高壓比以前要厲害得多，因為現在他們的高壓是不會遇見反抗的了。計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三年，經軍事法庭處死刑的政治犯，多至三千餘人。這是他們欺騙手段暫時的成功。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這使緩和了的革命情緒又緊張起來；而且這次的情緒，竟然把羅曼諾夫 Романов 皇朝推翻了。究竟歐洲大戰怎樣可以使革命情緒緊張呢？我們知道，聯軍要俄國擔任的是歐戰線。以人數論，德國軍隊那裏敵得過俄國，但事實却告訴我們，俄國軍在德國人面前，正比以卵擊石，屢遭頓

挫，因為俄國的將領太腐化了，技術太幼稚了。這種消息傳到本國，人民聽了，怎能不向政府懷恨呢？又因為死亡過多，為補充隊伍計，不得不徵之于農民；然而這次徵兵却很勉強，因為一般人都知道，如果去了，生還的希望是沒有的，誰無父母，誰無兄弟，那一個人情願讓他的父親和兒子到前綫去送死呢？當然，他們非抗命不可。即使服從，也只敢怒而不敢言。還有，農村動員的結果，是耕地的荒蕪，農產的減少。在城市中，糧食分配，採用麵包券制，大多數人民不得一飽。總而言之，人民的怨恨，麵包的缺乏，便是這時代俄國情形的素描。革命情緒，於以緊張。

這情緒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便噴射了出來。二月二十七日，有三十萬工人在聖彼得堡舉行罷工運動。三月初，聖彼得堡飢民開始劫掠麵包。三月三日，聖彼得堡宣佈戒嚴。過了四天，紡織工人及其他工人罷工，要求麵包的口號，遍地皆是；同時又雜以要求媾和之聲。政府派哥薩克 Cossack 兵去鎮壓，但是那些兵士，對於罷工者，不但不以武力對付之，反而暗暗地鼓勵他們。最足以令俄皇痛心的，就是他所手造的國會，也對於他表示不滿了。他們竟然通過了一條議案，說：『這種雙手滿粘着人民熱血的政府，不應當准其再進國會。國會和這種政府，應當永遠斷絕關係。』隨着，俄皇發出一道解散國會的命令；而國會却置之不理。俄皇威信，至此可謂掃地已盡了。十一日，在聖彼得堡的通衢大道上，站滿了革命的羣衆。司令官吩咐兵士向羣衆開鎗；他們不但不肯用命，反而倒戈相向，把他殺了。同時，革命者為要抓住這風起雲湧的革命狂潮起見，夜以繼日地把羣衆組成工人代表會。十二日早晨，革命的組織已完備了。京城到處只看見成千論萬

的人參加羣衆示威大運動。甚至俄皇最親信的警衛軍，也加入了革命隊伍，把工人代表大會改爲兵工代表大會。十五日，國會宣稱他們和兵工代表大會一致主張廢黜俄皇，組織一個代表各黨的臨時政府。他們把這宣言送給俄皇。他看大勢已去，不得已，便簽了退位書。羅曼諾夫皇朝，從此告終。

從三月革命至十一月革命，謂之臨時政府時期。臨時政府壽命只有八個月，而其更迭却有三次之多，即梅劉可夫 *Milukov* 臨時政府，克倫斯基 *Kerensky* 臨時政府。梅劉可夫臨時政府的角色，統統是資本家，除了克倫斯基一人之外，他們的政治大綱是：（一）釋放政治犯，（二）言論出版自由，（三）勞動者結社和罷工的自由，（四）社會上，宗教上，民族上的束縛，一律廢止，（五）賦全國人民以普通選舉權，並預備召集國民會議，定新的憲法。這幾條是三月十八日宣布的。這是很清楚的。臨時政府並沒有看到民瘼所在。他們所宣布的，充其量，只能造成一個民主國家。當知三月革命之所以爆發，全是由於俄國人民對於麵包與和平兩大問題不能得到解決的緣故。在臨時政府的宣言中，何嘗有此兩大問題的痕跡呢？這給波爾雪維克派以最好的反抗的機會。所以臨時政府成立不久，波派便提出了以下數條：（一）大家應該不與資產階級所操縱的臨時政府合作，一切權力應該交給蘇維埃；（二）蘇維埃應立即將土地和各種壟斷利權的實業收回，使社會主義得以實現；（三）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挑撥的，他們主要的利益在剝削人民，各處無產階級應當起來，強迫政府媾和；（四）常備軍應該取消，而代以武裝的民團。當然，蘇維埃把這幾條通過了。臨時政府鑒於蘇維埃聲勢的浩蕩，於四月二十七日，發表贊成

蘇維埃決議案的宣言。五月一日又發表一種宣言，要求協約國聲明戰爭的目的。但又附上了一「臨時政府對於協約國，當竭力留心，保持其一致行動的態度。」一語。這話引起了民衆的懷疑。於是又發生示威運動。結果，梅劉可夫爲勢所驅而提出他的辭呈。這是五月十六日的事。

接着，是聯合臨時政府的成立，在右派看來，聯合臨時政府較之梅劉可夫臨時政府要滿意得多，因爲內閣中除了克倫斯基之外，又加上了五個社會主義者。不過，聯合臨時政府對於以上兩個問題——麵包與和平——依然沒有辦法，經濟恐慌，日益加甚，農務總長傑洛夫（Chelobov）所設置的土地委員會，用意雖然很好，但在銀行家和反動者攻擊之下，欲求其行使職權，談何容易？那末，聯合臨時政府對於戰爭問題的態度怎樣呢？它是贊成戰爭的。六月二十二日，全俄大會開會時，列寧爲了這問題竟然和克倫斯基大起衝突。所以在七月二十日於波派指導之下，羣衆把沃夫（V. E. Lvov）所率領的聯合臨時政府推翻了。

克倫斯基畢竟是一個有手腕的人，他一方面爲戰爭問題和列寧衝突，而一方面却又能獲得全俄工兵農代表大會的擁護，在新內閣坐了總理的交椅。這大概是他信口吹簧的小技，有以致之的吧！當然，他登基後第一要圖，就是壓迫波爾雪維克報紙，逮捕或驅逐列寧，杜洛茨基諸人。同時，他爲討好各方起見，於八月二十二日，召集了一個全國代表非常會議。前後三屆國會議員及各經濟團體，公共機關的領袖，均在被邀之列，共計一千四百餘人。這會議沒有什麼結果，因爲份子太複雜了，意見太分歧了。其實，克氏的目的又何嘗在求會議的成功呢？他不過要藉此會議以敷衍各方罷了。可惜，克氏的敷衍手段還沒有十分高明。爲

什麼他不連波爾雪維克派也敷衍一下呢？不然，所謂十一月革命，至少要展遲些，臨時政府的壽命，不致於如此短促。

波爾雪維克派宣布克氏政府之死刑，其客觀條件為何？曰和平，土地，工廠。這是民衆所要求而得不到的三點。茲以和平問題爲例子。在克氏就職後沒有幾天，俄軍總司令柯尼諾夫 *Konionov* 背叛了。東歐戰綫之根本動搖，不言可喻。但是克氏還是視若無睹地大唱其矢忠於協約國的高調，而以人民爲犧牲。所以當時俄國實在已經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這是波派所抓住的客觀條件之一。十一月三日，波派開會。其時，列甯等已經回國，他們鑒於客觀條件之既已成熟，乃決定以七日爲奪取政權的日子。是日，滿城殺氣，克氏軍隊和赤軍火併，有數小時之久。到了下午二時，杜洛茨基在俄京蘇維埃會中，以軍事革命委員會名義，宣布克倫斯基政府的廢止。十一月革命，於以閉幕。

二 從十月革命至列甯去世

現在統治俄國的是波爾雪維克派了，其中心人物爲列甯。所以我們先從他說起。

『列甯』本來不是他的名字。這是他在革命時所用的假名。他本來叫佛拉丁矛伊令谿烏利鴉諾夫 *Vladimir Ilyich Ulianov*，以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於俄國。父爲鄉村教師。他是一個希臘教徒。兄亞歷山大，因謀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被處死刑。這慘劇，對於列甯一生很有關係。因爲他哥哥是謀殺俄皇的，所

以他在中學畢業後，不得入俄京大學，而轉至喀桑 Kazan 專修法學。後來，他還是進了聖彼得堡大學。在那裏，領了法學士學位。一八九二年，執行律師職務。列甯在喀桑時，早已傾向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在執行律師職務時，同時，又致力於工人組織。他社會革命的實際工作，於此開始。此外，他又發表了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其時，在論壇上，人民黨勢力，正是方興未艾，列甯却大膽地向人民黨領袖米哈羅夫斯基 Mikheyevsky 挑戰。當然，列甯的聲譽便因此而增高。二十五歲，他離開俄國，致全力於秘密工作。閱兩年，為警察所獲。於是，他第一次到西比利亞，而度其流放生活。在那裏，他住了三年。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Russian Capitalism 是那時候寫的。一九〇一年，他做了火花的副主筆。火花與俄國革命很有關係，這上面已經說過。一九〇三年，他與蒲列漢諾甫發生爭執，結果，波爾雪維克派於以產生。接着，他創立了一種代表波爾雪維克立場的刊物，這刊物叫做前進 Forward。

一九〇五年，波派開第一次大會。在這大會中，他主張「俄國革命不應該以達到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為滿足，非進而至於社會革命不可。」一九〇六年後數年，乃是俄國革命史上最沉悶的幾年。列甯利用了這機會漫遊全歐。在巴黎圖書館中，朝作暮輟，對於馬克思思想，作進一步的研究。歐戰爆發，當前問題就是：社會主義者應否參加戰爭？親麥華德 Zimmerwald 會議的答覆是：工人階級當以促成和平為唯一職志。列甯就是這會議的主角之一。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的時候，他便根據這信念把臨時政府推倒了。

十一月革命前列甯生活的大概已如上述。以下是蘇聯歷史的初期，同時也就是列甯生活的後半葉。劈頭，我們應當知道的是十一月革命後蘇聯所發表的宣言。這宣言叫做勞苦的和被侵略的平民權利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Toiling and Exploited People，是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的。這宣言經過幾次修正和充實，不過在原則上，並沒有改變。因為這是最重要的，所以照錄之如下：

「一、現在俄羅斯是一個工兵農蘇維埃的共和國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權，完全交付在這蘇維埃共和國手裏。這蘇維埃共和國是自由民族的自由結合，是許多民族的共和國的聯邦。

二、因有下列幾種目的，如（甲）防止人類互相侵略，（乙）廢除社會上種種階級的區分，（丙）消除侵略者，（丁）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團體，（戊）保障社會主義在各地的勝利等等，所以大會特發表下列幾條宣言：

（1）因為要使土地作為社會的共有財產，廢止個人私有權的緣故，所以我們應當使俄羅斯共和國的領土，成為全國人民的財產，根據各人平等使用的權利，將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勞働者。凡是含有公共價值的森林，礦產，水道，農具，家畜，田地與農場，完全歸為國有，作為國家的財產。

（2）……各種生產機關，各種分配機關，統統歸為國有。關於工人管理產業，和最高公共

經濟委員會二道命令，我們完全承認。

(3) 我們也承認要解放勞苦羣衆，脫離資本主義的羈絆，非將各家銀行移歸蘇維埃共和國不可。

(4) 我們要消滅社會中的寄生分子，使產業組織建築在公共的基礎上。凡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民，都有工作的義務。

(5) 爲保全勞苦羣衆的權力，消滅侵略者恢復政權的能力起見，我們要工人們武裝起來組織紅軍。這樣，我們才可以完全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

三、戰爭所演成的是流血……都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促成的。我們要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爪牙中，把人類拯救出來。大會贊成蘇維埃委員會所提出的下列幾種行動：

(1) 〔子〕廢除種種密約。〔丑〕現在軍隊中工人和農民是互相反對的。我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造成友誼團體。〔寅〕停止戰爭賠款。〔卯〕採用革命方法。〔辰〕提倡民族自決。〔巳〕實行沒有割地，沒有賠款的無條件的媾和政策。

(2) 完全破壞資本制度下，文明社會所採用的野蠻政策。這無非是幾個指定民族中的侵略者，在奴隸幾萬萬亞洲殖民地和一切弱小國家的勞苦羣衆時，所用的政策就是了。

(3) 承認芬蘭的完全獨立。撤爲俄國駐在波斯的軍隊。把自決權交付於亞美尼亞。

menia

(4) 取消俄皇政府向外國銀行及國內富翁所借來的款項。對於國外銀行家及資本家，這是第一個打擊。

(5) ……現在政權已經完全操在勞働羣衆和他們的代表機關——工兵農蘇維埃——手中了。」

歸納起來，這宣言有五點：(一) 確立勞働階級專政的國家；(二) 用直接行動來達到目的；(三) 採用中央集權制；(四) 提倡國際主義；(五) 主張共產主義。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接受了德國以命令式發表的和約。這就是著名的布勒斯特尼多維斯克條約 Brest-Litovsk Treaty。關於這種條約，蘇聯代表發出如下的宣言：『我們絕不隱諱地昭告於德俄兩國的工農兵與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羣衆。我們迫於不得已，不能不接受那擁有雄厚勢力的敵方所提出的最後通牒，簽字於那用最後通牒形式提出的絕不容絲毫猶豫的和約。』從此，我們便知道蘇聯求和的苦心了。就是城下之盟，他們也在所不計。其實，在列甯等看來，這並不算爲恥辱，因爲他們是沒有國家畛域的，俄國向德國求和，在於國際主義者，有什麼損失呢？同時，非媾和，波爾雪維克派在俄國是沒有辦法的，因爲他們亟應對付的國內問題正多哩！那有餘力和外國周旋？還有，怨戰是當時俄國人民的普遍心理。新政府落得這樣一來，以結好於民衆。蘇聯求和，蓋有所見而如此的。

和約既成，新政府可以高枕無憂嗎？正如上面所說，他們亟應對付的國內問題正多哩！第一個他們亟應對付的問題是國內戰爭。十一月革命以後，波爾雪維克派雖然獲得了政權，但是一班貴族軍人、地主、資產階級，那裏甘休？他們聯合起來，和波派政府為難；連孟雪維克派和社會黨黨徒也不絕地向波派政府猛攻。這些反對新政府的人，統稱為白黨。再加上國外帝國主義者的干涉，國內紊亂，愈益加甚。比如一九一八年夏間，協約國闖入俄境，一面對俄示威，一面以軍需及技術援助白黨。所以到了一九一九年秋天，白黨將領台尼金 Denikin 和宇登尼楚 Yudenitch 幾幾乎把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攻陷了。到現在，俄國舊有領土如芬蘭、愛沙尼亞 Estonia、萊多維亞 Latvia、立陶宛 Lithuania、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還是不在俄國版圖之內。革命後俄國內部的糜亂情形，於此可見一斑。幸虧紅軍得力，到一九二一年，才把國內白黨戡平了；雖然在國外到如今還有白黨時起時伏地在活動。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夜，把俄皇全家在地室中執行鎗決。這一件事，與整個平亂計劃，未始沒有關係；不然，禍根未除，後患未可逆料。

第二個亟應對付的國內問題是經濟。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這五年，一般人稱為戰時共產時期。在這時期中，一方面因為內亂未平，一方面又因為各國對它實行經濟封鎖，國家經濟，已走上了不可收拾的危途。據報告，一九二〇年所出顏料，較戰前，僅百分之二又二，橡皮百分之一又七，火柴百分之十六，酒精百分之十，澱粉百分之十五又六，石油百分之三十三，金百分之十二，鐵百分之十二，熟鐵與銅百分之四，紙百分之十五又二，玻璃百分之十三，煙草百分之十六又七，糖百分之九，煤百分之二十五，銅百分之五十，

白金百分之三十三，硫黃百分之四十，棉紗百分之三又三，麻織物百分之三十三，棉花百分之二十，麵粉百分之十八，鉛筆百分之十二，這是對於工業說的。農業亦然。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全俄食料總數僅八八一·〇〇〇蒲特。據一九一八年夏統計，蘇聯力量可以及到的食料，只有五一·〇〇〇蒲特，而這五一·〇〇〇蒲特，還在富農和中農手中，他們不肯無條件地交給政府，讓它來調劑。這是革命後俄國民食艱難之一斑。若論財政，則更不得了。工業農業既然如此，欲求財政充裕，其可得乎？茲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國家收支言之。一九一八年支出為四·六三八萬，收入為一五·五八〇萬；收支兩抵，相差三〇·八〇一萬。一九一九年支出為二一五·四〇二萬，收入為四八·九五九萬；收支兩抵，相差一六六·四四三萬。於是政府就濫發紙幣，以支危局，結果，盧布價值，一落千丈。照專家推算，一九一八年初，十鎊錢只換得四百五十盧布；一九一八年，可以換四千盧布；一九二〇年，竟然可以換六萬盧布。在三四年中，盧布價值，竟一落千丈。所以在那時候，一個俄國人要想買一雙英國皮鞋是很難的。再論失業問題，其數字也足以叫人咋舌。一九二〇年普通工人的工資差不多祇有戰前百分之十八。工人因工資銳減，不得已，祇能回到鄉下去。一九一八年，在主要工業中，工人數目還有二百四十萬。到一九一九年，祇有一百二十萬了。到一九二〇年，名義雖說還有七十五萬，但是實際上，真正做工的人數，不過四十萬而已。以一個偌大的俄國，而在主要工業中，祇有四十萬工人，其失業問題之嚴重，可以想見了。總之，革命以後，或者說是戰時共產時期，俄國的經濟狀況，是工業衰落，農村破產，財政窳敗，民無所事十六個大字。

那末救濟之道何在？這就是我們所習聞的新經濟政策。這政策在沒有正式宣布以前，聽到的人，大都加以非議，因為照他們看來，這是反動行為，是共產主義失敗的明證。列甯爲平定輿情起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發表了他對於新經濟政策的解釋。他說：『我看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的採用新經濟政策，是一定要令人咋舌的。他們說：我們轉變得太激烈了。而孰知單從表面論，我們也可看出新經濟政策是包含着我們多量的思想。蘇維埃政府對於新經濟政策到底應該發生什麼關係？對於這問題，自從在布勒斯特尼多維斯克與德國議和之後，就是在那和平建設似乎可以着手的一九一八年的前半年，我們曾經審慎周詳地研究和計劃過。當時，我對於農民生活，不斷地前後思維，希望國家資本主義能有起色。但是內亂的勃發，以及一般人對於共和失望的危險，逼迫我們去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不過短時間的經驗，却告訴了我們，社會主義的管理與社會主義的試驗時期，還是不能成立。共產主義最低限度的發達，還是不可能。這事實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教訓。』這告訴我們：新經濟政策的目的，在求國家資本的發達。民衆聽了這段話，當然釋然而不再懷疑了。一九二一年一月，這政策正式開始實行。

新經濟政策的內容，可以分農業和工業兩方面。革命後，俄國農民所感到的最大的壓迫，就是政府頒布的穀物徵收法。這征收法，把農民的脂膏幾乎吸盡了，因爲這徵收法是漫無限制的，只要政府需要，農民非供給不可。這樣農民怎能不怨呢？所以在一九二一年第十次共產黨大會中，列甯便說：『我們要實行糧食課稅法，那我們就應當在今天晚上用無線電使人人知道我們對於農民已經讓步。』所謂讓步，就是

(一)廢止穀物徵收法;(二)對於中農和小農課以最低限度的租稅,對於貧農完全免徵;(三)租稅率由各地方機關定之;(四)租稅外之贖餘穀物,聽農民自由處置。這幾條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所頒布的關於農業的新政策的大概,同時也就是農民的福音。

關於工業方面,新經濟政策所提出的是企業租借,工區租借,和小生產三條。企業租借的意思是這樣的,有許多企業,如鐵道礦產等,因為規模宏大,所以只得由國家來辦理;但是另有許多企業,比較地規模小些,然以數量論,也很可觀,蘇維埃政府實在沒有兼顧的餘力去經營它們;這些企業,儘可租給工人合作社,或私人企業家。承租者暫時取得享用權,而所有權仍屬於國家。承租者必須依照契約,將生產的一部份交給國家,作為租金。這樣辦,在於承租者可以取得利潤,在於國家,則有租金之享受。企業租借之利如此。

工區租借這辦法,對於俄國極為適宜,因為它不但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而且也是一個生產落後的國家。比如西比利亞所包含的富源,沒有開採過的,十之八九。如果能夠租給人家,或至於外國資本家,讓他們來開採,那末,政府便有租金的好處。同時,按照工區租借辦法,等到期滿,承租者須將一切設備完全交與蘇維埃政府。這樣,除了每年所收的租金之外,幾年之後,俄國更可以白白地得到許多設備完美的大企業。這何樂而不為呢?

按照共產計劃,小工業沒有存在的餘地,一切都由國家用大量生產方法包辦的。現在蘇維埃政府既然沒有力量包辦一切,那何不讓小工業存在,省得那些不能參加大量生產機關的人空閒着?同時,小工業

又可以補國家大工業之不足。蘇聯有鑒於此，乃於新經濟政策中，提出鼓勵小工業的辦法。蘇聯政府更看到小工業可以輔助大工業的發展。等到大工業發展了，小工業自然能夠消滅。所以新經濟政策之鼓勵小工業，並不是承認它可以永久存在的意思，不過是一種過渡辦法就是了。

現在我們要看新經濟政策的成績了。

先從工業方面說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甯說：『重要的工業須有國家的補助。若無重要的工業，則吾人雖為一文明國，亦必歸於敗滅。關於本問題，吾人今日應取斷然手段。吾人已獲有興辦重要工業的必要資金。雖迄今所獲數額僅二十萬盧布，但總數已確實在握，而顯然可用以增高重要工業之水平線。』果然，到一九二三年，工業生產總額已經占了整個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七·八；較之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沒有頒布以前，加增了百分之三十八·八。工人總數占了全人口百分之九·三。較之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的前幾年，何啻天壤？

其次為農業。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全俄耕作面積為八六·四三二·〇〇〇德謝丁。一九二一年，一落而為五〇·一〇〇·〇〇〇德謝丁。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成立。於是由五千多萬德謝丁增而至於六〇·三〇〇·〇〇〇德謝丁。一九二三年，更進而至六六·三〇〇·〇〇〇德謝丁。一九二四年，全俄耕作面積已與戰前相差無幾了。其總面積為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德謝丁。再根據地段來看，新經濟政策實行後，耕作面積，較之戰前究竟怎樣？一九二四年，俄國南部耕作面積，已經到了戰前百分之七十三·又

九，西比利亞百分之九十五又四，烏克蘭 *Донец* 百分之九十七又四，中部耕種面積竟超過戰前百分之十四。換句話說，新經濟政策宣布後，祇有一二年工夫，農業情形差不多已經和戰前一樣，有許多地方，竟駕而上之。

再次爲商業。一九一九年，輸入爲三・〇三〇・〇〇〇盧布，輸出爲一〇九・〇〇〇盧布，這是很清楚的。在那一年，輸出幾等於零，這是因爲各國對蘇聯經濟封鎖的緣故。同時也因爲蘇維埃政府剛才成立，應付內亂之不暇，那裏顧得到入超和出超這些問題？一九二〇年，輸出固然增而至於一・〇八四・〇〇〇盧布；但是輸入也加了許多倍而爲三六・二〇〇・〇〇〇盧布。按大體而論，一九二〇年較之一九一九年要起色得多，因爲出入總數已經飛增了起來，雖然輸入還勝過於輸出。到了一九二四年，情形却大不同了。輸入爲二〇〇・五三三・〇〇〇盧布，輸出爲三三九・六八九・〇〇〇盧布。換言之，輸出已超過了輸入。同時，以出入總數論，一九二四年也比一九二〇年加了很多倍，因爲現在蘇維埃已經在新經濟政策指導之下，大量地生產，大量地消費了。

在還沒有離開列甯之前，有一個問題我們認爲有認識之必要，這就是何謂列甯主義？

俄國名著者海克 *J. F. Hecker* 在他的莫斯科談話 *Moscow Dialogues* 中，把列甯主義的內容以及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別，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我們。他說：「對於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別這個問題，列甯的學生和他的信從者已經答覆過了，雖然他們的答覆有不同之處。有許多人以爲列甯主義

不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應用，而且特別適合於俄國革命條件。這就是說，列甯主義乃完全是一件俄國東西，而以俄國為範圍的。對於這種限制，我們做共產黨信徒的不能承認。我們不相信這界說足以包含列甯主義而無遺。另有許多人以為列甯主義就是使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時和他主義中所有的包含革命成分的幾點，重新活起來的意思。這界說的出發點是對的，無論從思想或手段方面說，列甯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據。這就是西方社會主義的投機者所抹殺的一點。不過，列甯並不止於此。他一方面根據馬克思的大前提，一方面更進而使這些大前提在他自己的時代中得到自然的結論。斯丹林 Joseph Stalin 是列甯的一個忠實的信徒，同時在現代共產主義運動中，他又是一個為一般人所承認的領袖。他以為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呢？
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別，以及列甯主義的界說，已如上述。那末，究竟列甯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

(一) 列甯主義主張無產階級應當革命。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有三種根據。第一，根據現有經濟制度，以及工人階級不時的躍躍欲試，無產階級革命，乃是可能的；第二，根據帝國主義的發展，以及弱小民族的反抗，無產階級革命已成了弓上之箭，非發不可；第三，根據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以及彼此間的明爭暗鬥，無產階級革命，非成功不可。

(二) 列甯主義主張無產階級應當專政。只有無產階級革命而無無產階級專政，所有革命，亦僅等

於曇花一現，無持久之可能，因為統治階級還可以死灰復燃地起來反動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謀勝利於永久。這是列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理由。不但如此，他更主張：這『專政是絕無妥協，絕無憐憫的階級鬭爭。』而且凡是以前屬於資產階級的，統統不能參政。只有無產者才能有選舉權。關於這點，他在國家與革命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裏說得很清楚。

(三) 列甯主義主張應當成立無產階級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黨來指導革命，實行專政。這黨有以下幾種任務：第一，它是無產階級的先進者。無產階級發生於資本主義之下，覺悟的程度，當然參差不齊，所以先進者先須組織起來，指導整個革命。第二，它要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使他們對於鬥爭中應有的規畫，系統，集權，和分工得到充分的訓練，因為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核心。第三，它要把全民衆組織起來。不過一切其他組織，都該以黨為中心。第四，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藉以奪取政權。第五，它應當代表革命的統一意志，所以內部決不能有小團體或小組織。

(四) 列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應當與農民合作。他認定無產階級革命，其成敗，全視大多數農民能不能與無產階級合作而定，因為農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亦不減於無產階級之苦痛，他們一方面受政府之徵斂，他方面直接受地主之壓迫，其革命心，當與無產階級相等。所以列甯承認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友軍。考茨基批評列甯說：『波黨與農民攜手，是波黨主義的妥協。』當然，考氏的意思是：列甯主張和農民合作，不是誠意的，不過要利用農民罷了。其實，這種批評，未免吹毛求疵，因為列甯所以要和農民合

作，是因爲農民的痛苦和無產階級一樣的緣故，何所謂「妥協」？何所謂「利用」？

(五) 列甯主張民族自決和無產階級革命有密切關係。他看得很清楚：第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每每以帝國主義爲先鋒；第二，帝國主義每每以弱小民族爲根據地；第三，弱小民族所感到的痛苦，除了資本主義的榨取之外，還有帝國主義的威脅。所以要戰勝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非鼓勵民族自決，使各弱小民族羣起而與帝國主義爲難，與無產階級裏應外合不可。同時，弱小民族，只有和無產階級聯絡了，才能解放自己。列甯在一九二〇年第二次第三國際大會中提出的「在蘇維埃俄羅斯樹立的勞農專政，必然的，非與全世界資產階級爲敵不可。因此，在一方面蘇維埃俄羅斯非把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牽做自己一派不可，在他方面它們也非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同盟不能達到解放之路」就是這個意思。

一九二二年，列甯得病。他力疾從公地幹着，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他易簣時只有斯丹林一派人在旁邊。杜洛茨基到高加索養病去了。這是斯杜之爭和斯氏大權獨攬的伏線。

第六章 波爾雪維克主義（下）

一 從列甯去世到現在

從列甯起病一直到杜洛茨基被逐，在蘇聯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斯丹林和杜氏的明爭暗鬪。以下是兩巨頭的歷史。

杜洛茨基生於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他在我的生活 *My Life* 中說：「這就是第一次謀炸俄皇的那一年。」換句話說，杜氏生下來的时候，俄國革命情緒正在緊張。其影響於杜氏革命生活，當非淺鮮。杜洛茨基並不是他原有的名字。他原有的名字是布朗斯丁 *Bronstein*。實在，他是猶太人。不過居留在俄國罷了。他受過大學教育。在二十歲光景，他已開始革命，並且拘禁了好久。最後，他被流放到東西比利亞。這種拘禁和流放生活，對於杜氏，却是一種造化，因為他的學問和思想就是在這時候得來的。一九〇三年，他寫一本關於革命的小冊子。這小冊子提高了他的聲譽。所以到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他已經是衆望所歸的領袖之一。一九〇九年，聖彼得堡蘇維埃成立，其主角就是杜氏。以後，他爲俄皇所不容，不得已離開俄國。臨時政府成立，他和列甯先後回國。當時列甯只在暗中活動，而杜氏却出席蘇維埃，與各派短兵相接，從事於政策上的

論戰不久，克倫斯基把他關了起來，繳二千盧布保證金而得脫獄。其時列甯正潛伏在外國，杜氏則代表波黨在俄國繼續其反臨時政府的工作。十一月革命爆發，其中負直接指導之責者，乃是杜氏。所以就革命功績論，杜氏並不在列甯之下。多半爲了杜氏太書生氣，十一月革命成功，列甯便執了波黨的牛耳。

其實，杜氏還有進身的希望，因爲他是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不幸，斯丹林和他爲難，因爲他們兩個人不但在政策上有出入之處，就是在性格上也完全是不同的，而且杜氏的創業性格，根本抵不過斯氏的守成性格，因爲現在革命已經成功——至少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利未納 Isaac Don Levine 在他的斯丹林傳 *Stalin* 裏有這樣一段話：『革命有離心力和向心力的不同。屬於前者爲杜氏，屬於後者爲斯氏。當革命的星球，在隕石和它的光噴射出來的時候，那映照著的是杜氏的名字；斯氏却包裹在黑暗中。以後，革命的火燄統統噴盡了……蘇聯已經安定下來，向成功的途徑上咬定牙根而苦幹的時候，那坐在中間的，便是斯氏了。』旨哉是言！果然，到了一九二七年，斯氏把杜氏開除了黨籍。接着，就是流放。到如今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他還是在一個「沒有護照的星球」上流浪着。

◎ 杜氏的政敵斯丹林，和杜氏年齡相同。他生於高加索。時爲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十四歲時，就研究馬克思學說。繼爲神學生。十七歲，和社會民主黨發生關係。翌年，從神學開除了出來。二十歲，正式加入社會民主黨。這是他做社會主義者的原因：『第一，我們相信現有狀況的不正當和不公平。於是我們決意竭盡能力以挽狂瀾於既倒……我做了馬克思的信徒。這可以說是我社會地位所造成的。我父親是一個

皮鞋廠的工人，我母親也是一個勞働者。還有，我做了馬克思的信徒，因為在我四周，有革命的刺激……末了，我做了馬克思的信徒，因為當我在神學的數年中，我看到了耶穌教會的壓迫，以及正宗教神學中那種嚴格的排除異己的行動。』一九〇〇年，聽到了列甯的名字。一九〇一年，因政治嫌疑，逃往巴統 Batum。後來，還是入獄。幸證據不足，遂放了出來。一九〇二年，二次被拘。在牢獄中有兩年之久，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他是無產階級鬪爭 The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的主筆。其時，多數派和少數派爭執甚烈。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黨內分歧的大概 Briefly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arty。同年，波黨在芬蘭開會。斯氏初次和列甯見面。一九〇七年，提弗利司 Tiflis 劫案發生了。他們所搶的錢，雖然涓滴歸公，並不爲了私人的利益，但是揆諸黨規，却不無抵觸之處。這劫案的首領是斯氏。於是經黨的討論，覺得非把他開除不可。幸虧列甯從中調解，得以幸免。然而他所受的虛驚，已經非同小可了。有許多人說斯氏之銜恨於杜氏，乃始於此。這話或者有些道理吧！接着，巴庫 Baku 石油工人罷工。斯氏當然是有分的。於是乎再次入獄。斯氏終其身，被拘次數，很多很多，但每次總是從輕發落，因為斯氏生性不露光芒，在無論那一種運動中，他在幕後指揮着，而且很有力地指揮着，等到捉了進去，官廳總覺得他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而不予以嚴重的處分。一九一一年，斯氏的勞苦功高爲一般人所承認，而被擢爲中央委員。同時，他把波黨機關報真理報 Pravda 抓住了。這對於他以後的生活很有關係，因爲一個黨的機關報，就是它的喉舌，把這抓住了，整個的黨，便在他手掌之中。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據說斯氏在這時候，態度不明，他所主辦的真理報，沒有把波黨對於歐戰

的態度說明。他的緘默引起了杜氏的批評。杜氏說：「斯氏站在旁邊，緘默無言。在這時代，所有一切論文，沒有一篇使我們覺得斯氏還以他以前的立場爲念，而與列甯取同一之陣綫。他簡直閉口無言。因爲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中，他所指導的事業太不幸了，太把他屈服了，所以他覺得還是引退的好。他從來沒有明目張膽地爲列甯辯護過。他只是袖手旁觀而等候着就是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時，真理報態度還是模稜兩可，似乎有左袒克倫斯基的嫌疑。畢竟斯氏是一個十分高明的人。臨時政府推翻之後，布勒斯特尼多維斯克條約還是他和列甯起草的呢！一九一八年，列甯派他到各處去調查軍隊。杜氏在軍隊中用了許多不屬於波黨的人。這給了斯氏以一個反對杜氏的機會。一九一九年，斯氏與前妻脫離關係。他現在所娶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他的名字叫奈達（Nada）。其時，斯氏已年越不惑。同年他做了「拉白克令」（Radwin）的領袖。這是一種和偵察隊相仿的組織。其實，偵察隊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但是一經斯氏的手，這沒有意義的組織，便一變而爲極有意義的了。連列甯也怕他，屢次要他重組。一九二二年，他們叫他做了中央委員的總秘書。這或者是他們對於他的方法，因爲一方面這缺分，名目雖然好聽，實權是沒有的，一方面他們可以把「拉白克令」從他手中奪過來，以免他的猖獗。但是斯氏終究是一個非常的人。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過了不久，這有名無實的總秘書缺分，在他手裏又發生意義了。他利用這缺分來造成自己的勢力。斯氏之所以有今日，即基於是。一九二四年列甯逝世後，杜氏辭了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他却坐了列甯的交椅。一九二六年，杜氏聯絡許多人向他攻擊。結果，「反對派」失敗。明年，他們開除了杜氏的黨

籍。和杜氏同時被開除的有季諾維夫 *Ninova* 和加美納夫 *Kamenov*。這兩個人說起來也希奇。他們本來是和斯氏同派的。有一次，他們提議開除杜氏的黨籍。斯氏以為時機未至，加以反對。他們的提議不得通過。從此，他們就銜恨斯氏。在一九二五年十月第十四次共產黨大會時，他們竟然提出攻擊斯氏的不信任案。以後他們反而和杜氏聯絡了，而杜氏也居然接受他們。歷史家稱這聯絡為「不純潔的聯絡。」杜氏之一蹶不振，恐怕就是爲了這緣故吧！閱三年，有悠久革命歷史的布哈林 *Bukharin*，多謨斯基 *Tomsky*，李考夫 *Lepko*，也爲斯氏所排斥。現在掌權的是清一色的斯丹林派了。斯氏手段之高明，於此可見。

現在我們要問：斯杜兩派政策上之爭點何在？

(一) 杜派對於新經濟政策始終反對。杜氏在他所著的 *Whither Russia* 中說：自從新經濟政策宣布之後，社會主義在俄國已經失掉了它發展的可能性，因爲新興資本家一旦產生，資產階級的經濟勢力一定要增長起來。假使他們的勢力超過了社會主義的勢力，那末，俄國不是有回到資本主義危途上之可能嗎？

斯派的答覆是：「經濟事實已經昭示了我們，俄國的確一步步地向着社會主義的建設而進行。新經濟政策絕對沒有叫我們直向資本主義退後的意義。列甯的意見是第一退却，第二重整軍容，第三反攻。這三樣行動是一種偉大的戰術。由此戰術，我們可以獲得將來的勝利。」

(二) 杜派對於國營工業提出質問。他們說：所謂國營工業，到底是社會主義的呢？還是國家資本主

義的呢？他們認定當時的國營工業，從所有權方面看來，固然是社會主義的，因為一切都由無產者管理，但從人的關係說，却不是社會主義的，因為所有支薪方式等，都不是社會主義的。

斯派的答覆是：俄國國營工業，絕對沒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分成。國營工業的勞動者，他們自己就是工業的主人，和管理者，與資本主義下之被剝削者，迥不相同。所以無論從所有權或人的關係上說，俄國國營工業，確是社會主義的。

(三) 杜派以為政府對於中農太優待了。他們的意見是：中農和富農的界限很難分清。富農可以剝削貧農，那末，安知貧農不也受中農的剝削呢？如果我們一味放任中農，一意優待中農，那對於貧農和無產者，太對不起了。所以杜派主張多多加增中農的擔負，使他們沒有變成資產階級的可能，同時更須免去貧農的擔負。

斯派的答覆是：俄國農民，中農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剩餘農產品的生產，全仗他們。輸出國外的麥穀，大半是他們的剩餘農產品。若是壓迫他們太厲害，他們就不樂意於生產，國外貿易，即因之而停頓，國內經濟，也因之而動搖。所以對於中農特別加以鼓勵，乃是當務之急。還有，對於中農如果優待些，那有叫他們左袒無產階級的可能。這是斯派優待中農的理由。

(四) 杜派主張把合作社肅清。這問題是由於上一問題而發生的。據杜派調查俄國合作社大部份為中農和富農所占有，貧農的勢力很小很小。富農和中農既然不容易分清，那末，合作社不就是為富農所

操縱了嗎？其去社會主義何止千里？所以他們主張肅清合作社，使下層中農和貧農在合作社中占優越地位。這樣才能合乎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不致墮入資本主義的陷阱。

斯派的答覆是：中農無論在生產上或消費上，均處於極重要的地位。如果把他們從合作社中推了出去，那末，合作社不是因貧農沒有支持的力量而關門，就是為真真的富農所把持。而且政府對於合作社有種種法律，可以監督它們，斷斷不會使它們資產化的。

（五）杜派反對英俄絕交中，俄國所取的敵對態度。他們說：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絕對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將來戰事發生，雙方犧牲的不過是無產者就是了。以無產者為犧牲，而博得一國之勝利，這種國家，斷斷不能為世界無產者所信任。社會主義斷斷不能從這種國家中產生。反之，這種戰爭，僅足以助成國家主義之氣焰耳。

斯派的答覆是：杜派的所謂「自私的和狹隘的國家主義，祇顧蘇聯，不顧世界革命」完全是誤會。他們說：國家的任務和國際的任務，不可分別而論。國家的勝利並不是目的，祇是一種方法。換句話說：如果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所敗，試問社會主義的試驗場在那裏呢？反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勝利正所以致世界資本主義之死命呢！

（六）杜派反對和英國工黨領袖聯絡。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結果，工人屈服了。這當然是斯派所應當負責的。於是杜派大肆攻擊。照杜派看來，所謂工黨，亦均一邱之貉，和他們商量，乃是靠不住的。他們說：

當時極應該把英國工人領袖召集起來，從純粹的共產主義的立場上來討論這次罷工。斯派計不出此，而聽了爲虎作倀的工黨的話，使工人立城下之盟，這難道不是斯派之咎嗎？這是杜派所提出的。

斯派的答覆是在有許多國家中，資本主義還是很穩定。在這種國家中，我們只能作革命之準備，而不能盲從。所以斯派批評杜派，說他們患了左傾的幼稚病。

(七)杜派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說：中國革命，只有靠着真正的共產黨黨員才能成功。他們又攻擊斯派沒有把中國工人武裝起來，以對抗中等階級，致一般無產者反受摧殘。他們的反對，在國共分離和中國各處共產黨運動接一連二地被鎮壓下去之後，格外有力。他們說：這一切他們早已料到。

斯派的答覆是：杜派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完全沒有知道。中國革命乃是民主革命，而不是杜氏所說的反關稅革命。換言之，中國革命的目的乃是在打倒封建殘餘，而不是在打倒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以國共合作，是可能的；因爲這樣，共產黨可以拿國民黨當作護身符，把各地下層階級組織起來，以促成反資本和反帝國的革命運動。至於爲什麼不把工人武裝起來，那是很清楚的。因爲照斯派看來，工人武裝，尙非其時，先只要利用國民黨的兵器來打倒封建殘餘，然後把工人武裝起來，從事反資本和反帝國的革命運動，當不爲遲。這是斯派的主張。不幸過了不久，留漢分離，因清黨運動而犧牲的共產黨青年，不知凡幾。現在斯派在中國所用的政策，恐怕是一種修正案吧！

除了和杜派爭執之外，斯氏難道沒有更積極的設施嗎？有的。這就是他所提出的第一屆和第二屆五

年計劃。茲舉其大概如后：

五年計劃的前身是一九二一年的「全國電氣計劃」和一九二三年的「發展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冶金工業的方案」。到了一九二七年，果然，全國生產力達到了戰前的水準。於是他們便一鼓足氣地踏進了五年計劃，雖然正式的五年計劃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才宣布的。

那末，他們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中間做些什麼？他們要看：生產率的增添究竟是怎樣的？最初，在八月時候，他們希望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加百分之十六又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加百分之十三又一，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加百分之十三又七，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加百分之十又五，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加百分之十又五。到了十二月，生產率突飛猛晉，他們覺得八月間之預計有增加之必要，乃修正爲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百分之十八又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十六又六，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百分之十七又六，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百分之十三又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百分之十八又八。到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年計劃正式發表的時候，他們覺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估計還是太保守。於是大膽地改爲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廿一又九，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百分之廿又二，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百分之廿一又八，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百分之廿二又六，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百分之廿二又六。這是他們最後發表的數字。

只過了四年，他們的所謂五年計劃成功了。而且有許多部門，竟然遠超過了原定的數字。茲就其榮榮

大者，如工業，農業，和勞工問題三方面言之，已覺其成功之驚人。

社會主義國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工業的發展。對於這一點，他們確已做到了。四年內重要工業之發展，要超出五年計劃原定數字百分之三。一九三二年重工業產額，比之一九二八年竟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八又六。若以一九二四年爲一百，到一九三二年則最重要的數門重工業之發展，便又如下的數字：計石炭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九，生鐵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八百八十六，電力產額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二，而機器產額則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二百零八。若以蘇聯四年中工業情形和其他各國作一比較，則覺其他各國之退步，以及蘇聯之進步。假使一九二八年蘇聯和其他各國工業生產均爲百分，則一九二九年，德國爲一百零一，英國爲一百零六，法國爲一百零九，美國爲一百零七，蘇聯爲一百二十四；一九三〇年，德國爲八十九，英國爲九十七，法國爲一百十，美國爲八十七，蘇聯爲一百五十六；一九三一年，德國爲七十二，英國爲八十九，法國爲九十八，美國爲七十三，蘇聯爲二百另八；一九三二年，德國爲六十七，英國爲八十九，法國爲七十四，美國爲五十七，蘇聯爲二百三十四。據德國經濟學院統計，蘇聯一九二八年工業生產額次於美德英法而居第五位。一九三〇年七月間，已超越英法而進居第三位。八月間，更越德國而昇至第二位。所以蘇聯現在已經由農業國一變而爲工業國。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額和農業生產額的比較爲四十八又七與五十一又三；一九三〇年爲五十三與四十七；一九三一年爲六十與四十；一九三二年爲七十與三十。

農業集體化乃是五年計劃第二種成功。一九二八年，國營農莊爲三千處。一九三二年，加到五千八百二十處。一九二八年，農莊爲三萬三千處。一九三二年，一躍而爲二十一萬一千處。一九二八年，耕地面積爲一萬萬一千三百萬公頃。一九三二年，略增而爲一萬萬三千六百三十萬公頃。一九二八年，國營農莊和集體農莊耕地面積爲五百九十萬公頃。一九三二年，竟變了一萬萬另五百十萬公頃。至於個人農戶，一九二八年，竟有二千四百十萬戶之多。一九三二年，減少至九百四十萬戶。一九二八年，機器曳引機站只有一處，一九三二年飛也似地到了二千四百九十八處。一九二八年，曳引機爲二萬六千七百架，一九三二年，加了五倍有餘，而爲十四萬七千架。換句話說，現在蘇聯百分之六十又六的農民已經集體化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已經社會化了，百分之五十三的集體農莊已經利用機器曳引機來耕種了。

勞工生活之改良乃是五年計劃第三種成功。當世界各國失業問題尖銳化的時候，蘇聯却一個失業的人也沒有，這是五年計劃的功勞。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平均登記的失業工人亦達一百五十萬人。一九二九年，失業開始減少。一九三〇年秋，有許多工業竟然缺少工人了。一九三〇年十月，停止失業救濟，因爲各人只要請求工作，即有工可作。估計一九三一年需要三百萬新工人，一九三二年需要三百五十萬新工人。到現在，我們可以說，在蘇聯個個人有飯喫，倘使他要的話。這與人浮於事，粥少僧多的其他各國，何啻天壤啊！若論工人待遇，較之以前，亦顯然有進步了。工資爲戰前之百分之一百六十七，而且不分男女，只以熟練之程度標準。女工產前產後，各休息八星期，工資照給。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社會保險，母性

保護，住宅改善等總數，由九億八千萬增加到十四億盧布。所以一般人的消費力也增加了。比如棉織物之消費。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較之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又二；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較之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又三。肉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較之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又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較之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又七。唯有在有豐富收入的社會中，才能有這樣的消費力。所以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就是那些反對蘇聯的人，也不能抹殺事實而加以否認。

第一屆五年計劃的成功，就是第二屆五年計劃的開始。以下是第二屆五年計劃之大概：

(一) 關於電氣業的計劃。第二屆五年計劃預定電力的生產到一九三七年須增加六倍。要由一九三二年的一百七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增加到一千萬萬啓羅瓦特小時。這數字要超過英國而與美國並駕齊驅。爲實現這計劃計，他們決意把第尼泊 Dnieper河下游，北高加索，莫斯科，列甯格勒等地方電網趕快完成。

(二) 關於機器製造業的計劃。第二屆五年計劃的指令告訴我們：『機器產額到第二屆五年計劃末，必須比之一九三二年至少要增加三倍乃至三倍半，以便改造工業，運輸業，農業，和商業。這一切均須有本國自造的最新式，最進步的機器來供給。』照這計劃，到一九三七年，蘇聯汽車生產量要超過任何國家而稍遜於美國。按預算，曳引機每年要產生十七萬架。這數目比歐洲各國之總和還多。

(三) 關於冶鐵的計劃。他們希望到一九三七年，熟鐵生產要增加到二千二百萬噸；較之一九三二

年要多兩倍半。這數字又可以叫蘇聯在歐洲居第二位。所以他們現在正竭力在各地建設冶鐵廠，並發現新的鐵礦，以便採用，因為機器製造業，沒有鐵是無能為力的。

(四)關於燃料的計劃。一九三二年煤之產額為九千萬噸。到一九三七年，預算要增加到二萬萬五千萬噸。這在歐洲將超過法德而與英國不相上下了。至於石油產額，在一九三二年為二千八百萬噸。他們預定到一九三七年，須增至八千萬乃至九千萬噸。這樣，要增加三倍。在全世界要占第二位，而只遜於美國，並且要用從來沒有用過的方法來開鑿，以期產額之增多。

(五)關於輕工業的計劃。這比較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要看得重要些。他們預計至一九三七年，每人工業製品和食物消費量要增加兩倍乃至兩倍半。他們現在已經把輕工業區從西部移到東部，因為在原料方面，比較地東部容易採辦。比如把紡織廠移到列甯格勒，把紡蔗廠移到東西比利亞，把製糖廠移到中亞細亞，南高加索等處。這一切都證明他們用心之所在。計一九三三年一年中，他們開辦了鞋廠兩處，每年產額九百萬雙；皮革廠一處，每年產額二千八百萬噸；橡皮廠一處，每年產額兩萬噸；皮板廠三處，每年產額一萬二千噸。

(六)關於農業的計劃。他們決定要在第二個五年中，把農村經濟完全集體化。那時，我們所看見的不再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田或是地，而是汪洋一片了。為完成這集體化農業起見，他們第一着眼的便是機械。他們希望在一九三七年，要有五千五百乃至六千處機器曳引機站，二十五萬架收穫機，一百萬啓羅瓦

特的電力，十七萬架一年的曳引機，使耕種面積從一九三二年的一萬萬三千六百三十萬公頃，增加到一萬萬七千萬公頃。糧食生產增加到十三萬萬公擔。這就是說，那時蘇聯每人每年所消費的糧食，可增至一公擔半。比之一九三二年加百分之七十五。

(七)關於交通的計劃。在第一個五年中，關於鐵道的數字可以說沒有達到。所以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對於這一點，特別注重。預定至一九三七年終，要增加強力車頭四千輛，甲種車三千輛，四軸貨車二十六萬輛，三軸客車五萬輛，暖水車一千輛，新敷鐵道二萬五千至三萬公里。汽車以前祇行駛於通都大邑。根據第二屆五年計劃，凡短距離交通，無論工業中心，或農村，統統要用汽車。他們預算每年造四十萬輛，以供應各地之需要。航空為現在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照第二屆五年計劃，除現有之航綫外，要新開幹綫七八條，支綫尚不在內。飛機製造也要採用最新方法。照各方估計，不久，蘇聯航空事業，定要駕世界各國而上之。

(八)關於合作社的計劃。或者說：根據第二屆五年計劃，蘇聯既然要在這期間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末，合作社不是莫須有的嗎？這是不對的，因為列賓說過：『在無產者掌握的國家權力之下，合作社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他又說：『如果在完全合作社化的場合，我們兩脚已踏在社會主義的地盤上了。』所以，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不但不看輕合作社，且決定要竭力擴充合作社網。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兩年中間，合作社社員預定要增加到一萬萬二千萬。這就是說，十四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要捲入於合作社網內了。

(九)關於技師訓練的計劃。高俸厚祿四個字在蘇聯是沒有的。就是斯丹林每月亦不過二百二十盧布；什麼辦公費，車馬費，一概沒有。不過他們對於技師，却特別優待。平均每人月薪在四百盧布以上。其重視技師，從此可見，因為在物質建設期間，技師是最需要的。他們現在把工業學校七年制改為九年制。同時把普通學校的課程大加修改，特別把重點移到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數學上去。他們最新的口號是『波爾雪維克定要懂得工藝技術。』

(十)關於個人物質生活的計劃。第二屆五年計劃說：『第二屆五年計劃期間，重要工業區住宅須能夠充分保障一般住民，並擴充公共生活事業網，如公共飯堂，洗衣處等。』這關於住的問題。至於食的問題，除上面說過到一九三七年每人每年消費糧食要增加到一公擔半外，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其他食料，也有增加了。比如肉類每人每年要增加到五十公斤，牛乳類每人每年要增加到二百五十公斤；對於產業工人，每人每年肉類消費，竟增加到五十五公斤，牛乳類增到三百五十公斤。此外，關於衣方面的，如布匹，毛織物，皮鞋等，到一九三七年，較之一九三二年，也要增加兩倍乃至三倍。

(十一)關於文化的計劃。第二屆五年計劃，對於這點，特別注意。他們規定在一九三三年中，文盲問題，完全解決。到一九三七年，自七歲起至十七歲止的兒童，統統要受生產教育。未屆學齡的兒童，一律要進幼稚園。托兒所須將城市和鄉村所有孩子，悉數包含在內。日報銷數要增加到一萬萬五千萬份，書籍要比一九三二年的十二萬萬本增加八倍。

第二屆五年計劃宣布到現在，已經一年多。據本年七月十四日莫斯科報告，我們深覺得這第二屆五年計劃，確有成功之可能。這報告說：『據重工業人民軍需部數字，蘇聯一九三四年重工業一年度計劃，上半年已完成百分之四十七或四十八。……六月來重工業方面之總產量共值九·四〇〇百萬盧布，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十八，比一九三〇年全年所產，多三一三百萬盧布。……而勞動力則僅加百分之十，又二，是見勞動生產力有長足之進步。……以下為本年上半年重工業各重要部門的結果。煤產總額為四千四百萬噸，去年同期為三千四百六十萬噸，增百分之二十六又九。銑鐵總產額為四百九十一萬噸，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五十四又七。……鋼總產額為四百四十九萬一千噸，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四十八又四，捲鋼總產額為三百另九萬噸，比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三十六又一。……其他重工業部門，與去年同期相較，其增加情形如下：鉛增三倍，火車頭增百分之三十三，運貨火車增百分之五十又七，運貨汽車增百分之三十四又二，汽車增百分之二百三十九，曳引機增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又七十九，硫化銅增百分之六十七又四。……』

二 蘇聯與宗教

蘇聯在明目張膽地反對宗教，這是誰都知道的。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一般人幻想的幸福。……是被壓者的嘆息，是人民的鴉片。民衆一定要消滅這幻想幸福的宗教，才能得真正的幸福。……』「將來的真理」

消滅以後，才能建設「現在的真理。」這樣，天國的批評才能變為世間的批評，神學的批評才能變為政治的批評。」當然，這種話對於以祖述馬克思思想自居的波爾雪維克主義者，發生極大的影響。比如列甯夫人說：「我們必須漸漸地把一種唯物主義的精神灌輸到教育裏去，努力地對於兒童的組織下工夫，在他們中間發揮友誼的精神，切切實實地把屬於宗教的精神拔去。」

「戰鬪的無神論派同盟會」是蘇聯最大的反宗教團體。據調查，該會會員在一九二六年只有九萬八千四百另二人；到一九二七年却成了十二萬三千另七人。過了兩年，一躍而為七十萬人。一九三〇年，竟飛增到三百萬人。其雷厲風行的情形，於此可知。

反宗教博物院乃是蘇聯反宗教運動中所用的又一方法。這些博物院的前身都是教堂或寺院。現在他們却拿來作為反宗教運動之大本營了。其中陳列的盡是反宗教的東西。比如莫斯科反宗教博物院，第一部陳列的是人類解剖標本，自受胎以至病老死亡，應有盡有，以表示人類的生死，可以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而不在宗教範圍之內。第二部陳列的是宗教所奉為神聖的蛇，蟲，鳥，獸，及偶像等，並說明其歷史的由來。第三部陳列的是宗教的罪惡，比如勾結皇室，虛糜國幣，斂錢欺人，殘害人生等等，均用統計，照片，圖畫，幻燈，模型，公文等來表現。

蘇聯對於宗教的態度在艾迪 Sherwood Eddy 和蘇聯當局的談話中表露得很清楚。以下是蘇聯當局的答覆：

「在階級鬭爭中，這些教士時常擁護白軍，這些修道院有時會變做砲台來反攻我們。這些祭司時常領導民衆，從事反革命運動，以抵抗政府。有許多白俄在國內失敗了，以後就逃到外國，並且在法國、美國，以及世界各處，唾罵我們，或捏造各種謠言……在鄉村裏，教會所宣傳的宗教，大概是幻術和迷信。我們的態度很是寬容，使各種宗教團體在法律上都有地位。這種反抗我們的宗教勢力，並不是屬於君主主義的，却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他們想和新經濟政策底下的商人、富農，和知識階級聯合起來，這樣，我們的仇敵便可向我們下總攻擊了。他們雇用別人的勞力，這和我們的經濟計劃相衝突。我們現在正在農民社會化期中，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凡與我們的經濟計劃相衝突的，在我們看來，都是反革命。所以凡是反對我們集體農業計劃的祭司和牧師，都是我們政治上的仇敵。有些人利用宗教，做他們反對經濟計劃的假面具。政府對於他們，究竟怎樣處理，是依照他們對於政治和經濟的態度以及活動而定的。」

接着，那當局又說：「你又提起最近法律與憲法關於宗教條文的改變。我們對於自由和良知的原則並沒有改變。沒有一種宗教或是信仰曾經被逼迫過。但是他們的政治陰謀或經濟反抗，却處處要受箝制。在我們的政策底下，宗教幻術和宗教迷信均已消滅。所以我們的高級官員，看見有些地方的民衆對於教會發生仇敵的精神和反對的行爲，便要禁止哩！」

艾迪又問他：「宗教中有什麼原質是一定要與現在蘇聯政府的政策相衝突的？」他的答覆是：「宗教和蘇聯政府必然地，並且絕對地不能相容。這兩種制度一定要互相衝突，互相對峙。我們絕對主張對於一切

剝奪行爲，奴隸制度和社會不平，非反對不可。一般宗教的傳統，和俄國宗教的習慣，都准許壓迫手段。你們主張階級和平。我們主張階級鬭爭。你們基督教的原則是要使階級鬭爭的刀鋒變鈍。我可以重覆地說：沒有一個人爲他的宗教信仰而受逼迫。他們受裁判乃是因爲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或經濟上反對我們的緣故。」

那當局關於宗教教育有什麼話呢？他說：「我們特別注意普通學校中和大學中對於青年人所施的宗教教育。照我們看來，宗教是一種極大的迷信。我們很想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使純粹的科學，得到勝利，把一切和宗教連帶的迷信，以及反社會的態度，從青年人心中統統除去。我們知道在你們自己的許多大學中，如同田納西 Tennessee 省大學，他們禁止學生研究達爾文和進化論。你們有許多屬於先天的迷信的見解，盤踞在你們的大學裏，所以宗教在那裏似乎還可逗留……：：：你說：在美國你們有教授有神，或無神，宗教，或反宗教的自由。你問我爲什麼不讓人民去自由選擇，自由相信他們所要相信的東西。我說：他們不會相信他們所要相信的，却會相信人家告訴他們的東西。所以我們就告訴他們，什麼東西是應當相信的。」

以上是蘇聯政府中人對於宗教的態度，也可以說是蘇聯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因爲他是代表政府說的。現在再看蘇聯學者對於宗教的態度，並以海克爲例子。我們從上面便知道海克寫了一本莫斯科談話。在這談話裏，有一班質難他的人對他說：如果蘇聯對於教會加以保護，那末，安知它不會爲政府出力呢？

海克的答覆是：「統治階級總是利用教會來侵略人。教會對於現有的一切專制行爲，沒有不予以超自然的贊助。教會也許情願和我們言歸於好。俄國教會中的會督和牧師也許一片好心，情願幫我們的忙。但老實說：這種幫忙，我們却斷斷不敢領受，因為他們的目的在叫我們讓步，使他們恢復革命時所失去的權力。我們儘可以沒有他們而把我們的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因為羣衆和我們合作。我們用不着拿欺騙來保持我們的權力。讓教會去自求生路，如果在它裏面有一種生存的能力的話，目前我們祇能很殘忍地把教會的欺騙暴露出來。我們要給全世界知道在我們的社會秩序中宗教沒有它的地位，除了把它看爲一種博物院的古董和未來人類的警告之外。」

難者又說：在歷史中，有許多人是相信宗教的；換句話說，沒有他們即無所謂現在的文化，對於這些人，我們該怎樣說呢？海克說：「我們可以領他們的教；摹仿他們，却不是我們所做的。法蘭西唯物主義者把宗教看爲欺騙，這我們不至於如此。我們用歷史法和辯證法來觀察宗教。結果，我們覺得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宗教沒有它存在的餘地。」

談到這裏，難者要他講宗教的來源了。因爲普通反對宗教的人都說：宗教乃是統治階級捏造出來，用以壓迫下層階級的。對於這一點，海克的意見却與普通反對宗教的人不同。他說：「何爾巴哈 Holbach 法國著名反宗教的哲學家。他說：『永生是人們想出來用以證明上帝的正義，使上帝對於世人所受的痛苦，可以不負責任，雖然就是他所愛護的人，也在受苦。』他的理解不以歷史爲根據。宗教信仰並不是任何人

想出來的，却是從生活環境中產生的。造成這現狀的是懼怕，無知，痛苦，和好奇。此外，人類對於自己生活都希望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這種希望和以上懼怕，無知等合起來，造成了生活的環境。因此，照我看來，宗教是理論，是爲人知道。在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當中，這種理論，却時常左袒統治階級，而爲他們所利用，以抑制羣衆。」

難者最有力量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等，他們無論怎樣否定宗教，但是在不知不覺間，他們却表現了宗教的精神，因爲照宗教者看來，他們那種爲人類謀幸福而不怕赴湯蹈火的精神，就是宗教精神。那末他們故意否定宗教，又何苦呢？海克聽到這裏，似乎覺悟了。他說：「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爲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你們所認爲非常的事。我們沒有工夫去思想。當然，你們的術語我們是不能贊同的，因爲像「上帝」那樣一個名詞，也許成爲一種罅隙，使宗教反動的微生物，爬了進去。你們知道我們不是機械論者……爲什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克魯泡特金以及其他的人，竟然會反對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做了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動的領袖？爲什麼別的人不是如此？這是心理學家和歷史家所應注意的一個問題。」

末了，質難他的人把宗教和科學這個問題提了出來。當然，他們是振振有辭的，因爲近代科學家差不多都已經承認在宇宙間，除了五官所能及者之外，更有不可思議者在。對於這問題海克只能說：「這一切，將來如何，我們未敢逆料。我們做共產黨信徒的，有我們眼前的目標，我們必須把自然力戰勝，使自然力爲我們所運用，以滿足我們的需要。」

從蘇聯當局對於艾迪所說的話，以海克的答覆，我們便得到了一個觀察，就是蘇聯反對宗教，並不是哲學的，乃是政治的。就哲學論，他們沒有否定宗教的可能，就政治論，他們覺得宗教在現在的蘇聯有損而無益。

是不是蘇聯絕對不許人相信宗教？不是的。不然，蕭伯納在他的蘇俄旅行記中，爲什麼有這樣一段話呢？他說：『在這座教堂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新造的禮拜堂。這禮拜堂造得非常奇怪。裏面有一位牧師，他在那裏禱告。來的人非常虔誠。他們禱告的樣式，真有精神。他們跪下來用頭在地上碰着。牧師說一句，各人便喃喃地唸一句，以表示他們心中熱烈的信念。如果在倫敦韋斯敏斯德 Westminster 教堂作這樣怪聲，他會被警察捉去，治以喧嘩之罪。禮拜堂中人數很少，連我在內，也不過十五個人而已。……我當時深覺蘇聯政府爲這十五個人而保留一所禮拜堂，未嘗無理。我真高興，因爲我知道在蘇聯公開禱告亦和其他國家一樣的自由，一樣的爲法律所許可。』足見反對宗教是一件事，宗教自由却又是一件事。而且政府還不許人民與教會無理取鬧哩！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委員會公佈說：『凡是離開黨的路線去反對宗教，這種根據於成見的舉動，我們不能允許。』又說：『假借人民自動要求一各名義，呈請行政機關，封閉教堂，對於這種行動，應確實制止。』究竟蘇聯看宗教是什麼一回事，於此可見一斑。

第七章 無政府主義

大概說來，無政府主義分爲四派：（一）蘇提列爾 *Max Stirner* 主張一切東西都是我的，他採用個人主義，所以他的無政府主義應該稱爲『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二）蒲魯東和巴枯甯 *Mikhail Bakunin* 主張一切東西都不是屬於誰的，他們相信集產主義，所以他們的無政府主義應該稱爲『集產的無政府主義』；（三）托爾斯泰主張一切東西都是上帝的，他以基督教爲出發點，所以他的無政府主義應該稱爲『基督教無政府主義』；（四）克魯泡特金主張人賦有萬物，他是共產主義者，所以他的無政府主義應該稱爲『共產的無政府主義』。

以下是蘇提列爾的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蒲魯東和巴枯甯的集產的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以及克魯泡特金的共產的無政府主義的大概。

一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蘇提列爾

蘇提列爾以一八〇六年生於德國拜壘特 *Bayreuth*。原來他的名字叫做士密特 *Schmidt*。蘇提列爾是他的別號。他的父親是一個樂師，其貧苦可見。但是他的家境並沒有阻止他對於哲學興趣。其時，新黑

智兒哲學已經產生。其代表爲費爾巴黑。Feuerbach以前人崇拜的對象是上帝和理智。費氏於二者之外，又加上了人類。其實，這已經夠革命的了。不過蘇氏却還以爲不是。他說：以人類爲崇拜的對象，不啻用人類來束縛自我，基督教束縛自我的工具是上帝，現在我們進一步地拿人類來束縛自我，這不是一件更糟的事嗎？這是蘇氏反對費氏哲學的主要原因。

從這自我主義，他推而至於無政府主義。他說：『一般人的呼聲是國家。他們不絕地在那裏追求毫無不爽的憲法和結構得再完美的組織……國家思想侵入了各個人的心中，引起了各個人對於國家服務的熱忱。這個人間世的上帝，造成了新的宗教信仰……於是特殊利益和個性統統被驅逐了。爲國犧牲，便成了我們的口號。』他更說：『所以國家與我，二者有不共戴天之仇。我是利己的，所以我對於這人類社會的幸福，並不關心。我不爲其犧牲，只利用之就是了……更使其成爲我之所有物。』所以把蘇氏作爲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代表，再恰當也沒有了。

蘇氏在根據於他的自我主義而反對國家之後，對於共產主義又提出了他的攻擊，因爲照他看來，共產主義是壓迫個人的。他說：『共產主義把個人的所有物統統取消了。要我服從別人，服從全體；其目的顯然地在攻擊國家，但其自身，却又是一種國家，一種宗教，一種妨礙我自由活動的東西，一種支配我的上峯。……如果我們廢除個人所有制度，那末，各人便毫無所有，大家都是窮光蛋。對於最高的發號者，對於唯一的司令者，我們變了平等，成了同樣的人。換言之，我們都成了空洞者。對於最高的所有者，我們一個樣子地

成了窮光蛋。在現在狀況之下，甲的身分，在乙的眼光中，是一個窮光蛋。到將來，連這估量也取消了，我們都成了窮光蛋。等到我們成了共產社會的百姓，我們便可以稱為破產者了。」那末我們對於財產，應當存怎樣的態度呢？蘇氏對於這問題的答覆，不但顯示了他的自我主義，而且更使我們知道他自我主義所包含的侵略性，是何等濃厚啊！他說：『我的財產是我力所取得的。我對於那一種財產有享受的權利呢？對於我能力所能占有的一切！我賦我以所有權。由是我取得所有物……凡人不能向我奪取的，仍然是我的所有物。所以，解決所有物的是實力。我要取得一切，只能期望於我的實力。』這就是強權是真理的意思。近代帝國主義的蠻橫，就是這種學說造成的。

蘇氏死於困頓，時爲一八五六年。

二 集產的無政府主義——蒲魯東、巴枯甯

蒲魯東生於柏桑爽，時爲一八〇九年。他父親是種田的。一直到二十二歲，他還不過是一個排字的人。他的教育就是在排字時候得到的。後來，他從柏桑爽書院得到了一筆一千五百法郎的年金。於是，他重復入學。一八四〇年他發表了他的何謂財產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閱六年，他的經濟制度的衝突或貧困的哲學出版了。三月革命以後，他在國會中提出了一個計劃，其目的在組織國家財政，使各人得到生產工具的供給。不幸，這計劃以六百九十一對二而遭失敗。於是他自動地組織了一家銀行，以期其計劃之實

現，可惜爲了缺乏資本的緣故，這銀行數星期之後，不幸短命而死。此後，因爲破壞檢查法，遭了三年拘禁。他結婚很遲。其時年越不惑。他娶的是一個少年工人。一八五八年，他又寫了一本書，叫做革命和教會中的正義 *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Eglise*。在這書裏，他對於教會，攻擊之不遺餘力。結果，他做了第二次的階下囚。釋放後，他跑到比利時。一八六〇年，他回到法國。閱五年，他死於巴息 *Paris*。

以下是蒲氏思想的大概：

蒲氏主張以秩序代替政府。除了上面所舉的蒲氏著作之外，還有兩種作品，也是他寫的，就是革命黨員的懺悔錄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 和 十九世紀革命的概念 *Ide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在這兩種著作中，他說：『無政府是沒有主人，沒有君王的。……沒有一個人的意見，可以作爲最後的，除非我們證明他的意見不錯。誰也不能把意志代替理智。誰也不是君王。』這就是他的無政府主義。那末，無政府就是無秩序嗎？不是的。他說：『最完美的要算是秩序的聯合和無政府了。』這樣，他的無政府是有秩序的。他說：『這種牢不可破的習慣，叫我們把無政府看作一個無秩序的堆積和混沌的表示。……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應當按照統計部所有的論據去解決。一切關於國際政治的，是國際統計的問題。政治科學乃是科學院之一部。科學院的常務幹事，就是科學部的部長。』所以把無政府和無秩序混爲一談，這恐怕是蒲魯東所否認的吧！

蒲氏主張以勞動規定財產。蒲氏最先發表的是「財產就是賊賊」一語。但是我們却不能以此爲蒲

氏反對財產的根據。他所反對的是不勞而獲的財產。比如一個有錢的人，他死了，他的遺產就變爲他兒子的財產。其實，這兒子除了「生得逢辰」四個字之外，還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他父親的遺產就是他的財產呢？這種財產，照蒲氏看來，簡直是一種賊贓。反過來，蒲魯東便主張只有從自己勞動得來的，才得謂爲財產。而且這勞動的價值，有一定的標準。比如一個人用若干分量的勞動，產生一件貨品，而定這貨品的實價。如果他在實價之外，加上一分，使貨品的價值超過實價，那末，這人也是強盜。這樣，所謂「財產就是賊贓」，其目的不在反對財產。從勞動得來的財產，是可以有的。

蒲氏主張以生產工具的公有，造成酬報平等。倘使勞動可以規定財產，那末，我們不是有酬報不平等的危險嗎？比如一個化了十年研究而發明一件東西的人，比之一個苦力，不是更有價值嗎？不是可以得到更大的酬報嗎？蒲氏有鑒於此，乃倡生產工具共有的說法。他那組織銀行的目的，就是在此。以下是他的話：「天文家所產生的是觀察，詩家所產生的是詩，學者所產生的是經驗。他們已經消耗過工具，書籍，旅費等等。現在倘使這消耗是社會供給他們的，那末，無論天文家，學者，或是詩人，還要什麼別的獎勵呢？」這豈不是酬報平等的辦法嗎？

蒲氏主張以良心代替法律。他說：「法律也該如此……人有自行判決的權利。如果他覺得有錯，如果他以爲受了責罰是於自己有益的，那末，他便可自動地要求責罰。正義是良心的一種作用，是出於自願的。良心只好由自己來判斷，來責罰，來解說。其餘一切都是權威的制裁，都是權力的濫用。我知道，一個犯了盜

案或暗殺的人，不曾與社會宣戰。所以社會應當要求他，或甚至於強迫他，把他所造成的損失，恢復過來，擔負起來。但還要因他起來，折磨他的精神和肉體，甚至於把他絞死。我敢再說一句，社會實在沒有這種執行權。法庭審判廳等等之立即和完全的撤廢，乃是革命中最初步要求之一……把一切法律統統廢除，只要一條夠了，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有一點，我們不能誤會。就是蒲氏的良心制裁，並不是反社會的，因為他對於社會制裁，還是承認的；不過他反對普通法庭所採用的非刑，和一切足以戕賊身心的辦法就是了。

巴枯寧以一八一四年生於俄國。他是貴族出身。及長入軍。目擊俄政府之腐敗，辭職而從事學術。一八四七年，至巴黎。在那裏遇見蒲魯東。他的無政府思想，即濫觴於此。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這是巴氏從事於社會運動的第一次。他痛苦的經驗，也是在這時候開始的。他在所著的馬志尼論中，告訴我們他被禁於薩克遜奧大利和俄羅斯差不多有八年之久。後來流放到西比利亞。幸而那裏的總督是他的親戚，所以過了四年，他脫獄而至美洲。一八六〇年，至倫敦。其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即位，國內似乎有革新的現象。他幫他的朋友黑岑在可羅可爾報 *The Kolokol* 上寫了許多文章，喚醒俄國民衆，準備新時代的降臨。黑氏固然是一個很激烈的人。但巴氏比他還要激烈。不久，他就到了瑞士。在那裏住了許多年。一八六九年，他創立了一個「社會民主同盟會」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這同盟會不到一年就即解體。會員都附入「國際工人聯盟會」。一八七〇年九月，他在里昂起事；但沒有什麼成功。當「國際工人聯盟會」在海牙

開會的時候，他和馬克思派衝突。結果，他退出聯盟會。此後，他以體力關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活動了。一八七六年死於柏林。

以下是無政府主義者卡費洛 *Cafiero* 和烈可侶 *Elisee Reclus* 對於巴氏人格的素描：『凡是巴枯甯的朋友和仇敵，都知道他的思想力是很偉大的，他的意志是很堅強的，他的精神是持久不疲的。他們也知道他對於財富、地位、榮寵，和大多數卑鄙齷齪的人所追求的各種可憐的榮譽，都棄之如敝屣。他原來是俄國品級最高的貴族出身。在貴族中，他是第一個加入革命黨的。這是他足以自豪的地方。這些貴族都有了覺悟，捨棄習慣、成見，和種族及階級的利益。……巴氏和他們共同努力，共同奮鬥，備受艱苦，身受監禁，放逐，危險，痛苦等等。……巴氏在俄國學生中，……在西比利亞一班被放逐的同胞中，在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和意大利的良民中，有着極大和直接的感化力。他那種獨出心裁的理想，流利雄壯的口才，和歷久不變的熱忱，更益以一種自然莊嚴的態度和活躍無倫的生氣，遂使他在各種革命的社會黨人中間，備受歡迎。有許多人對於他的活動，起初非常歡迎，後來因宗旨和方法不合，遂又棄之。就是在這些人中間，他活動所留下的印象，也非常之深。』

巴氏身體和生活方面，也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日本勞働運動告訴我們：『巴枯甯宛如神話中人。……他是一個非常人。……他魁梧的體格，可驚的食量，難看的面孔。……對於金錢的恬淡。這種軼事，一曉戶喻地傳播着。……一八六三年叛亂之後，有許多革命者爲避免迫害，逃亡到波蘭。他帶來許多錢，碰着了

他們。他就把一半給了他們，其餘的給了最先遭難的波蘭人。最後，一錢莫名，便到朋友地方去用借錢的調子向人家借錢。」非常人處處都是非常。巴氏如此，揆之歷史中其他的人，亦莫不然。

現在我們看巴氏的思想罷。

巴氏的政治論，比蒲魯東來得激烈。蒲氏以為奪取政權是應當的，巴氏却說：「歸結一句話，我們反對各種立法，各種權威。一切勢力，無論其為特權的，特許的，官廳的，地方的，我們一概反對。就是從普選造出來的勢力，我們也是反對，因為我們確實相信，這一類勢力，只足以使少數榨取他人的統治者，得到益處，使無量數受人虐待的人，咸蒙其害。從這點看來，我們真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另外一處，他說：「我們害怕君主政體。同時我們深信一個擁有軍隊和官僚以及政權集中的大共和國，對外是侵略，對內是壓制，對於人民不能予以幸福和自由。」照他看來，享有特權者，一概都是壞人。他說：「特權和位置的特性，把人類智慧和良心湮滅了。凡享有特權的人，無論他所享的特權是屬於政治的，或是屬於經濟的，總是一個喪失智慧和良心的人。」在有一本書上，巴氏大書特書地寫著「教會和國家是我的兩隻黑白野獸。」其攻擊統治者的不遺餘力，於此可見一斑。

以下是從巴氏所創立的「社會民主同盟會」會綱中節錄出來的：第一，同盟會宣言自己是無神的。各種宗教都該取消。以科學代替宗教信條。以人的正義代替神的正義。第二，同盟會宣布婚姻制度的廢止，因為這是一種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和有產階級的制度。第三，同盟會宣布階級制度的剷除。無論男女，在

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律平等。第四，同盟會宣布土地資本和生產工具，都該變為社會全體的公共財產，這種財產，只有工人可以使用。第五，同盟會宣布工人階級的國際聯合。在這裏，愛國主義沒有存在的餘地。第六，同盟會宣布着：地方協會，乃是國際聯合的單位。地方協會的辦法，依照各地之情形而定。

我們說巴氏是集產主義者。不過有一點，我們不能不聲明。就是巴氏的集產主義，是反權威的。他說：『未來社會的集產主義，絕不用設立任何最高權力。無論是經濟的組織，或是政治的組織，都應當以自由為根據。本這自由名義，對於看起來是與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相似一切東西，我們永遠加以反對。我們要藉着因自由而結合的心意，從下到上來組織社會與社會的所有物，而不要任何一種從上到下的權威。』那末，巴氏的集產社會是怎樣形成的呢？對於這問題，同盟會綱第五條，雖然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答覆，但是為免除誤會起見，我們却不能不鄭重聲明，同盟會雖然以地方協會為國際聯合的單位，而其最後之根據，還是在個人，因為巴氏告訴我們：『由各個人的自由聯合而至公社，由公社而至地方，由地方而至民族，由民族而至全歐的組織，由全歐的組織而至世界的組織。』這就是無政府黨的自由聯合主義。

巴氏革命的手段是怎樣的呢？同盟會祕密規程中有這樣的一句話：『除了解放和破壞現有一切用以保護私產和資本的設施之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能夠統一，歌舞，和提高現世紀唯一的實力——工人。』所以一般人都說：巴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破壞者。有許多人說：『革命問答』(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並不是巴氏的手筆。不過無論如何，這書是代表巴氏思想的。在這書裏，我們找到一句富有破壞性的

話，而且明明是物質的破壞。這話是這樣的：『革命者只知道一種科學，就是破壞，他爲了這科學，而且單爲了這科學，才去研究機械學，物理學，化學，甚至於醫學。他只有一種享樂，一種安慰，一種工資，一種滿足，這就是革命的酬報。他日日夜夜只應該有一種思想，一個目的，這就是堅決的破壞。促進破壞的一切手段，統是對的。我們除了破壞之外，不知道其他活動。我們承認，表現這活動的方式，很是複雜，比如毒藥，刺刀，繩子等等。』按大體而論，世界各國無政府主義者，比較其他社會主義者，在破壞方面，總是厲害些。這大概是受了巴氏學說的影響吧！

三 基督教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生於俄國。時爲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他父親是一個公爵。他行五。他母親是一個賢淑的女子。不幸，在托氏十八個月的時候，便去世了。托氏雖然沒有十分領略過這賢母的丰采，但是他却時常想念她。在幼年 *Childhood* 童年 *Boyhood* 和少年 *Youth* 三本書中，他把他母親描寫着。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中的女公主，以及安娜小史 *Anna Karenina* 中的嫂子，都是他理想中的母親的寫照。母親死後七年，父親也逝去了。於是兄弟數人，便寄養於托地亞拿 *Timofey* 家中。托地亞拿是他父親從前的情人，因爲她家貧，門戶不對，所以犧牲了他們的愛情。她撫養這幾個孤兒，一如己出。托氏一生，得她的力不少。從她那裏，他得着愛的快樂和意義。而且他的宗教思想，也是在她的懷中萌芽的。

托氏自小便有過人之才，當他寫童年的時候，他還記得他怎樣因了一首的詩而使他祖母驚嘆他文學的天才。十六歲，他進了喀桑大學，學東方語言。後來轉習法律。但是這些課目，都非他興趣之所在，而且他又感覺得，所謂教育，亦不過爾爾。所以三年後，便離開了學校生活。

那末他做什麼呢？他在寄給托地亞拿的信裏說：『照顧上帝所交給我的七百個佃戶的平康，豈不是我神聖和直接的責任嗎？若是我離棄他們，任憑他們受制於粗蠻的長老和理事者的強權之下，而我自己却意馬心猿，惟快樂之是求，豈非罪惡？這裏我既有了高尚和光榮的責任，那何必再去尋行善的機會呢？』他實行『到民間去』了。他和佃戶同處，以便了解他們問題之所在。他處處為他們服務，希望在愛和犧牲中尋找他自己的快樂。如是有一年之久。結果，廢然而歸，因為佃戶們太不明瞭他了。

這是他放浪生活的開始。凡是人到了灰心喪志的時候，很有走入這歧途之可能。可憐托氏逃不出這命運。他現在是一個充滿了獸性的人。在懺悔錄 *My Confession* 中，他曾自首過。他說：『想起那幾年的放佚，殊不能不使我打寒噤，恐怖，悲傷。我置人於死地，我和人鬪劍而殺人，殘忍地待佃戶，結交淫婦，欺騙人們，烟，酒，賭，劫掠，殘暴，兇殺，無一不是我所犯的罪惡。』想不到一個滿腔熱血，情願犧牲自己而為佃戶服務的青年，會墮落到這地步的。他的放浪生活，使他破產，使他負債。他的債台高築到無可料理。於是他逃到高加索，加入行伍。這可憐情形，他在懺悔錄中，赤裸裸地呈露着。

在高加索，他的靈魂復甦了。哥薩克人 *Ossacks* 是他以後寫的。這書描寫他在高加索時候的情形。在

這書裏，他有「現在生命萌芽了」一句話。這話代表他當時的心理。一八五二年，利用在軍隊中所有的空閒，寫了他的處女作幼年童年和少年三本書。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 Crimean 戰事發生，托氏參預其間，目睹兵凶戰危的情形，心有所不忍，乃離棄軍隊生活，漫遊歐洲各地者有數年之久。

一八六〇年，他最親愛的一個哥哥去世了。他親自看護他，目睹他病時和易贊時的情形。這經驗使他在懺悔錄中寫了「他死了。他還沒有明句他爲什麼活着。死對於他，有什麼意義？」一句話。從此，生死問題不時地盤旋在他的思想中，而追求人生意義的心亦愈切。因爲婚姻的目的在生命的持續，所以在一八六二年，他便和蘇斐亞 Sophia 結了婚。其時，托氏年三十四，蘇斐亞十八歲。她是一個賢內助。她料理家政，有條不紊。十四個孩子，都是她躬親撫養的。同時又要替丈夫抄寫文稿，其有助於托氏，當非淺鮮。

結婚後，他埋頭寫作了。在這數十年中，他所寫的有戰爭與和平，婀娜小史，懺悔錄，我的宗教 My Religion，藝術論 What is Art，復活 Resurrection 等等。戰爭與和平與婀娜小史是五十歲以前寫的。其餘的都是五十歲以後的作品。五十歲以前，他還逃不出爲藝術而藝術的圈子。五十歲以後，他却爲人生而藝術了。這是他文學上的演化，也就是他思想上的演化。

他的思想這樣地在演化，而他的生活却依然故我。他的思想告訴他應當犧牲一切，爲人類謀幸福；而他的生活却還是在象牙之塔裏面。這種矛盾的感覺，依着他的年齒而增加。他在近七十歲的時候，曾經決意把財產捨去，離開家庭，實行犧牲生活。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妻子，作爲臨別遺言。結果，他把這信保留着。

有十四年之久，因為他是一個富於情感而關心家庭的人。一九一〇十一月十日，這矛盾的感覺達到了白熱度，於是他不顧一切，在寒雪之中，不別而去了。過了幾天，在一個小站中把他找到了。其時，他已奄奄一息。十一月二十日黃昏，這在最後之一剎那間還能夠使思想和生活一致的托爾斯泰與世長逝了。

托氏提倡勞工神聖，反對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他說：「你們七八個都是極康健的青年男女，天天睡到早上十點鐘，才肯起來。已經喫飽喝足，你們仍然一天到晚，不住嘴地喫零碎東西，大家很快樂地弄銅琴，談音樂。我剛才從那裏回來。誰知那地方，有人在天還沒有亮，三點鐘的時候便起來。有些晚上要看守牲畜，連睡都沒有睡。他們不論年老的，生病的，抱嬰兒的，懷孕的，以及年幼的小孩，個個都拚着命做工。至於我們，却安安逸逸，舒舒服服，享受他們汗血換來的收穫……現在我們洗浴也洗完了，穿戴也穿好了，我們把臥室裏一切凌亂污穢的東西，都交給那奴僕去收拾整理；我們自己便整天喫，喝，談音樂……你們大家試想：照這樣的情形，我們還能夠繼續生活下去嗎？」托氏到晚年時，以資產論，儘可躺臥着以享餘年，而他却天天在田裏耕作，與農民共同甘苦，其提倡勞工神聖的精神，誠可為天下法。

托氏是反對私產制度的。他是一個大地主，但他終其身却無時刻不在想把他的財產送給窮人。而且他以為不但土地應該犧牲，就是其他東西，也當如此，因為照他看來，根據基督教原則，任何東西，都不能占為己有。他說：「若依照基督的法律，我既然承認掠奪他人和他人的土地是罪惡，那我該怎樣呢？我該怎樣做才行？是不是我仍然把土地私擁着，仍然搶掠着那些餓斃了的農民的工作來過日子？是不是我應該將

那些土地還給凡被我祖宗搶掠過的人……不只是土地如此，任何私有東西，都不能有。」又說：「人不能私自擁有東西的。我們斷不能照着我們現在的生活過去……什麼東西我們都應該犧牲。不但有益於我們的森林要犧牲，就是我們的衣服和麵包也都要犧牲。連自己也要犧牲。這就是基督的教訓。」據說托氏在出亡時，寫了一張遺囑，吩咐家人無條件地把他們的財產領有權放棄。他們沒遵着他的遺囑而行，直等到一九一七年革命。那時，他們的財產領有權，不放棄而自放棄了。

托氏的無抵抗主義，盡人皆知。他在戰爭與和平中提出的是非戰主義。但是無抵抗主義，比較非戰主義，更進一步。他以為就是有人在法庭上控告你，也不應當抵抗，因為這不是愛。比如有人以盜竊之罪告你。你的自白，造成他的反坐。他的反坐，雖然是法律給他的，但沒有你的自白，他是不會反坐的。換言之，他反坐之苦，是你給他的。叫人受苦，難道是愛嗎？耶穌在彼拉多面前不肯自白，就是根據於這種愛的精神。難者曰：這樣，無抵抗主義之難人，未免太甚乎？這恐怕是行不通的吧！托氏的答覆是：「上帝指示我們的美德不一。這美德和其他美德，一樣可以實行。欲有善行，非犧牲受苦不可。有時甚至連性命也要犧牲呢。」他更進一步地說：「有人重看性命，比遵行上帝的意旨還重要。其實，這人的唯一真正性命已經喪失了。保持性命，正所以喪失性命。還有，無抵抗所犧牲的是一個人的性命，或僅生活中幾種權利而已；抵抗的代價，却是千千萬萬的犧牲。」難者又曰：只有一個人無抵抗，恐怕無濟於事吧！對於這問題，托氏也曾想到過。不過他說：「大概，強盜，暴徒，或謀殺者，不會傷害他們，如果他們不用武力來抵抗。」凡動刀者，必死在刀下。」這是托

氏無抵抗主義的大概。」

托氏的無政府主義，以無抵抗主義為根據。照他看來，所謂政府，所謂法律，不過是國與國人與人中間的抵抗的工具就是了。他主張不納稅，因為「政府所規定的稅則，非人民意志之所許可，所以人民不應當付稅。」有人問他：「做基督徒能否參預選舉，法庭，或政府？」他說：「否。參預選舉，法庭，和政治行政，就是參預政府所主張的暴動。」再有人說：「政府既然沒有了，那社會秩序怎樣維持呢？」托氏的答覆是：「統治者以此為真的秩序。其實……這種組織，並不是真的秩序，却不過在社會之上，加以組織而已。」還有，托氏的宗教革命，也使他覺得政府是一件要不得的東西。俄國宗教，每以政府為護身符。同時，政府以宗教為幌子。二者狼狽為奸。所以要推翻舊的宗教，非先把政府取消不可。而且甲政府取消了，不必代以乙政府，因為沒有一個政府不與真的宗教相抵觸。

四 共產的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

克魯泡特金以一八四二年生於俄國莫斯科。他是皇家出身。所以一般人都稱他為克魯泡特金親王。十六歲，入貴族學校。他的革命思想，是在這時候發生的，因為他所看到的，一面是貧民窟，一面是貴族生活。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在於富有生命力的他，當然會發生影響的。十九歲，被選為近侍武官。同年，至西比利亞。閱三年，到各處調查地理。他到過黑龍江及滿洲中部。一八六七年，回到莫斯科，研究科學。同時，擔任地理

學會秘書之職。克氏這幾年的經驗，對於他以後所主張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很有關係，因為他在西比利亞所看到的，是古代共產生活和無政府主義的可能性。同時，他對於科學的研究，又給了他一個極大的暗示，就是人類是互助的，因為他在研究生物的時候，處處可以看到這種精神。他的互助論，即基於此。一八七二年，到瑞士與「國際工人聯盟會」發生關係。他是主張自由的。這種主張與聯合會的立場適相庭。所以到後來，在聯盟會把巴枯寧開除的時候，他也退出聯盟會而加入了「猶拉聯合團」(Tura Federation)。什麼是「猶拉聯合團」呢？這在一八七二年巴氏等脫離「國際工人聯盟會」之前，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經成立。其目的在「排除國家政治和地方政治。在各國勞働中間，鼓吹縮短勞働時間，加增工資……」。克氏對於這團體，十分傾心。他說：「因此，我在這裏所看見的工人，並不是一批受少數人指導和供少數人政治作用的羣衆。他們的領袖不過是特別活動的同志就是了。與其說是真正的領袖，還不如說是鼓勵者來得確當。我在這些工人——尤其是中年工人中間所看到的那種清楚的見地，健全的判斷……實在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的確相信「猶拉聯合團」所以能夠在社會主義發展中占到超越的地位，不但是由於它那種反對政府和主張聯邦的理論，並且也是因為猶拉鐘錶匠的健全的理智，可以在合理的形式之下，把這理論表現出來的緣故。」帶着這種躊躇滿意的情緒，他就跑回俄國，在匿名之下，大事宣傳。青年之爲之引動者，不一而足。結果，爲警察所拘。一直到一八七六年，得了別人的援助，始克釋放。於是他到倫敦。現在他是一個窮無所歸的亡命者了。幸虧，他於科學，研究有素，所以就做了一種科學雜誌的投

稿者，藉以維持生活。後來，他居然做了這雜誌的編輯。一八七七年，他應瑞士「猶拉聯合團」之請，重蒞瑞士，為無政府主義宣傳，並且和勞働者時相過從。一八七九年，和許多同志慘淡經營，組織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機關報。他所著的告少年 *An Appeal to the Young*，就是在這報上發表的。一八八一年，瑞士政府把他驅逐出境。於是他到巴黎。湊巧，兩年前里昂有總罷工運動。警察以為這是無政府主義者造成的。克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此，便以嫌入獄。這次他被禁有五年之久。到了一八八六年，才得釋放。克氏在他的著作中對於牢獄，盡攻擊之能事，這是有所見而云然的。因為他每次入獄，動輒數年，根據長時間的經驗而予以痛斥，當非信口吹簧者可比。這次釋放後，他又回到倫敦。其時，社會主義在英國更見活動。克氏遂趁此機會，竭力宣傳他所主張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他的名著麵包的掠取 *Conquest of Bread*，互助論 *Mutual Aid*，田莊工廠和手工廠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就是在這時他向各雜誌所投稿的文稿。歐戰爆發。他寫了許多反對德國帝國主義的文章。一九一七年革命後，他才回到俄國。他反對列強對俄封鎖，同時他對於蘇維埃政府的設施，亦時常有批評的論著。他最後的鉅著是倫理學 *Ethics*。可惜這本書沒有寫完，他便與世長逝。時為一九二一年。

克氏思想的大概是這樣的。

克氏是互助論的首倡者。自從達爾文的學說發表之後，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的思想，便風行一時，而深入了人們的心坎。就是馬克思的階級鬭爭，也未始不因此而形成的。克氏獨樹異幟，而提出了他的互助

論。謂其爲劃分時代的思想者，誰曰不宜？以下一段話是克氏互助論的縮影。他說：『我們拿了一個文明國家來看罷。森林已經開拓，沼澤已經填滿，成千論萬的孔道和鐵路已經在各處鋪好，河道已經通航，海港的便利已經得到，運河和洋海已經聯絡，巖石已經鑿碎，一切製造品已經遍地皆是，科學已經教人怎樣用自然力來滿足他的需求，都市已經一年年地在發達，科學和藝術已經堆積在文明的中心，但是誰造成這一切奇蹟呢？數千年多數人的努力使這些事業成功。森林是數百年前開拓的。爲了開闢孔道，填塞沼澤，敷築鐵路，我們使費了千萬人多年的勞力。我們建築了我們所誇揚的城池和文明……許多著述家，哲學家，科學家，在無數排字者，印刷者，和別的勞動者的輔助之下，把知識普及了，把謬誤消滅了，並且供給了毫末不爽的科學思想。沒有他們，我們是永遠不能得到時代的奇蹟的。』

克氏的經濟思想當然以互助論爲根據。他在無政府共產主義 Anarchist Communism 中有這樣一句話：『社會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和生產原料，既然是大家共同努力所造成的，那末，我們非讓大家自由處置不可……這是到平等和自由之路的唯一的保證。』他認定資本家的獨享是不合理的。照他看來，科學家的耐苦和發明，其貢獻『從時代產出來的觀點上看來，比較世界上的資本家要大得多。』他理想社會中的經濟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那末，克氏的經濟組織是怎樣的呢？他說：『這種組織，包含着許多團體。他們團結起來，以達到共同工作的目的。產業團體團結的目的在生產，比如農業的生產，工業的生產，純粹精神上的生產，藝術的生產。』

消費團體團結的目的在供給住所，光熱，食料，衛生，設備……最後，尚有許多的組織。這些組織是國家的或是國際的。其會員應當在共同工作之下，去滿足他們的經濟的，精神的，藝術的，和道德的要求。」從這段話裏，我們得到兩點。第一，他的經濟組織，至少從無政府主義者看來，是有條不紊的。第二，他再三提到共同工作幾個字，因為他說：近代文明的沒落，是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分離的結果。他用一個比喻。比如牛頓起初所學的是管理機器。這是肉體勞動。到後來，他發明了望遠鏡。這是精神勞動的成績。肉體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合一，是進化的原素。所以他對於斯密斯亞當 Adam Smith 的分工制度是反對的。

克氏根據自由的原則，主張政府的廢除。他說：「我們知道德國派喜歡混合國家……他們不能了解沒有國家中心的社會是什麼一回事。所以他們造了許多謠言，說無政府主義是破壞社會的……羅馬帝國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國家。就是到現在它還是學法律的人的理想……一切唯羅馬之馬首是瞻。無論是經濟生活，或是軍事生活，或是法律關係，或是財富，或是教育，都是如此。就是宗教也是如此。從羅馬出了法律，行政，和軍隊。其目的在保護領土。省長統治一省。他是神。順着行政院的足跡，我們找到了帝國生活的多方面。以後我們就順着凱撒的足跡，去尋找帝國生活的多方面了，因為他是全能全知的。他是帝國的上帝。」總之，權力集中是他反對國家的主要原因。

與反國家思想同時發生的是他的反法律思想，他說：現有法律，只有三種功用。第一是保護所有物，第二是保護生命，第三是保護政府。第一和第三是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造

了許多法律來保障他們的利益，而以無產階級和被治階級爲犧牲品。換句話說，第一和第三對於無產者和被治者有損的。其貢獻祇在於資產^二和統治者。所以照克^三氏看來，關於第一和第三的法律，都該廢除。就是關於第二的法律，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爲四分之三的血案都是因私產問題而發生的。在共產社會中，私產既然沒有了，那末爲什麼還要有保障生命的法律呢？所以關於第二的法律，也該廢除。這是克^四氏所主張的。

第八章 基督教社會主義

克卡樸在他的社會主義史裏面有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我們以為基督教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其學說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有背馳之處，那是大錯特錯。』和克氏同調的有社會改良大辭典 Dictionary of Social Reform 的著者勃力斯 B. L. 他說：『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其目的在以基督教之原則，應用於社會。……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否定個人的基督教。……基督教社會主義，固然由於個人的服從基督教而起，但現在我們却不能以個人的服從為一切的服從了。……從舊約中，我們可以看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的法則。基督是因為要成全這法則而來的。……個人主義忘了法律，制度主義忘了人情，以為單單把制度改革了，社會便可改良。真正的社會主義，應根據人情以完成其社會法。』這是一句多麼中肯的話！所以談社會主義而忘記了基督教，其錯誤正像論基督教而以社會主義為無足掛齒。

其實，本書頭上幾章已經說得夠了，就是在基督教中，社會主義的成分，觸處皆是，無論在聖經中，或是耶穌所說的話裏面，或是教父時代，或是在烏託邦社會主義者歷史中，都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此外，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我們也許另外寫一本書，專門敘述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歐美基督教信徒所組織的震教徒 Shakers 哈摩尼亞 Harmonia 左阿 Noah 阿馬那 Amasa

等共產村，以證明歷來基督徒對於社會主義，不但坐而言，而且切切實實地嘗試過。

不過，真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才產生的。其始末如后：

一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首倡者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首倡者，一起三個人。第一是金斯黎 Charles Kingsley。他以一八一九年生於英國的得文邑 Devonshire。起初，肄業於私立學校與倫敦的皇家大學。後來，他的父親做了支斯得耳 Chester 的牧師，於是他便轉入了劍橋的馬格達倫大學 Magdalen College。一八四二年畢業。同年，他做了罕布 Hampshire 厄味茲力 Eversley 的副牧師。一八四九年，他為憲政主義 Chartistism 和倫敦貧民窩情形所動，與其他志同道合者，聯絡起來，從事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他是一個憲政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基督徒；而其足以自豪者，就是這種雙重關係。在政治 Politics 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Christian Socialist 裏，他發表了許多文章，其別號為「Parson Lot」在粗衣和骯髒 Cheap Clothes and Nasty 中，他為貧窮者抗議着。他最重要的著作要算是茵 Yeast 和阿爾吞洛克 Alton Locke 了。對於放任的經濟制度，他的抨擊是：「對於放任主義者的主張，我一些兒希望也沒有……他們以為經濟學是最完全最普遍和最重要的科學。他們把普通的人道論，道德論，宗教論看為可唾棄的東西。」一八五三年，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喜白提亞 HyPatia。一八五七年，他以牧師名義，從事於衛生工作。對於合作運動，他也相當的貢獻。他說：

「政治和經濟對於我應當很有用處。倘使我能夠救幾千個勞働者和他們子孫的性命，那我一定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一八六〇年，受劍橋大學之聘，擔任歷史工作。一八六九年辭職，改任支斯得耳牧師。一八七三年，又任韋斯敏斯德牧師。一八七五年，死於厄味茲力。他到過一次美國，在那裏演講過。

第二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首倡者爲摩里士 Frederick Maurice。他生於一八〇五年，是英國諾曼斯吞 Normanton 地方牧師的兒子。在劍橋大學畢業後，得了法學士的學位。他很早就對於宗教問題和社會問題感到興趣。一八三一年，入英國教會，擔任部本堂 Rubenhall 副牧師之職。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六年之間，在倫敦蓋伊醫院 Guy Hospital 服務。在這時候，他的著作已經引起了人家的注意。一八三五年，他發表了契約和束縛 Subscription vs. Bondage。後來，更將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七年間所寫的論文編成了一本巨著，叫做道德與形而上哲學 Moral and Metaphysical Philosophy。自一八四六年起，在經司大學 King's College 教書。他從事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時代。在運動中，他是一個中心人物。金斯黎大概爲了地點關係，和當時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不能時相過從，因此，這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第一把交椅，便讓給了摩氏。摩氏名實相副地，做了基督教社會的領袖，一直到死爲止。他訂定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這名詞，做了勞働大學 Working Men's College 的校長，數年如一日地充當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會議的主席。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九年，一方面在劍橋大學教授哲學，一方面擔任牧師職務。他生平著作很多。一八六九年所寫社會道德 Social Morality 也是其中之一。一八七二年，卒於倫敦。

除了金斯黎和摩里士之外，在基督教社會主義首倡者中間，還有一個人，他的事蹟，普通人不很注意，其實照有許多人的看來，以實際工作論，在三個人中間，最重要的還要算他。這就是拉德羅 *J. M. Ludlow*。關於他的重要，和三人同時代的費尼費爾 *J. F. Fennell* 有過這樣一句話。他說：「拉德羅乃是我們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真的原動力。摩里士和其他人，對於社會主義，一無所知。拉德羅在巴黎讀書，他什麼都知道。他不但把我們集合在摩里士身邊，他簡直領導了我們。」拉氏是一個英國官長的兒子，以一八二一年三月生在印度。父親死後，他母親把他帶到巴黎。在那裏，他住了好久。他是鮑邦大學 *Collège Bourbon* 的法學士，畢業後，就在巴黎執行律師職務。他本想入法國籍，後來沒有成功，因為他母親反對。一八三八年，到倫敦。其時，英國人民正在反對所謂「穀法」 *Corn Law*。拉氏適逢其會，奔走喘汗，為民請命者，很有幾時。一八四三年，他在英國的律師生活開始了。他和印度的關係，使他寫了好幾本關於印度的書，比如英屬印度的民族和歷史 *British India: its Races and its History* 關於英皇對於印度政策的幾個意思 *Thoughts on the Policy of the Crown toward India* 等。他和法國的關係，加緊了他對於英國社會的反抗。他親眼看見過一八三〇年法國革命，並且領受過傅立葉等的思想。這一切，註定了他社會革命的命運。他為人的原則是：只知工作，不知沮譽。他有一種癖性，就是不輕意照相。從這癖性中，我們可以看出普通人只知有金斯黎和摩里士而不知有他的原因了。他激頭激尾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他總不能與教會發生好感。對於這一點，他有自知之明。他說：「我有一種天性，而且這天性是很清楚的，就是在教會中，任何一派，都

不能和我相合。」在一切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中間，壽數最長的，恐怕是他。他死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時年九十歲。

二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開幕

一八四八年在英國歷史中，總算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了。一方面有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一方面又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產生。共產黨宣言在二月披露。當然，自從這劃分時代的刊物發表以後，一時舉國騷然，革命高潮，飛也似地陡漲了起來，政府雖然用盡方法，想要把這奔騰到沸點的羣情鎮壓下去，但絃上之箭，那裏能夠止住？到四月初，這革命空氣格外緊張了。十日，金斯黎鑒於問題之日益嚴重，從厄味茲力跑到倫敦。湊巧，摩里士有病。於是他再去看拉德羅。他們討論了半天。晚上，同到摩裏士那里，作竟夕談。在金氏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摩里士大為興奮。拉德羅是一個律師。那些從法國來的信，是他寫的。摩里士叫我去看他。我們寫了許多布告。這些布告是貼在牆上的。我們想要為上帝說一句話……我正為這體面的工作努力……一直到今早四點鐘，在摩里士指導之下，我寫了許多布告。其中有一張預備明早公布。還有許多，等到我們有了錢，就可發表……摩里士決意要有一種斷然的處置。』

布告中最重要的一封寫給英國工人的信，這信的大意是：凡是有頭腦有心肝的人，沒有一個不承認工人的待遇是非人道的，憲政主義雖然有可取之處，但以之為到自由之路則不可。祇有上帝和基督才

能叫人自由。最後，這信便大聲絕呼地說：『沒有道德，沒有真的自由；沒有宗教，沒有真的科學；沒有敬畏上帝和可憐同胞的心則談不到工業。英國的工人們啊，你們應當聰明些！末了，你們應該自由，因為你們是配自由的。』這信就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宣言。

四月十二日，摩里士，金斯黎，拉德羅以及另外幾個新加入的人，如門司斐特 O. B. Mansfield 海爾 J. Hare 司高塔 A. J. Scott 等，確商之下，深覺為推進運動計，非有相當之宣傳品不可，乃決意自五月六日起，發行星期刊一種。這就是所謂政治。一直到七月為止，合臨時特號，一共發行了十七次。政治的發刊詞是：『過去，政治和基督教各自為範。宗教徒以為他們的事工只在於未來世界，政治方面的人明目張膽地說：治理現世間，其原則和未來世界完全不同……人民的政治和宗教，却不能分離。宗教的出發點是有神論……其實，這也是自然界的出發點……治理世界的是上帝。這是有錢的人的警告，同時也就是窮人的慰藉。』……現在一般人認為重要的問題，如普選問題，勞資關係等，我們都應當討論。究竟政府應該怎樣為窮人尋找工作機會？他們的工資究竟多少？這一切，我們也該研究。』

凡是一種對於現狀加以修正的刊物，是沒有不被人非議的。政治也遭了同樣的命運。金斯黎在這刊物中發表了三封信。其目的在喚醒一般人對於自由的錯認。他說：自由有真假之不同，統治階級每每以假的自由為幌子，以欺騙民衆，對於這種假的自由，我們應當提出抗議云云。其實，在於二十世紀的我們看來，這種口氣，是很平常的，不過在於當時，這却是一個炸彈，連海爾也提出了他的抗議。摩里士是政治的主筆。

他生性是一個不好事的人。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拉德羅，因為拉德羅和金斯黎是同調的。他說：『在上者，或是在下者，有錢的，或是無錢的，對於他們的是非心，我們都應該加以敬意……叫一個人的是非心受傷，就是傷了這人，同時也傷了我們自己……化了時間去中傷人家，這又何苦呢……金斯黎和你都富着天賦的能力，不應當一時為情感所衝動。在我能力之內，我不讓你們如此。』政治不但引起了局外人的攻擊，而且又造成了內部的不滿，同時印刷費毫無着落，到七月底，這刊物便停止了。

政治的停刊並沒有叫他們喪志。反之，這頓挫却給了他們一種新的啓示，就是實地工作也許在文字工作之上。拉德羅在數年前，已經覺得教育的重要。他原定在林肯寓 Lincoln's Inn的旁邊開一個學校。後來，因為人財兩絀，沒有實現。現在他們的人數日益增多，這有限的經費，當然不成問題。於是擇定小奧蒙德場 Little Ormond Yard為他們的工作地點。九月二十一日，開學。這學校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富有意義。不錯，學生們得了很大的益處，但是最是受惠的，還是那些教員。從這學校，他們領略了窮人的痛苦，以前他們對於窮苦兩字，祇能想象，而不知其真諦之所在；現在他們却親身經受了。這體驗，鞏固了他們為貧民而努力信念。他們以後赴湯蹈火而不辭地工作着，推原其故，恐怕就是這幾年經驗的效果吧！

同時，因為辦學校的緣故，他們得到了一個新的同志。這就是和基督教社會主義有深切關係的休士 Thomas Hughes。金斯黎和摩里士是兩個不著名的傳道士，拉德羅是一個生長在外國的律師，門司斐特是一個與無產階級相差無幾的人，其餘的，不是貧寒出身，就是脾氣太怪；換句話說：照旁人看來，他們是烏

合之衆。自從休士加入之後，這批評却沒有了，因為他無論從家庭或自身方面說，是一個足以令人起敬的人。同時，他生性和藹，任何人都喜歡他。在於摩里士，他是一個忠實的信徒；在於拉德羅，他是一個患難之交；在於金斯黎，他是一個解人，在於那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而毀家的尼爾 *Neil* 他是一個鼓勵者。在思想方面，他也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主張，但是他混圓的人格，却把流品不一的他們聯絡了。在任何運動中，這樣的人，也許是少不了的。

休士的參加，把這班人團契化了。從十二月起，他們每星期一晚八點鐘在摩里士家裏敘集。這不是一個事務會議，其目的只在於聯絡感情，交換經驗而已。有感情而無工作，則感情不能持久；有工作而無感情，則工作難以實現。明乎此，我們便知道這團契的價值了。

二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

一八四九年夏，拉德羅從法國回來。他提出了一個合作社的計劃。他說：『對於現狀，我們不能再同調了。……我們應當有一個像法國工人合作社那樣的組織。法國工人合作社，乃是一種成功，這是我知道的。經理是我們自己指派的。』其實，這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不過在當時一般人，一聽着合作社三個字，便聯想到法國革命，共產黨宣言，和歐文主義。就是詩人丁尼生 *Tennyson* 也說這是克勒特 *Celt* 人的盲目的歇私的里亞。摩里士也加以懷疑。一直到初冬，他還不肯投同意票。

十二月，拉德羅一方面覺得這計劃非實行不可，一方面又不敢勉強摩里士贊同，不得已，召集七個同志。此外又添上兩個工人。他故意沒有請摩氏加入。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在快要閉會的時候，他居然來了，而且極熱烈地贊成了他們的提案。在一八五〇年一月二日，他有這樣一段話寫給金斯黎。他說：『照我看來，這是唯一的辦法。一般人都以競爭爲天經地義。這是一種謊話。我們應該拿合作來替代罷工。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办法。當然，我不說雇主和被雇者的關係是不正當的。我想，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我不敢斷言工資制度一定不能把這關係表示出來。但現在這關係却已經被毀滅了。所謂工資支付，不過是一種騙術就是了。這是很清楚的。……我的看法是：第一要叫人悔改，第二要給他們一個表示悔改的機會。……這是我對於裁縫合作社的意見。』這樣，合作社計劃便得到了全體的贊助。

一八五〇年一月八日，在摩里士家裏，召集了一個發起人會議。在這會議中，他們把章程通過了，同時又決定了經費的來源。柯柏 Walter Cooper 是一個與裁縫業素有關係的人。他們選他爲經理。他的薪水是每星期兩鎊。過了幾天，在卡斯爾街 Castle Street 找到了一座房子。二月五日，他們得到了十二個工人。十一日，開始工作。過了兩個月，工人數目，加增到二十四人。

二月七日摩里士的信是值得轉錄的。他說：『晨報 Morning Chronicle 所發表的信，一方面叫我們難受，一方面却喚起了我們的思想。我希望這些信或者可以叫我們走上行動的途徑。我們已離開辦了一個裁縫合作社。在這裏面，工人們都可以分派利潤。我希望這裁縫合作社真的可以合作，可以成功。這社於

星期一就要在牛津街的卡斯爾街開張了。以後我們要送你一張價目單。希望你在劍橋代為宣傳……此外，我又希望，不久，我們可以開辦一個女裁縫合作社。這在原則方面，和裁縫合作社相同，不過多用婦女來管理就是了。這是一種初次的發動。我們也許失敗。不過原則是不錯的。這原則將來要不脛而走，結下相當的果實。這是我的意見。我們的殷望是「社會主義的基督化」。

四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

合作運動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政策，這上面已經告訴我們。以下是這運動的歷史。

基督教社會主義，一直到現在，還是在無政府狀態中摸索着。一月八日所通過的章程，乃缺而不全；同時，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起人，都不是商業出身，合作社多少有商業性質，而斷非素不知商業為何物如摩里士等所能勝任。塞來 Charles Sully 是一個新添進來的人。他的本行是印刷業。他富有商業經驗。他說：基督教社會主義，既然已經跨進了商業的領域，原有章程，決不能適用。同時，他又提議在中央委員之外，另設理事部管理合作社一切事務。對於這意見，起初，摩里士十分反對，甚至於說：「塞來以為非有理事部不可。他竭力地主張着。對於這主張，無論在言語或行動上，我斷斷不能苟同。你們儘可說我是反制度的。照我看來，所謂制度，乃是從惡勢力的組織中，找善的結果的意思……上帝的秩序和人類的制度是冰炭不相投的。這是我的看法。我以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目的乃是在提倡上帝的秩序。如果你們的目的在提倡機械

生活而把它放在上帝的序秩之上，無論你們稱這機械生活是什麼，或是勞動組織，或是理事部，我都反對。」後來，他也贊成了，雖然他還是主張理事部是要受中央委員的節制的。

四月，塞來擬了一個詳細的章程。這章程在六月被通過了。章程中最重要的是關於中央委員會，理事部，合作社，及工資的幾點。茲分述之如下：

中央委員的目的在：「證明合作運動乃是基督教原則的實際應用，並且把這原則應用到工商業上面去。」這目的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爭辯才得規定，因為那時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經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兩派的對立。委員人數為十二人，除了主席之外，他們每星期五開會一次，以商定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政方針。每天有兩個委員在辦事處主持一切。當然，他們是不支薪的。

理事部的責任在統轄一切合作社，使社與社之間，不致有互相傾軋之虞。合作社經理為理事部當然委員。各合作社雖然有自行規定貨價之權利，然其最後之決定，還是在理事部手中。理事部設幹事一人，其薪水及進退，悉歸中央委員會負責。該部每星期一開會一次。開會時，除各合作社經理外，中央委員可以自由參加。

合作社的基礎在社員。其職員為經理，主席，會計，秘書各一人。貨品之出入，社務之處置，都是經理的事。主席是一個工場的領袖，其責任在監督工作；工人的考功，亦是他的事。經理的聘任，本來在社員手中，因為合作社的原則在自治。但因為合作社的資本，每每是中央委員墊付的，所以在實際方面，中央委員有聘任

及罷免經理之權，直等到他們把墊款還清為止。

工資的多寡，以責任及需要的大小為轉移，這也是章程中極重要的一點。難者曰：他們既以社會主義為出發點，那末，對於工人為什麼不給以平等的工資呢？他們的答覆是：『在法國合作社中，有許多贊成工資平等。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的目的在把勞動組織起來。工人們應當領取適當的酬報。工資的平等，就是使無才者，軟弱者，或怠唐者，劫奪有才者，有力者，或殷勤者的意思。照現在社會情形看來，如果工資平等了，則不死不活的工人，便要趨之若鶩，擁擠到合作社裏邊，使良好的工人，還是為競爭的雇主所用。』所以他們的收入是這樣分配的：一部份作為開支，這合工資而言，而且工資是各人不同的；一部份作為支付利息或還本之用，一部份作為推廣費。最後一部份，是分給社員的。但是分給社員的一部份，其多寡，也還是以所費時間之長短而定的。

章程既經完備，組織既經就緒，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各合作社的情形了。

上面已經說過，卡斯爾街裁縫合作社在二月十一日開張。這是第一個合作社。其經理柯柏是一個極精幹的人。同時他們的廣告法確是異想天開。金斯黎的粗衣和航備，紙貴洛陽，風行一時，他們就在這小冊子上面，印上一張關於卡斯爾街裁縫合作社的廣告，使讀者一舉兩得，一方面可以拜讀金氏的文章，一方面又可以知道卡斯爾街裁縫合作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所以開張之後，只在三個月裏面，社員從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四人；在二百五十鎊營業總收入中，純利為七十七鎊。以前有錢的主顧，他們的衣服，大概是定

做的，現在合作社中間，他們居然可以找到現成的了。營業於以進步。有技能的工人，每人每星期平均可以得到三十三先令的；酬報就是普通工人，也可以有二十四先令之多。這是卡斯爾街裁縫合作社最初三個月之內發達的情形。

這合作社却也有它的弱點。第一是社員的複雜。第二是柯柏的不能專心從事。他自信是一個有口才的人，對於宣傳，或者可以有他的貢獻，乃於九月間巡遊各處，鼓吹合作運動。這是他的熱心，我們應當欣賞之不暇。孰意不幸的事件，便在這時候發生了。柯柏雖然是一個極有幹才的人，對於會計，却不很高明。當他出巡的時候，反對他的人，有機可乘，在他的賬目中，找到了幾個破綻，他們在中央委員會面前控告他。這案件雖然立即大白，柯柏雖然還是繼續他經理的職務，但內部精神却受了很大的影響。這合作社時起時伏地存在着，一直到一八六〇年為止。

一八五〇年四月，他們開辦了兩家皮鞋合作社。起初這兩家是分開的。後來，因為都犯了資本不足和內部紛爭的通病，於六月間，經中央委員會及理事部議決，把二者合而一，並且把簿記法也改良了。這混合合作社，在以後數年中，着實發達。過了十多年，社員還是在領取紅利。最後，大概因為整個運動失敗的緣故，於一八六四年，為私人所收買。

第三家皮鞋合作社是在一八五〇年六月開辦的。這比以上兩家還糟。開張不久，經理和社員就發生極大的衝突。結果，他掛冠而去。繼續他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理事部對於這人，始終反對。同時又為了營

業的不振作，於十二月，經中央委員會議決，把它完全解散了。

建築合作社是一八五〇年五月成立的。湊巧，這候尼爾在大興土木。他富有資產，同時又是一個醉心於合作運動的人。他不但把這工作交在合作社手中，而且又預支了他們一筆款子。所以這合作社，在最初幾個月中，就爭了不少的錢。至一八五一年春，他們的淨利已經有二百三十五鎊之多。但是自私又鑽進了他們的心。按理，淨利的五分之四應歸公家，以補其他合作社之不足。建築工人合作社社員却不作如是想。他們以為錢既是他們爭的，支配權當然在他們手中。結果，他們拿十五鎊送給公家，其餘的自己分了。這當然為中央委員及理事部所不容。他們請畢卡特 *J. P. Carter* 出來擔任改組之責。的確，畢氏是一個守法的人，再加上營業的發達，到一八五二年六月，這合作社的資產已達到一千鎊左右。一八六〇年，為畢氏個人所收買。這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因為在那時候，整個合作運動已在風雨飄搖中。

第二家建築合作社在一八五〇年七月四日開幕。第一任經理，過了六個月便辭了職。第二任經理金尼司 *Barnabus Jennings*。既忠實而又幹練。到一八五二年七月，他們已經建築了二十多座房子；所有資產，在六千鎊左右。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第一家合作商店，也是他們創辦的。此外，他們又開設了一個民衆教育館。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開辦的一切合作社中間，這總算是最差強人意的了。那末，這合作社總該長存久留了。不！只到一八五三年，這模範的合作社，竟暴死了，因為他們的資產太大了，經理固然不錯，社員的自私心，却發作了，結果，不歡而散。

還有兩家印刷合作社，也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一八五〇年創辦的。其中有一家規模很小，只有一年多命運，就此夭折。另外一家比較地規模大些。這一家到一八五二年居然把資產增加到六百鎊左右。不幸，過了兩個月，他們的固定主顧合作雜誌 *Journal of Association* 停刊了，同時，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其他印刷品，也一天天地少下去，再過幾個月，這合作社便成了經理伊司姆 *Richard Isham* 的私有物。他維持着，一直到一八五八年為止。

以上有裁縫合作社一，皮鞋合作社三，建築合作社二，印刷合作社二，普通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都把這八家作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代表，雖然除了這八家之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創辦了許多別的合作社。

或問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除了在倫敦一隅活動外，在其他地方，他們絕對沒有工作嗎？不是的。上面已經說過，柯柏曾經到別地方去宣傳過。此外，摩里士，休士，門司斐特等，都到過英國北部。掃桑波敦 *Southampton* 等地合作社，是因為他們的宣傳而成立的。

末了，我們有一點應該知道。即就上面所舉的八家而論，沒有一家有過鉅額的資本。在動輒數萬的現在看來，真是何足道哉？同時，這八家或是為了經理的不得其人，或是為了社員的自私自利，都不幸短命而死。這種合作社，在於現在，有何師法之可言？不過，我們應該知道，這八家的規模雖然有限，命運雖然多乖，而其發起者之不顧是非，特立獨行，却未可厚非。正如基督教社會主義 *Christian Socialism* 的著者贊文〇

Is Riven 所說：「在過去半世紀中，我們的社會生活大大地改變了。這些試驗也許很微小，而且終歸失敗，但其中却有一種力量潛伏著。如果一個人覺到了過去社會生活的不變，以及這些試驗中的力量，那他一定要相信這些人還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稱許，因為他們在顯著的失敗和不絕的失望中，還是敢作敢為。」

五 基督教社會主義與職業組合

在還沒有踏進基督教社會主義與職業組合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應該知道使二者發生關係的那個尼爾，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當摩里士、金斯黎、拉德羅等發起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時候，尼爾在林肯寓執行律師職務。他們雖然有互相見面的機會，但從來沒有交談過，因為無論從年齡，信仰，或資產方面說，他們是迥然不同的。其時，尼爾已年越不惑，而摩氏等却不過三十左右而已。尼爾是一個富有資產的人，與大多數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有天壤之別。還有，他的宗教信仰，亦與摩氏等有出入之處。廣泛的宗教，他是信仰的，對於教會，尤其是對於所謂牧師，他是瞧不起的。所以摩氏等雖然以林肯寓為他們的大本營，但從不能引動尼爾的注意。

一八五〇年卡斯爾街合作社的開幕，却把這年齡不同，身價不同，信仰不同的尼爾吸引了進來。過了不久，他們就推他為中央委員之一。他的思想是屬於大陸派的，非普通人所能了解。比如當他的思想與自

然的對照 *Analogy of Thought and Nature* 出版的時候，連拉德羅也說：『這是一本很難讀的書。』他見義勇為的精神，在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可說是首屈一指。在說話時，他也許面紅耳赤，表示他堅強的意志，但內骨子裏，他却從善如流，毫無成見。拉德羅說：『他的思想太豐富了，他的判斷太迅速了，他所提出的計劃，時常引起我的反抗；但像他那樣的大度和忠實的生活，我却不多觀哩！』

現在我們看尼爾怎樣使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職業組合發生關係。

自從尼爾加入了中央委員會之後，基督教社會主義工作的方向便改變了。尼爾總是從大處落墨。他以爲卡斯爾街等地方的合作社，雖自有其價值，但要在各處一個個地開辦起來，總覺太爲麻煩，那末，爲什麼不把合作的原則注射到已經散布在全國的職業組合中去，使所有職業組合，統統變爲合作社呢？果然，他的計劃得了其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合意。一八五〇年秋，柯柏寫了封信給倫敦職業組合，在這信裏，他指出生產合作的重要，以及職業組合在合作運動中所處的地位。這信得了以下的反應。

一八五一年一月，鋼鐵組合成立了。其時在利物浦有一家鐵工廠，正在出售。他們決意把這工廠買下來。以作生產合作之試驗，並且把章程也定了，其內容爲：第一，無論總經理或經理，統歸工人自選，其任期爲七年；第二，一切工人，都是從鋼鐵組合中選出來的，換句話說：只有那些完全接受生產合作原則的人，才有在這新工廠中工作的機會；第三，工資多寡，由鋼鐵組合規定；第四，除了經常開支之外，其餘利潤，統作教育經費之用。他們預算只要有五萬鎊就可開工。這當然不成問題，因爲鋼鐵組合是一個有儲蓄的團體，再加

上尼爾等的贊助，區區之數，一定可以籌足。

不幸，正在籌備之際，事變發生了。一八五一年八月，鋼鐵組合提出了一個反對長時間工作的議案。在一萬一千八百個工人中間，贊成這議案的，有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四人之多。於是他們宣言長時間工作只以十二月三十一日為限，越期，以斷然手對付之。在組合看來，這宣言一定可以把資方嚇倒，因為他們不但人數衆多，而且又有二萬五千鎊的儲蓄，如果罷工，儘可恃久而有餘。孰意資方也是有聯絡的。他們會商之下，愈覺倘使這次屈服了，那以後將伊於胡底？所以在十二月七日，也發出一個宣言，大意謂：如果工人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罷工，那他們只得停業。三十日，組合鑒於事態之嚴重，自動讓步，他們說：所謂反對長時間工作議案，僅勞方之要求耳，儘有仲裁之餘地云云。從這話裏，我們可以看出組合在起初雖然有恃無恐，但事到臨頭，他們還非妥協不可。那末，這妥協得到資方的諒解沒有？不，資方以為一不作，二不休，他們置之不理。一月十日，實行休業。失業者幾二萬人。

現在組合騎虎難下了。不過他們還覺得在相當期間，這問題就可解決。詎知這次資方那什麼也不顧了。他們想要趁此機會，把勞方完全壓迫下去。他們堅決主張：凡是要復工的，須書面聲明，以後不再與組合發生關係。這僵局相持着，一直到四月為止。結果，仍然是勞方失敗，因為組合的儲蓄已經用盡了。在飢寒疼痛和城下之盟之間，他們只能擇後者而去前者。這事變影響了組合收買利物浦鐵工廠的計劃。他們的儲蓄在罷工中統統用光了，還有什麼餘力來試驗新工廠呢？所擬章程，亦祇得束之高閣了。

在大罷工時候，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做了些什麼呢？第一，除金斯黎和摩里士緘默無言，或至於反對罷工外，其他的人，如拉德羅，尼爾，休士等，都用了他們的口，或是筆，為勞動階級請命。休士在合社雜誌中寫了許多擁護勞方的文章。尼爾的演講辭勞動和資本 *Labour and Capital* 把勞資間的關係解剖得清清楚楚。他的小冊子難道不能拿自己所有的來為所欲為嗎 *May I not do what I will with my own?* 乃是資產階級的當頭棒喝。這小冊子的末尾說：「按理，所謂主人，乃是「人」的領袖，而不是「手」的的雇主。……不但用語言，而且要用行為來證明人類是弟兄。」按理，這話是可以叫當時壓迫工人的廠主們醒悟的，無如，廠主們貨利薰心，繡纓其耳，對於這種忠告，那裏聽得進去？拉德羅寫了三篇關於勞資關係的文章。在有一篇裏，他提出了一個極讓步的辦法。他說：要解決勞資糾紛，只有三種辦法。第一，由廠主自動把利潤分給勞方；第二，使勞方也處於主人地位，與資方通力合作；第三，勞方與資方不要各走極端，應當言歸於好。第三恐怕就是鋼鐵組合在十二月三十日所提出的辦法。可惜連第三種辦法也不能動資方的聽聞，而勞資決裂了。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這次工潮中第二種工作是樊雪太脫 *A. A. Vansticht* 及尼爾分頭進行的兩家工廠。樊氏是尼爾的表兄弟，也是一個富有家私的人。他和尼爾在一八五〇年春同時加入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不過他沒有像尼爾那樣活動，這是他秉性如此，並不是因為不熱心的緣故，在時機未到之前，他不肯輕舉妄動。現在他活動的時候到了。在大罷工中，他親眼看見了工人的痛苦，於是他集合同志，討論

救濟辦法。他故意沒有請尼爾加入，因為他知道尼爾自從參預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來，損失很大。他們聚議之下，決意另外創辦一個鐵工廠。這工廠規模，雖沒有像鋼鐵組合所籌備的那樣宏大，但作生產合作的小試驗，却是可以的。他們的章程和鋼鐵組合所擬的完全一樣，不過他們又加上一條，就是凡是工人，同時必須是股董，每股五鎊，所有股子，就是離了廠也不能發還。他們所以有這一條，是因為他們的資本沒有像鋼鐵組合那樣雄厚的緣故，這是很清楚的。這工廠很順利地進行着，有數年之久。以後，他們接下了——注蝕本生意。這蝕本生意，簡直致了這工廠的致命時，為一八五三年。

同時，尼爾也發起了一家鐵工廠。在事前他與鋼鐵組合有相當諒解，到萬一時候，他們非予以援助不可。尼爾所以如此，第一因為他對於鋼鐵業是一門外漢；第二因為他自覺現在的力量遠不如從前了。三月二十五日，這工廠罷工了。起初，營業頗有應接不暇之勢，同時，鋼鐵組合至少在精神方面的確予以援助。到一八五三年夏，他們的報告還很樂觀。不過以後鋼鐵組合連精神上的援助也有些吝色了。再加上尼爾對於斯道的不專長，生意日益衰落。尼爾勉強一個人支持着，一直到他完全破產為止。

上面是一段多麼傷心的歷史。尼爾等想要借重職業組合以實現其生產合作的計劃，結果不是職業組合不能相見以誠，有始無終，就是因為外方的壓迫，使能夠接受他計劃的組合，不能為所欲為。那末，尼爾等的努力完全沒有效果嗎？不。費邊社的領袖衛布在敘述職業組合歷史的時候，清清楚楚地說：尼爾和其他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在職業組合運動中，是一般人所信賴的法律專家和政治顧問。其對於基督教社會

主義者之景仰，於此可見。

六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消費合作

合作運動沒有達到完全的地步，如果只顧生產而不顧消費的話。現在經濟制度，癥結很多，商品經濟，就是其中之一，商品經濟的解釋是這樣的。比如一個農夫，他產生了一石麥子，其成本合勞動價值而言，只要四塊錢。但是他直接賣給消費者，却賣給了一家米店。這米店把價格抬高了一變而為六塊錢一石。這兩塊錢的利益，其代價只一舉手一投足而已，雖然米店自有其相當開支。即使米店因開支過鉅而無利可圖，試問生產者為什麼不直接賣給消費者而可以多賣幾個錢？消費者為什麼不直接向生產者購買而可以少出幾個錢，而一定要雙方擔任米店的開支呢？所以商人是社會生產的寄生物。還有，如果這商人是特別有錢的，那他儘可以把一切麥子統統收買起來，以施其壟斷手段，使生產者和消費者更受其剝削。因此，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商品經濟之亟應消滅，可不待言。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有鑒於此，乃於生產合作外，同時又兼顧到消費合作以收雙管齊下之效。其最初試驗即上面所說建築合作社所創辦的消費合作社。接踵而起者有尼爾所開設的倫敦消費合作社等。所以在一八五〇年幾個月中間，消費合作社這個名詞，已為一般人所習聞。開始營業者，已有幾家。

一八五〇年十月，尼爾從法國回來。在這次遊歷中，他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消費合作非失敗不可，如

果社與社之間，沒有切實聯絡的話。比如他所開辦的倫敦消費合作社，其貨品是從別處買來的，但因為資本不足的緣故，進貨時成本過高，於是賣出去的時候，價格反在普通商店之上，使消費者不是眼睜睜地受虧，就是裹足不前。消費合作社之前途，不言可喻。還有，營業既然不振，同時又不能使貨品長時間地停滯着，為流通金融計，不得已，祇能廉價出售。甲社如此，乙社亦如此，他們所痛詆的競爭制度，於以復活。尼爾看到了這種危險，於一八五一年三月發出一個通告。在這通告中，他提出兩點：第一，各合作社資本應該混合；第二，所定價格，均當一律，以免競爭之弊。希奇的是：這提案完全失敗，而尤以建築合作社之反對為最烈，因為當時在一切合作社中，他們是最發達，他們不情願因別人的失敗而犧牲自己的成功，或用自己的成功來救別人的失敗。後來，這提案在理事部中無形打消了。

尼爾是一個有自信力的人。提案失敗，他便自動地組織了一個機關，叫做「中央合作經理處」(Central Co-operative Agency)。其資本為九千鎊。尼爾以為這經理處雖然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然而他既然是中央委員之一，況且照他看來，一般人所以反對他的提案，是因為害怕要擔負經濟責任的緣故，現在經濟責任既由他一人擔負，他們何必再要反對？在名義上使經理處成為基督教社會主義工作之一部，有何不可？孰知這意思沒有得到大多數中央委員的諒解。十月，拉德羅從北方回來。他對於尼爾的行動，大為不滿。十一月，中央委員正式討論這問題。拉德羅缺席。但是他寫了一封信給摩里士，主張就是於名義上，也應該和經理處脫離關係。爭辯之下，拉氏勝利。

經理處自從完全離開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之後，它怎樣呢？起初極爲發達。據一八五二年冬天報告，平均每星期消費合作社之來批貨者有十五家之多。過後，事變生了。有一個經理是法國人。幾年前因政治嫌疑亡命到英國。他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發生了關係。尼爾請他爲經理，因爲看他頗有幹才。不料過了不久，因經濟關係，被尼爾辭去了。於是他老羞成怒，另立一性質相同的組織，以與經理處抗衡。經理處並不受其影響。再過數月，竟然覺得原有地方太小而不得不另找房子。這却把經理處的經濟基礎動搖了。因爲現在它的開支太大了。倘使尼爾沒有鐵工廠問題，則還可支持。不幸二者走上了同樣的命途。他財力有限，顧此失彼。一八五七年，這經理處停閉了。

後世的人都要問：尼爾買大不陸，在一般人反對之下，獨資創辦「中央合作經理處」。過了幾年，這經理處仍歸失敗，那末，他對於消費合作的貢獻何在呢？關於這問題，費文在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中有這樣一段話：「經理處對於合作運動的歷史，其影響實是太大了。它是現在批發合作社的真正的急先鋒。不特此也，同時，它又喚起了各地合作者統一和互助的意識。」所以中央委員會和理事部雖然完全反對他的提案，但倘使沒他的「煽強」，基督教社會主義史中，恐怕不會有這光明燦爛的一章呢。

七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法律問題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對於當時英國法律，反對之處有二。第一，士兵，警察，郵務人員，和囚犯，每年在制

方面消耗的，爲數甚鉅。這許多制服，都是由主管機關經手的。主管機關一方面把價格減低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浮報賬目，以便中飽。而且這腐敗到處皆然，即經檢舉，亦是官官相護，檢舉者無不失敗。比如有一次有一個人向政府提出這問題。他以為政府對於這問題，至少要調查一下，孰知他所得到的批示是：「製衣服是根據契約的。對於工資，政府無干涉之可能。……工資之多寡，完全以工人之兢爭爲根據。」這情形釀起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憤怒。拉德羅在一八五一年寫了幾篇極尖刻的文章。他說：「所謂『政府契約制度』不過把工資減少，使人民流爲餓殍就是了。我們何必再拿憑據來證明這制度的蠢笨，和兇惡呢？這制度在人類中是最毒辣的了。」他主張一面把工資加高，一面使工人可以和政府直接交待，以免經手人的舞弊。三月，由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主動，這問題到了國會。無如，時機未熟國會的答覆雖沒有像以上所舉政府的批示那樣露骨，而其不理睬則一。

第二他們反對的是公司法。這問題與合作運動有切膚關係。何以言之？按照以前法律，像合作社那樣的一個組織，儘可向政府註冊，在法律上獲得應有之保障。最近，這法律改變了。凡是一個公司，其股東人數，在二十五人以下者，一概不能註冊；股東中任何一人，可以將整個公司抵押出去。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開辦的合作社，其股東人數，大都在法定人數之下；只要有一個人不忠實，就可以牽連全體。所以有許多人對於合作運動，雖然深表同情，但不敢貿然加入，因爲覺得在法律上，他們太無保障了。還有，即使把股東人數擴充到二十五人以上，也有困難之處，因爲凡在二十五人以上者，須照公司法登記，其所費至鉅，當時所有

的合作社，沒有一家能擔負得起。總之，合作社在現行法律之下，決難存在。

幸虧，在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中間，很有幾個法律專家，比如拉德羅，尼爾等。他們覺得為謀合作運動之生存計，非把這問題解決不可。其時，在國會中有一個人叫做司來奈 *R. A. Smeeth*。他是一個毫無主張的人。凡是新奇問題，他都感受興趣。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就利用他，要他於國會中代為週旋。一八五〇年國會開會時候，他便把這問題提了出來。國會第一點要知道的是合作運動的本身，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價值？言之，如果合作運動的本身推翻了，那末所謂合作社，當然無鼓勵之可言。為集思廣益起見，他們請了裴一時的經濟專家穆勒 *John Stuart Mill* 為臨時顧問。穆勒在政治經濟的原則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三版序文中，聲明他不是反社會主義。但是這時，他的第三版還沒有出來。所以一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聽見國會請了他為臨時顧問，便覺驚慌萬分，以為這問題斷無通過之希望。而孰知穆勒竟這樣地報告着：『公司法在各方面阻止了工人階級的改良。……公司法不允許任何工業中工人，根據合作原則，經營自己的事，無論他們的錢是自己的，或是借來的。這是公司法對於工人們最大的打擊。』他甚至於說：『現在工人們已經組織了合作社，以經營他們所熟知的事。在合作社中間，他們都是工作者，無論就他們自己的利益，或社會的利益言，這是工人階級利用儲蓄的最好辦法。』這報告實在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夢想不到的。

一八五一年二月，司來奈重把這議案在國會中提出。當時原有內閣，正在風雨飄搖之中，新內閣尙未

產生在此青黃不接之際司氏的議案也就被懸擱了。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九日，司氏第三次提出這議案。現在內閣問題已經解決，再加上以前穆勒強有力的報告，這次國會終於把這議案通過了。不過在原案之外，另加一條，就是凡為股東，須負有無限責任，就是在退出之後，還要擔負。當然，這一條是不能叫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滿意的。他們繼續活動，因各方的援助，在五月二十七日國會開會的時候，拉德羅、尼爾和休士三人，竟然得參末座。結果，國會把這條條件修正了，改為「取消社員資格後二年，可不負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原有之目的，是要把這條完全取消，但現在國會快要閉會，如果再延宕下去，則安知下屆國會不會把前案推翻而加以更嚴厲的限止呢？他們看到這層，便接受了。六月三十日，經英皇批准。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次合作大會開幕。出席團體二十八個，個人列席有六百人之多，而且都是有地位的人，以視數年前既為輿情所不容，又為法律所不許之所謂「烏合之衆」，何啻天壤。大會授摩里士以榮譽獎章，以資鼓勵。這時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

八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勞動大學

摩里士到底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其時，合作運動雖已經得到了法律保障，而合作社大概因為人選關係，却一個個地在倒閉。於是他覺得，在人們沒有明瞭社會主義的真諦之前，欲求合作運動之進展，是不可能的。同時他知道他的貢獻，不在於錙銖必較的商業，而在於百年樹人的教育。所以在大會閉幕之後，他

便寫了一封信給拉德羅，以示其志。他說：『我和爾都主張合作商業是根據於基督教原則的，對於這主張我從來沒有反悔過，而且我想以後也不會反悔。……如果我們還是和商業混在一起，那我們不但要減少我們固有的道德力量，而且足以阻止事業之進行而有餘。……我曾隨意忖過，除此以外，有什麼旁的方法可以發揮合作運動的原則。……照我看來，辦大學恐怕就是我們應該擔任的工作吧！而且這工作是在我們能力之內的。』

照拉德羅在去世前所寫的大學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College* 看來，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對於教育，蓄意已久。據說在前幾年他們已經把教育計劃擬好了，不過因為忙於合作運動及法律問題的緣故，沒有正式進行就是了。現在合作運動已有了相當的試驗，無論成敗，總可以告一段落。法律問題總算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再加上教育計劃有案可稽，並不自今日始，當然，摩里士唱之於前，隨之於後者，頗不乏人。還有，他們以前也許害怕沒有人去專司其事，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專責，整個教育計劃，斷不是一個兼差的人所能勝任。如今，這問題也可以解決了。他們的領袖摩里士因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已經脫離了司經大學，從此，他儘可致全力於教育事業了。

為鄭重將事起見，在沒有正式成立大學之前，他們先辦了些比較地有伸縮性的教育事業，比如每晚八時半的普通演講，星期日的聖經班等。演講題目，關於文學者有之，關於科學者有之，關於歷史者有之，關於建築者亦有之。所有演員，均係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之中堅人物，如摩里士，金斯黎，尼爾，拉德羅，休士。

柯柏，樊雪太脫等。好在他們各有專長。就是把自己隊伍裏的拿出來，也已經夠應付當時的需要了。聖經班是摩里士主領的。在勞動大學中，到現在還保存着一部聖經，班送給摩里士的聖經。在這聖經中有許多名字簽着，其中有幾個人，到了後來，竟然在社會運動中得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哩！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九百六十七個工人，聯名請摩里士從速開辦大學，以濟時需。一八五四年六月，摩里士到各處宣傳勞動大學的意義。十月三十日，摩里士就校長職。十二月二日，勞動大學正式開學。報到學生有一百七十六人之多。文學是摩里士擔任的，法律是拉德羅擔任的。此外，他們又請了幾個原來不是在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人擔任別的課程，如數學，地理，美術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納斯欽 John Ruskin。他本來是一個美術家。後來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發生了關係。他在勞動大學擔任功課，一直到一八六〇年為止，他所出版的關於社會問題的鉅著，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勞動大學竟然把一個素以美術著名的人變作了一個對於社會問題極有貢獻的人。勞動大學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勞動大學最大的貢獻並不是知識的介紹，却是人格的訓練。正像賈文所說：『他們的目的不單在技能的訓練……我們不能拿商業或功利來估量他們功課的價值……他們要介紹的不單是知識，而且又是智力，不單是造詣，而且又是德行。其目的不一定要使他們在事業方面比別人格外聰明，或是予他們以成功的工具，却是要使他們成爲更好的人，更好的公民，更好的基督徒。最重要的目的在使他們得到合作和友愛的精神。』所以凡是和這大學發生過關係的人，無論其爲學生，或教員，只要在裏面住過幾時，更激

頭徹尾地改變了。

九 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

以上是基請教社會主義的歷史。從這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工作有二：屬於靜的有教育事業，屬於動的有合作運動。教育事業之失敗與成功，我們未敢武斷，因為這沒有絕對的標準。而合作運動之失敗，却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其實，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對於合作運動，已有其相當之貢獻。比如法律問題是全仗他們的努力而解決的。然而現在一般談合作運動的人，每每把他們的貢獻略而不談，而特別注意其失敗。何以故？因為法律的目的在輔助事業之成功，事業本身既已失敗，法律之效用已失。所以說來，說去，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逃不掉是一個失敗。現在我們要研究的乃其失敗之原因。蓋今之談合作運動者衆矣，知道了他們失敗的原因，我們或者也可知所警惕吧！

衛布夫人在她的英國合作運動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和職業組合史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中，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所提倡的合作運動，提出了以下的批評：

第一，她說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合作運動，不過『把社會分成幾個小的各自為政的生產團體就是了。結果，互相鬭爭，以至於死。或者大家聯合起來，在物價和質料方面，向社會要挾。』換言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合作運動，乃是處於競爭和壟斷之間。不聯合，則互相競爭；聯合，則流於壟斷。此其批

評一。

對於這批評，拉德羅和費尼費爾曾答覆過。他們的意思是：合作運動決無競爭和壟斷之弊，因為合作運動的章程明明寫着：『凡同一買賣和同一地方的合作社，其物價之高低，須經大家公決。理事部有統轄之權，這樣，就可以免除壟斷或不正常的競爭了。』還有，合作運動以世界為範圍，合作社的聯合，起初也許有壟斷的嫌疑，但等到全世界都全作化了，這嫌疑便可消滅。

第二，她說：『工人們的期望是個人獨立和個人利益，所以這些領袖們所提倡的工場自治，正合他們的胃口。』又說：『他們的目的不過在推翻個人資本家而代以唯利是圖的自治工人就是了。』此其批評二。

對於這批評，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答覆是：不錯，我們現在也許以個人利益來引起工人們的興趣，因為無論什麼運動，總是逃不出這以利為餌的關頭。不過到末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還是要以純粹的共產主義為歸宿的，現在工資制度，僅過渡辦法耳。

第三，她說：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專以小工業為範圍，『而忽略了產業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局面，比如因為我們用了大資本，我們便得到了更大的收入。還有，自從產業革命之後，工廠的紀律也煩屑了。』這許多，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都沒有看到，他們專在小規模的工業中兜圈子。此其批評三。

對於這批評，拉德羅老實承認：『這是很簡單的。就是當那時候我們還沒這許多事實……我們只能

儘我們所知就是了。」他又說：「不錯，我們的努力只限止於手工業工人，其實這是一件偶然的事。我們以爲合作和共同努力應當作爲一切事業的原則。自秉政以至於清道夫，都應該以此爲原則。這是我們所信以爲真而以此勵人者。」同時，自從尼爾加入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之後，在比較地大工業方面，他們也曾努力過。不錯，他們的試驗失敗了。不過失敗的原因，不在合作原則，而在人選及其他問題。

對於衛布夫人所提出的三個批評，我們都已經有了答覆。現在我們要看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真的原因了。

第一，這是一個多事之秋。一般人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合作運動上面而予以最高限度的聲援。其時，在宗教方面，羅馬教與基督教之爭甚烈。羅馬教王氣餒萬丈。基督教徒正向他下總攻擊。他們的宗教興趣，超過了他們的社會興趣。所以摩里士等的呼聲，只能得到少數基督教徒的反應。大多數却還是在掩着耳朵作他們的「衛道」工作哩！還有，在政治方面，克里米亞之戰和印度背叛，接踵而起，全國人民爲戰雲所籠罩，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倡導之合作運動，只能視若無睹了。不但如此，連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自己的隊伍也被戰事所破壞了。比如休士竟然加入了行伍，爲國捐軀之不暇，還有什麼工夫爲合作運動努力呢？總之，教會的內訌以及軍事的旁午阻止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前進。這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一。

第二，摩里士是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這是誰都承認的。他原來在經司大學教書。現在因爲他

和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密切的關係，經司大學校長便把他辭掉了，而且又捏造了許多捕風捉影的話來攻擊他。這便使拉德羅等忙得寢食不安，夜以繼日地或用口或用筆為摩氏辯白，因為他們看到摩氏一人的失敗，就是整個運動的失敗。他們這樣幹着，有數月之久。合作運動的進行，無形中受了影響。

還有，自從這次事變之後，摩氏的態度也改變了。他覺得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有整個潰崩的危險，如果 he 還是其中的領袖。所以他處處推諉，不敢向前。這是他個人的韜晦，但他個人的韜晦，却影響了整個運動，因為他們已如羣龍失首。運動之有退無進，其以此乎！摩氏後來把注意力轉到教育方面而脫離了合作運動，未始不是惕於經司大學的攻擊有以致之也。經司大學之不滿意於他竟造了合作運動之失敗。這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二。

第三，倫敦這地方對於像合作運動那樣的事業是不適合的。倫敦居民的特色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執倫敦居民而問其鄰居何人，則必瞠目無所對。這種各自為政的心理，與合作精神，適相庭違。還有，倫敦為商業薈集之處，市僧奸商，觸處皆是，與其言合作運動，無異對牛彈琴。最後，倫敦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大都會，所有居民，良莠不齊。因此，人與人中間，都存着一種猜忌之心。要知無論何事，一有猜忌，便難成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開辦的合作社中間，有幾個經理的確是忠實的，但因為人家猜忌他的緣故，一天到晚發生人與人之爭，結果營業失敗，而至於停業。北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北部既非商業之中心，又無人品之複雜，更乏異己之成見，所以在那裏，合作社得免夭逝者多。這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

動失敗的原因三。

第四，我們都衆口一辭的說：尼爾的慷慨解囊，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是一種極大的貢獻。據說他前後犧牲的有六萬鎊之鉅。這種精神，在任何運動中不可多得。但是後世之評論者，於歌頌之餘，却沒有不說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的失敗，尼爾應負其咎。何以言之？尼爾的慷慨造成了人們的依賴心。所以等到一旦困難發生，他們都臨陣而逃，無持久之毅力。還有，有許多合作社社員，他們進來，何嘗有合作之誠意，不過看見尼爾既有錢又慷慨，借此以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耳。自己的經濟問題既已解決，尼爾既已破產，他們便望望然而棄之。這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四。

第五，以大體而論，合作社社員的道德程度實在太差。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自己在他們的報告也承認：『他們進社的時候，都希望立即可以發財，可以減輕工作，可以做主人。過了一兩個月，他們大失所望。於是逢人便鬧。衆矢之的者爲經理。結果，便於爭吵之下，不歡而散。』大多數合作社就是這樣解體的。摩里士把注意力轉移到教育上面而承認他是不適合於商業的，大概也是因爲這緣故吧！因爲他在一八五六年曾經有過這樣一句話：『道德和辦事還須要六十年訓練呢！』這是基督教社會主義合作運動失敗的原因五。

雖然如此，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却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在。當拉德羅寫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六七年工人階級的進步 *Prog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32—1867* 的時候，基督教社會主義的

合作運動失敗已久。按理他應當感傷之不暇，更有何頌揚之可言。但是他却寫了以下的話：『最重要的是合作運動把醉酒和公開搗亂的情形，從社中趕了出去。……慢慢地那些無足輕重的詭計和欺詐也滅跡了，因為這都是由於勞資利益衝突而來的，……工作的固定和利益的共享，造成了人與人中間新的關係。家庭感覺於以發生。』末了他又說：『這現狀也許不能立即改變，但新式工人已慢慢地形成。他們不但誠實，不但坦白，而且有自尊之心，有自由的意識。這是合作社所特有的。』末了一句多麼有勁。要造成有自尊之心和有自由意識的工人，當然免不掉許多失敗；但是爲造成有自尊之心，和有自由意識的工人而失敗，這失敗，却是值得的。

所

版

種六十第書叢年青

史新義主會社

有

權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著
作
者
沈
嗣
莊

校
閱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册實價大洋八角 (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 16

A NEW HISTORY OF SOCIALISM

By J. WESLEY SHE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80 cents, postage extra

1st Ed., Dec. 1934

54
3464

